



客的尊容也不大能一目了然，因为他们常在脸上画了“左”的花纹，但是在这一次论大赦政治犯中，他们却把自己的脸谱清清楚楚地揭露给民众看见了！

1936年8月24日夜

〔注〕这里的××是日本，在那时是不准写的。

最初刊载于1936年9月5日《生活知识》(上海)
第2卷第8期。



最后的笑

欧洲有一句流行的谚语道：“笑得最后的，是笑得最好的”。这句话可以应用得很广。对于我们的当前的现实生活，我觉得，这句话也能够提供一点教训。

在我们的周围，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是太容易笑了。虽然不至于像“黄毛丫头见一根筷子落下地便格格地笑半天”，但是确有些人只要有一点小小的成功便马上感到非常的满意而无邪地笑了——虽然在这时候敌人的血盆大口也许还正张开在身旁呢。

笑的反面是哭，容易笑的也容易哭。倘然很小的成功就能使他笑半天的话，那么很小的一点失败也一定会使他非常失望地哭起来。

但是一个真正的战士却不轻易哭，也不轻易笑。

在北平学生运动刚发生不久时，北平有些学者说：这全然是年轻人一时感情冲动，感情不久就会消散，学生运动也马上会过去的。这样的话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了，因为事实上学生运动并没有马上消灭，而是至今还在一天天地发展。但倘然说他们的话中间也有一点真理，那大概是在于他们指出了：感情是靠不住的。——一个运动倘然只是在感情冲动中进行，那的确是不能够持久的。

无可否认的，学生大抵是出身于小有产阶层，而小有产阶层在心理上的反应往往是容易知足，容易走入空想，也容易幻灭，容易



感到失望。

但是一个能使胜利继续着胜利，又能从失败中打出胜利的斗士，却决不是“今日主义者”。他决不只看着今天，不因为今日所获得的一点成功和失败而笑，而哭。他知道，不用更大的胜利来继续今天的胜利，今天的胜利是没有用的。他又知道，在失败中间可以得到斗争的经验，而且在失败中间也包含着胜利的因子，这些都使我们有把握把今天的失败化做明天的胜利。

自然，我们并不是把一个战士描写成一个全然没有感情的机械的动物，那样的人在现实中间是没有的。一个现实中的斗士一定也有种种对于成功和失败的复杂的感情，但是他的感情有调节，不随便发泄，他的目光永远望着前方，望着最后的笑！

不能把情感适当地调节的人，一定不能做持久的斗争，而持久正是现在的救国运动所要求的。游行示威的方式最能使参加的人亢奋，但是不在适当的现实情势下，不曾详细考虑了各方面的力量的时候，是决不能轻易举行的。

持久战的反面是冲锋战。自然，冲锋战在整个战争中，也是有它的地位的。谁能否认北平学生在“一二九”、“一二一六”的英勇的行为的意义呢？但是他们也并不是永远用冲锋战的方式的，因为决定最后的胜利的还是坚韧的持久战。他们在一次示威游行后，不论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都要马上严肃地检讨自己的工作，整理自己的队伍，扩大自己的组织，并且和更多的本来站在斗争外面的人拉起手来……然后他们才能得到第二、第三步的胜利。——这一步的胜利引领他们向“最后的笑”走去。

因为在我们的面前，有着“最后的笑”做我们的目标，当然我们不至于对现在的失败表示失望的悲观。又因为我们的“最好”的笑还在最后，我们对于目前所得到的一切成功就不能不做一番冷静



的审视了。

在人生中碰壁的大多是急于要笑的人。他们耐不住漫漫的长夜，于是不论一点萤火，一个幻影，一个空虚的声音，都使他们仿佛找到了最后的光明似地笑了。对人生乐观原不是坏事，但可惜，事实立刻会使他明白：他所找到的其实只是一个纸做的灯笼，一戳就穿的。于是紧跟着笑就是哭，有的青年对社会和事业失望而自杀的事情，不也可以从这里得到一部分的解释么？

事实上，人生每一举步，都可碰到纸灯笼。我们不必为纸灯笼而狂欢大笑，因为我们知道，这究竟只是一盏纸灯笼，我们要找的光明还在前面。但我们也不必因为这是纸灯笼就悲观起来，甚至自杀，因为毕竟它可以照送我们一段路，它到底也还是我们求光明之途中的一点收获。

有一些把事情看得太简单的年轻人，常常对于他所热衷的某种事业及组织或是他所崇拜的某个人，建立起许多架空的幻想来，把一切人物看成只有能存在在想象中的那样十全十美。这样的人，也可以说是太容易笑的人。但是结果，幻想一遇到事实立刻粉碎，这时候的失望就很难堪了。——容易建立幻想的人一定容易失望。

但一个真正的战士却不轻易哭，也不轻易笑，他冷静地分析和指挥当前的行动，并且热情地望着“最后的笑”。

“最后的笑”的保持者是胜利者。

“笑得最后的，是笑得最好的。”

最初刊载于1936年10月18日《生活星期刊》
(上海)第1卷20号。



肃清悲观，建立自信

抱着悲观的心情的人，或是抱着侥幸心理的人是不能成为抗战中的战士的。这两种人中前一种人说：中国的沦亡是不能避免的了，但与其“瓦全”，何如“玉碎”呢？我们要使中国化成一片焦土之后，再让敌人拿去！后一种人说：中国不战是要亡的，但战也不一定就能存，不过战总比不战好，因为在战争上，我们多少人总还有存的一线希望。——依照前一说，这次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就成了临死前的徒然的挣扎；依照后一说，抗战是变成了一次赌博的行为了。

为了肃清这两种心理，许多人反复地说明了抗日必胜论，他们从中日两国国力的对比上，从整个国际外交的形势上指出了，只要中国对日本坚决地抗战，最后胜利是在中国的一面！

这种必胜论的确是在群众中间起了很大的作用，成为抗战中的积极的乐观的精神的基础。没有对于最后的胜利的坚信的人，决不会积极地乐观地参加到抗战的队伍中间去的。

但是抗战到现在的4个月中间，不但最后的胜利似乎还离开我们很遥远，而且接连不断的军事上的失败已经加到了我们的头上。这种失败使得许多人怀疑：所谓“抗日必胜论”难道只是一种空洞的理论么？所谓“最后的胜利”难道只是一种渺茫的希望么？

这种失败和因这失败而起的怀疑使原来的侥幸论者，甚至连



一部分的乐观论者都堕入悲哀失望中间，甚至使他们堕入了和平妥协的主张中间去了！

抗战发展到现阶段，假如要使抗战继续地持久下去，重建乐观的积极的精神是必要的了。

这种乐观的积极的精神，自然仍是要建立在对于抗战必胜的信念上面的，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把许多人反复说过的抗日必胜论重新申说一遍呢？但只这样做，恐怕还是不能够肃清在此刻笼罩在一般人心理上的悲观情绪的。

事实上，有许多人，他们能够一点两点说明抗日必胜的理由，但是他们自己在惨酷的事实面前，也丧失了对于自己的说话的信心。

对于这样的人，除了向他们说明客观的事实并不如表面上看上去那样地失败以外，并且还得进一步确立他们对于自己的力量信任。

假如把抗日必胜看成是纯客观的事情，甚至是命定的事情，那是绝对错误的。固然我们不反对这样说：在抗战中我们必然能胜利，因为我们有种种的对我们有利的客观条件，但是这一切条件本身还是在发展变化中间的。我们不能因为有了这些条件存在，就仿佛已经一手拿住了胜利的果子了。我们到今日为止，还只是拿住了抗战胜利的可能性，在4个月来的抗战过程中间，这种可能性并不曾减弱一分，恰恰相反，是在不断增长着。然而使这种可能性变成具体的现实性却决不是一反掌之劳就可达到的。

抱着机械的思想方法的人把可能性与现实性完全混同了。起初看见有胜利的可能，就以为到达现实的胜利是不成问题了。但一到了在现实中遇到若干失败的时候，就以为连胜利的可能也丧失掉了。他们既看不见可能性的生长发展，更不知道从可能性到现实



性是要经过如何艰苦的一段路程！

目前许多人失望悲观的心理的产生，恐怕正是纯客观地、机械地接受了抗战必胜论的原故。

但是还有一种人说：我们知道要使抗战的胜利现实化，必须靠主观的积极的力量的推动。我们也知道目前在抗战中的失败并不曾绝对消灭了胜利的可能，只要有一种巨大的力量，还是可以使这失败的形势走上胜利的前途的，但是力量在什么地方呢？

许多人在国际上去找这种力量，以为除非有某个国家能给我们以巨大军事上的援助，否则这抗战总是没有前途的。——这种心理正是充分表示了对于自己的力量失掉了自信，仍是悲观绝望的心理表现。

在俄国革命发生之前，曾有一时期，悲观绝望的心情笼罩在一般的知识分子的身上。他们想改革这社会，但是他们不知道怎样改革，他们苦痛地喊道：“到处都听得见怨恨之声，然而力量在哪里？”他们看不见这种力量是存在于广大的农民、工人群众的身上，这种力量当时虽然还是潜伏着，然而却是在一天天增大起来，终于使那愁苦的旧世界化成灰烬了。

是的，看不见能改革现状的力量，是造成悲观绝望的心理的最深刻的原因。

官僚主义者、个人主义者在抗战的现阶段必然会堕入绝望悲观中间去的，因为他们看不见，也不愿意看见在他们脚下的、在他们的周围的广大的群众的力量。这种力量在此刻虽然还是由于种种的客观原因而潜伏着，但是正在一天天地增大着却是很显然的！

要使抗战的可能性转化成现实性，使目前的军事上的失败形势转化成胜利的形势，单靠我们的军队的力量是不够的，专门依赖国际的力量更是错误的，最具有决定的意义的力量，不在别处，就



在我们自己身上。

我们每个人都要化做群众中的一分子,积极地发挥出广大群众中的抗战的力量——只有这个力量才能使抗战达到最后的胜利,也只有这个力量才能肃清一切悲观心理,坚定对于抗战必胜的信念。

最初刊载于1937年12月11日《全民周刊》(武汉)
第1卷第1期。



新的中国人与新的中国

——为抗战二周年纪念作

在血肉炮火与烽烟中间，我们已经度过两年的抗战生活了。

我们不曾如敌人所预计和希冀的，在短速的时期中即丧失战斗的意志。而我们也不曾如民族失败主义者（汪精卫之流）最初所预料的，在持久的战争过程中，一切都牺牲完尽，毁灭完尽。

是的，我们在战争过程中，经历了无数的牺牲与巨大的苦痛，但是我们不特从敌人那里获得了同等或更多的赔偿，而且仍有足够的力量再继续打第三年、第四年……这样打下去的目的不是为了使自己毁灭完尽，也不是为了与敌人同归于尽，而是为了胜利！

两年的抗战完全证明了：我们一方面在抗战中受牺牲，被破坏，同时又在抗战中产生了、发展了新的力量。这种与破坏过程同时进行的新生过程是我们的敌人所看不到的，是一切投降主义者、民族失败主义者所看不到的。

检讨过去时期中抗战的收获，我们必须重视这新的力量的产生。在二年的时期中敌军大量地被我们杀伤，敌国的国力被我们消耗到不能不妄想“速和速决”，全世界因我们两年的抗战而日益增加对我们的同情与援助，国内的投降主义者被我们逐渐地排除到抗战阵营以外。这一切，确实的，都是我们两年抗战的收获，但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我们必须看到，在两年来抗战的炮火中，正在培



养着一个新中国的胎儿。

鲁迅在1907年曾说：“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说这话的时候还是在满清帝制下面。在人民群众中充满着愚昧、苟安、盲从、昏庸。所以启蒙的思想家便起来号召人民的自觉能力的发展，号召个性的发扬。到“五四”时代这种号召更成为有力的革命的呼声。诚然，没有“自觉”的人，独立自由的民族是不可能产生的。长时期的中世纪式的政治与社会，束缚了个人的发展，“五四”前后的启蒙运动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人的发现”运动。然而毋庸讳言，这时代的“人的发现”是不够深刻、不够广泛的，自觉地起来的人在数量上说也绝对占不了全民众中的大部分。

抗战是民族独立解放的运动，同时也就是最深刻最广泛促起中国人民自觉的运动。战火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直接间接地影响到全国人民的公私生活，给每一个人以鞭挞与刺激，同时又给以最好的教育。千百万人民在战争的影响下深刻地考虑到自己的生存与前途，考虑到自己的民族的生存与前途，这些人过去或者只是考虑着自己的庄稼与牛羊，自己的算盘与帐簿，自己的课本与文凭，自己的口红与高跟鞋。现在他们发现了自己是一个人，而人，特别是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有他的生存的意义、价值与任务。

姚雪垠先生的被推为抗战以来一篇好的创作的《差半车麦秸》，为什么能得到这样的荣誉呢？就因为他把广大农村中那些一向沉沦于愚昧、自私中的农民在抗战中“自觉”的生长画出了一个典型。那个被称为而自己也承认是“差半车麦秸”的农民终于在游击队中好好生活下去，在这生活中发现了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命意义——这不是作家的幻想，而是普遍的现实。像在晋察冀边区



中,农村妇女们认真地放哨,“她们放哨,多半坐在村口外面,手里搓着麻绳,或者作着针线,一般不注意的人是不会知道她们是自卫队。当你通过她们时,她们便会拦着你,一定要向你看路条”。(见民革社出版《从战斗中壮大的晋冀察边区》第82页)而且在豫南还有农村老妇人组织的“老太婆剧团”呢,她们高高兴兴地说:“我们也要为抗战做点事。”

有一个曾是资本家的女儿自述说:她最初是厌恶战争,曾因炮火毁了她的圆满的家庭生活而痛恨,为失掉漂亮的衣服而痛哭。但是在她逃难的过程中“由故乡而上海、南京、汉口,以至昆明”,在她给一个杂志的编辑先生的信中说,“这在我的思想不能不起着大的变动,当我亲眼看见自己的佣人被炸死后,我被这一刺激心中感到万分的不安,变得常常流泪。我渐渐注意到各地被敌机轰炸的消息,我愤慨!我悲痛!我为自己的命运担心了。先生!从此我怀疑起这种逃难生活,憎恶着我的家庭。它像牢狱一样使我难堪啊!我要跳出牢狱般的家庭。但是,敬爱的先生,像我这样一个柔弱的女子将怎样投身到抗战的队伍中去呢?”(《全民抗战》第44期)这是新时代中自觉的“娜拉”。经过这样的一种生活过程的人决不是一个而是千千万万个吧。更不用谈那些战斗在前方,在敌后方,发挥出那样英勇奋发、艰苦卓绝的精神的千百万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了。

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的这一特质,使得大部分的人一向还是不被当做“人”看,不被当做社会中正当的成员看。譬如说,旧剧的伶人这其实是应受尊崇的艺术工作者,但是他们从来有正当的人的生活、人的自觉没有?山西的文化抗敌协会曾召集一些旧剧伶人使之过集体的学习与工作的生活,而造成了一批“新伶人”。在一本题为“新伶人”的小册子中说道:“有一次,我听到一位新伶人中的



朋友对我说：“我愧我活了三十多年到如今，实际上，只是个小孩子！”是的，他们在抗战的烈火中发现了自己成为新的人了。

在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也动员了它的全国国民，但是它的动员方式是灭绝了国民的自觉的。而我们呢？是自觉的动员。诚然，在政治组织力上，我们比敌人一向是落后的，但敌人的炮火却刺激起了我们的自觉的全民动员！在这点上，我们不能不感激战争。

在战争中，出现了新的中国人，新的中国人的典型！

我们必须指出，在这次抗战中“人的自觉”的特点：

第一，近代中国史上从太平天国运动以后的数次革命，没有一次是如此深刻地影响到全国国民的。抗战以前全国的农村大部分仍是被中世纪的暗影笼罩着。这一次抗战却不特影响及沿海各地，而深深及于内地的广大农村，不特促起了知识分子的自觉，而且渗透到占全人口的大部分的农民群众中去了。人们曾经说：“农民是天生的个人主义者”，说农民愚昧、落后、迷信，然而使中国进步的运动没有这大部分农民参加是不行的。

抗战中，农民相当普遍地自觉地改变了。他们不再是个人主义了，他们参加了集体的武装斗争，参加游击队。他们不再是落后愚昧了，他们在学习读写。这里可以举一个有趣的实在的故事：“在阜平作战时，某部队追击敌人，有一架机关枪在仓皇中找不到适当地形。老百姓看见了这种情形，非常焦急。有一个老百姓便向排长要求，他愿意趴在地上，把机关枪按在身上。当时排长恐怕他胆小，问他，他说：‘不怕’！于是排长便把机关枪架在他身上，击毙了许多敌人。”另外还有一个故事：在鄂北随县一带，某师的政治部帮助农民成立了一个农民救国会，当地原来有一个红枪会一类的组织，叫做黄道会，农民中间既参加黄道会也参加救国会的人自己决定了，假



如两个会向他们发出了相反的命令，他们一定服从救国会的。这一类的事情可以找到许多。衰老中国的标志的中国农村自觉起来了，虽然这还不是全部的，而是渐渐的，但这决不是一件小事情。

第二，所谓“人的自觉”是从历史上的启蒙运动中借用过来的话。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是“人的自觉”的时期，中国的“五四”运动也是“人的自觉”的时期，但当我们把这话引用到抗战中来的时候，其含义多少有点不同。历史上的“人的自觉”大体上是人格的解放的意思，是从封建的政治与宗教（在中国是礼教）束缚下把个人解放出来的意思，是资产阶级革命反映于意识上的运动。在我们今日的抗战中，“人的自觉”运动是通过广泛激烈的民族斗争而产生的，虽然它也是要给人民以知识，打破迷信与盲从，给人民以觉悟；他不是做国家的奴隶而是做国家的主人，不是做命运的奴隶而是做命运的主人，然而这里绝对不是个人主义的，而是集体主义的。每一个人的“自觉”是通过了，而同时也表现于集体的实践的民族斗争。这真正实现了鲁迅在1907年的预言，“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集体主义原来并不抹煞个性，恰恰相反，倒是依赖于每一个人的自己能力的展开，个性的发扬。在抗战中，人人是在集体的生活中，群众的斗争中发现了自己，改变着自己，训练着自己。

然而在抗战中，是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自觉地站到斗争的战线上了呢？当然也还没有。有许多人“自觉”的程度还不够。而且还有极少数人是仇视着人民的“自觉”的，这些是民族的叛徒，他们还只顾到一己的利益而无视民族的生存，他们想把抗战——也就是把千百万民众的利益出卖给敌人，因此他们绝对不愿意看见民众的“自觉”，而愿意看见他们永远沉沦于无知与愚昧之中。这些人



就是汪精卫和他的走狗！

无论汪精卫他们怎样花言巧语想欺骗民众，他们用各种方式在全国民众中散播出“和平”的谣言，但是没有人相信他们，为什么？因为多数人民都有了自觉！任何想使抗战中途妥协的企图都决不会成功，为什么？因为民众都自觉地站在斗争的前线上了，他们已决心为保卫自己的利益，保卫民族的利益而与敌人斗争到底，决心要打败敌人，直到他来投降。在两年的抗战中锻炼出来的人民已不是可以让人牵着鼻子走的人了。他们有主张，有见识，他们能辨别是非，分清皂白，他们信任自己的战斗力是强大无比的，他们相信持久抗战的国策，一定能达到最后胜利的目的，相信自己的民族最后一定能独立解放！他们决不能让自己的前途、子子孙孙的前途，给少数投降论者、妥协和平论者断送！

自觉的人民群众是一个伟大的力量，这力量能摧毁疯狂进攻的敌人，击溃一切妥协投降的企图。

汪精卫和汪派这些投降论者——东奔西走的无聊政客，造谣生事的“学者论客”，他们是在人民的广泛的自觉潮流中想把历史往后面拉，使中国退回为被帝国主义宰割的肉，使中国人民退回为愚昧无知，任凭侮辱损害的人。但是自觉的中国人民与这种企图相反，要把历史往前推进，使抗战达到最后胜利，在抗战的胜利中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新中国正在苦难中生长着，两年的抗战中确是已见了新中国胎儿的雏型。我们有充分把握使新中国克底于成，为什么？因为我们已有了建立新中国的基本力量，这力量就是千千万万自觉的新的中国人。

“历史是人来创造的”！当社会发展向一新的时期去的时候，人



的积极力量常发生决定的作用。中国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从封建的囚笼中解放出来，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这必然的过程必须通过人民群众的斗争与努力而出现。从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入中国以后，中国人民开始自觉地挣扎起来了，一切革命者所努力的也就是唤起、教育、组织人民，那是一件多么艰苦的工程啊！但现在抗战的号声响起了，响应着这号声，人民的自觉如秋潮澎湃似地泛滥着，这就大大地缩短了新中国诞生的过程。

两年来的抗战已经使得中国的面貌大大地不同了。全国上下，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各种职业、各种宗教的人都不分彼此地团结统一到一个目标下面了！在政治经济上已渐渐脱离帝国主义的束缚，在内地建立了自力更生的据点；在军事上正在产生着新的军队，这种军队中的政治觉悟以及他们在民众中的印象是从来所没有的；甚至在敌人占领的区域及敌后方，我们仍确保着扩大和巩固的政权。……一位考察抗战中的中国的法国记者毛那说：“慢慢地，间歇地，但显然不能予以阻止地，这个久以东方病夫著称的中国，没有力量的中国，一盘散沙的中国，如今居然逐渐变成真的新式国家了”（见《新华日报》1938年12月14日）。而这“新式的国家”，其所以被目为“新式”，能成为“新式”，基本理由就在于它是依靠着广大民众的。要证明这一点，最好来看一看在敌后方建立的政权。譬如在晋察冀边区，试想，那是在敌人不断的包围进攻之下的地域，而在过去因其界于三省之间，一切政令都没有统一的办法，在这里匆促地建立起来的新政权，是怎样地解决一切重要的问题呢？像怎样使武装力量足够，怎样在敌军的近邻无孔不入地发展自己的政权，怎样解决金融问题，怎样使粮食充足？这些问题实在都是最艰难的问题，但是他们都解决了。边区行政的负责人对此的答复是：他们依靠民众，一切政策的决定和执行，都通过民众的动员，政权



在民众的保护下成为最巩固的。(见《从战斗中壮大的晋冀察边区》)

对于投降论者,民众是不会给以任何支持,他们不能依靠民众,只能从民众中间逃走出去!而民众则将紧紧地保护着抗战建国的政权,保护着民族的利益!

两年抗战的血的历史告诉我们,既已产生了千百万自觉的民众,则一定能产生新的中国的。这新的中国,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要排除一切困难与挫折而在民众力量的支持下面生长出来!

最初刊载于1939年7月1日《读书月报》(重庆)
第1卷第6期。



平凡的英雄主义

我很喜欢罗曼·罗兰在其《密盖朗琪罗传》的绪言中所说的话：“我绝不会造成不可几及的英雄范型。我恨那懦怯的理想主义，它只教人不去注视人生的苦难与心灵的弱点。我们当和太容易被梦想与甘言所欺骗的民众说：英雄的谎言只是懦怯的表现，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便是注视世界的真面目，并且爱世界”。

这真是一个勇敢的宣白啊！作为近代思想界中的一巨人的罗曼·罗兰，其所以能从一个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而成为集体主义的赞助者，并为现代社会的一切进步事业的支持者，不也可以在这一段话里发现其根源了？

所谓懦怯的英雄是怎样的一种英雄？他们在脑子里构成一种最圆满的范型，然而他们永远不能几及，因为他们避开了现实。尼采的超人哲学，法西斯的英雄主义，在实质上却正如罗曼·罗兰说的是“懦怯的理想主义”。他们敢于注视现实而且爱现实。

真正的英雄，因为他是能深刻注视世界的真面目的，所以才能爱世界而努力去改造世界；又因为他是爱世界的，所以才能注视世界的真面目而并不跳到世界外面去做旁观者。

在我们的抗战中正在产生着无数新的英雄，这些英雄是真正的英雄。然而他们不是特殊的、崇高的、绝对的，而是人人可几及的。



诚然，我们今日可以听到许多从知识分子中来的嗟叹，他们嗟叹本身的缺陷、软弱，在生活与思想上无法解除的重重矛盾。我愿他们读一读罗曼·罗兰的话。罗曼·罗兰作三巨人传——《密盖朗琪罗传》是其中之一——就对这三巨人深刻地分析了其内部的弱点与矛盾，而罗曼·罗兰自己就是从矛盾上挣扎着，奋斗着出来的。我们固不愿被懦怯的理想所骗，也不须被苦难与弱点所压倒。苦难与弱点是每一个人生中都存在着的，不去注视它的才是怯懦者。

注视自己的弱点，并且注视世界的真面目，并且爱世界，这就是英雄。这可说是一种极平凡的英雄主义，然而真实的英雄本是平凡的英雄！

最初刊载于1939年8月1日《读书月报》(重庆)
第1卷第7期，署名绳。



认识中国

老实说，一向中国人对于中国是理解得太少了。在中国学校里，本国历史、本国地理就不算重要的功课，也不大为同学们所注意。

抗战促起了多数中国人的自觉，同时也迫使大家对自己的国家有更多的认识。许多知识青年跑到了农村中，跑到了一向被目为遥远不可及的边疆，跑到了军队里，跑到了各级政治机构中，跑进了实际的战斗中，跑进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这就大大地扩大了我们的视界，能从更多方面来认识中国。

然而假如只是眼睛零碎地看到了一些事实，这种认识还是不够的，更要能经过脑子来加以分析、综合，这就要靠理论的帮助了。

然而假如只是学了些空的理论，吸收了一些在理论上已有的结论，那也还是不行的。譬如大家都知道，抗战以来，在中国社会关系中有了些新的变化与新的结合，而且大概还能一般地指出一些这种新的变化与结合的主要特点。但是直到今日为止，我们对这些特点还不能有系统的实际材料来加以充实，因而对于抗战以来中国内部的一切变化，我们的认识还是不充分的。

学习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实际地观察社会各部门的情形，这是为了认识我们的中国，个个中国人所应该做的，而不是专门研究的学者的事。

自然，我们不能实际地看到全中国一切方面的事情，但是从我



们自身的周围,也可以看到许多重要的东西。

假如你是在农村中,你可以详细地看一看,由于壮丁的出征,农村劳动力的减少,农村关系发生了些什么变化?或者由于外乡难民的大批来到,农村中又发生了些什么新的情形?这些难民在农村中占了什么位置?战事的发生在农民意识中的反映是如何?农村中的宣传对于农民的意识到底起了些什么作用?这些都是对于理解抗战中中国的变化和将来中国的前途相当有关系的。自然,你所实际看到的还只是局部,不能即从中抽出一般的可靠的结论来,但是这种局部认识的总和将使真正可靠的判断产生。

民族工业在抗战中的变化发展是大家都关心的事。假如你是在一个工厂里服务,你在细心观察中一定可以得到些有用的材料。抗战中军队也在起着质的变化了,在军队中工作的你应该发现,一向是职业化的军队因许多刚脱离生产的新兵的参加,发生着一些什么变化?

只要你真正用心考察,一定能从你所处的环境中发现些实际的材料,收集到一些有意义的数字。甚至你即使在学校中读书,你假如能知道同学们的出生的社会层,观察他们的生活倾向的变迁,学习兴趣的转换,你也是在实际地研究了抗战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了。因为知识分子的变化也是抗战中的中国的变化的重要的一面呢。

对于实际事情的考察是你学习如何运用理论的好方法,同时也充实了你对于抗战中的中国的认识。假如你把考察之所得,把一些具体的事实与数字写出来,提供给大家,也未始不是极有意义的贡献。

最初刊载于1939年8月1日《读书月报》(重庆)
第1卷第7期,署名禹。



学习鲁迅的文体

学习鲁迅先生是纪念鲁迅先生的最好办法。从鲁迅先生的为人与治学中间,的确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在这里我们只愿提出一点,就是学习鲁迅先生的文体。

鲁迅先生的文体以精炼锋利为特色,这种文体的最具体的表现便是“鲁迅的杂文”,这是中国近代文学中的奇宝,不但“一时无二”,而且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只能说“后无来者”。

然而我们必须学习它。

一定的文体必然地基础于一定的内容上。鲁迅先生之所以能锻炼出那样的文体,是由于他对于现实的深刻而周密的洞察力,因而他能从小见大,由偏窥全;是由于他对于黑暗与丑恶的绝不调和的态度,因而他毫不放松地用一切可能方式予以抨击;是由于他对于光明与前途的信心与热诚,因而他愈到晚年,在对黑暗的抨击中愈是表现得生气勃勃;是由于他有广博的学识而不衒学,因而他能随意取材,左右逢源……倘不从这些基本点上学起,而只是形式地学习鲁迅的用字用语和文章法式等等,那是无论如何学习不到鲁迅文体的。

今天我们不需要鲁迅式的杂文么? 还是需要的,而且太需要了。敌寇的一切阴谋毒计,和国际间的许多伪绅士的种种卑劣行为,我们要加以暴露;公开的与隐藏的汉奸的丑恶的行动,我们要



加以打击；在抗战中所表现的一切自私、顽固、贪婪、麻木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我们要加以揭破；在进步中的退步现象，在统一中的磨擦现象，我们要加以针砭。于此，鲁迅式的杂文将能起最大的战斗的效果。

而且鲁迅式的杂文并不仅是讽刺的工具。鲁迅先生使用他的工具，也作辛辣的讽刺，也作光明的颂赞，也作战斗的鼓励，也作热烈的批评。凡是所作都能得到最高的效果。倘仅学着说几句俏皮话，冷嘲热讽一通，那决不是鲁迅的学生。

学习鲁迅的文体又不仅是从杂文中学习。鲁迅先生的杂文集中其实有许多极好的论文，像关于民族主义文学的论文，关于中国文坛现状的论文、新文学大系的导言等等。那些论文是写得如何地细致、生动，近人情。是迫着读者不能不读下去，而且不能不心服的。这些论文中没有空洞抽象的话，没有学者的衙弄，没有陈腐的八股，这是真正中国化的文体。

为了消灭八股，争取学术的中国化，鲁迅的文体是必须学习的！

最初刊载于1939年11月1日《读书月报》(重庆)
第1卷第9期，署名绳。



夜读散记（十三则）

笛卡尔的方法论

笛卡尔(R. Descartes 1596—1650)的哲学,虽然与唯物论的距离比培根、斯宾诺莎还要远得多,但他的确是西欧近代资产阶级兴起时,在思想上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实行了斗争的一个哲学家。不过这种斗争并非最坚强的而已。不是最坚强的斗争,这点就使得其在思想上所达到的终点是二元论,而出发点则只是怀疑。

《方法论》(Discourse on the Method)如他自己所述,是“叙述在我努力地来运用我的理智时,我曾经采用过什么途径”。从这本论文里,我们可以读到笛卡尔怎样在传统学习的过程中发生了疑虑与不安,于是退而求诸自己的“理性”,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来。这里有很多有趣味的叙述。

笛卡尔说:“我知道(学校中所授的)哲学可以供给人们一种手段,好在谈论各种题目时,带出真理的外貌来,而使头脑较为简单的发生羡慕。”

又说:“我感到,在普通人的推论中比在学者的推论中,我可以找到较多的真理。因为普通人的推论,是参考着与自己有切身利益的事情的,而且如果他判断错了,结果当下会对他不利的。反之,在那些学者们,他们只关心于不切实际而徒逞玄想的事情上,而且结



果或者亦没有多大危险，只是结论愈离得常识远些，愈能培植他的虚荣心罢了。因为要议论绝俗，他们必须费较大的机智同艺术，使得他们的结论看起来可能些才行”。这真是绝妙的议论。

同样有意义的是下面这段话：“一到我的年纪可以脱离教师的管理时，我便完全弃绝了文字的研究，并且决意不再探讨别的科学，而专致力于自己底知识，或是说，致力于世界上那本大书。”可惜的是，笛卡尔虽说是“致力于世界上那本大书”，其结果却又回到“冥思”与“遐想”，达到了“我思故我在”的论点。但是“脱离教师们的管理，致力于世界上那本大书”，实是对于千载学子的极好的指示。诚能真正做到，则自然能够如笛卡尔所说的：“说到那些假科学，我想我是充分知道它们的价值的，所以虽有炼金家的招摇，星相家的预言，魔术家的欺骗，虽有一些本无知识而冒充有知识的人来设骗计，来行夸张，我是足可以逃了他们的欺骗的”。

对于真科学与假科学的鉴别，笛卡尔以为还是要靠他的心智的光，而在我们，则是坚决地要靠“世界上那本大书”。

反 复 古 论

一个民族在进步发展的路上时，一定要坚决地反对复古，我们在世界思想史上可以找到无数关于反对复古的议论，16—17世纪间的培根(F. Bacon 1561—1626)在其名著《新工具》中也有一段精辟的议论。

培根说：一般人对“古老”这两字的意义都弄错了，“古老是指年龄而言的，那么古老的资格，只能属于我们这时代，不能属于古人所生的那个世界底初期”。“我们既因为老年人经验繁多，思想复杂，舍了青年而向他去求得较广的人事知识，和较成熟的判断，因



此我们这时代,如果它能知道自己底力量,并且能试验自己底力量,能实施自己底力量,则我们期望于它的,一定比期望于古代者大,因为已经是世界底较高年龄了,已经满贮了无限的实验与观察了”。

假如用尊老的理由来尊古,那倒的确是应尊今的,因为今日世界比古代世界是更“老”一点的。

鲁迅在1907年也有一段话论及古与今的,其言曰:“夫国民发展,功虽有在于怀古,然其怀也,思理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摩罗诗力说》)

这两段话都反对复古,但也并不抹煞“古”。因为尊重现在,并对今后的开展抱着信心,因此一面不妨“时时反顾”,但重要的还是要“时时上征”以“进光明之长途”,而使新者日新。一面不妨从过去人类历史中吸收“无限的实验与观察”,但重要的还是要“知道自己底力量……实施自己底力量”。

“民心可用”

蒋廷黻先生著《中国近代史大纲》,谈到鸦片战争时候中英纠纷时,引出了朝廷给两广总督徐广缙的上谕:“疆寄重在民心,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又引林则徐答复徐广缙问“驭夷之法”的话:“民心可用”,接着就说:“道光上谕和林则徐的回答,都是士大夫阶级的高调和空谈,以民心对外人的炮火当然是自杀。民心固不可失,可是一般人民懂得什么国际关系?”(第28页)向来谈历史的都得到过共同的结论:一种依靠着民众的力量,为民众所拥护与欢迎的力量常能成功,反之无不失败,而蒋先生在鸦片战争中却得到



了另一个教训，这是很有趣味的问题。

读鸦片战争史料，可以知道，当时清廷口口声声嚷着“得民心”，但是它并没有得到民众的帮助来解决外患，士大夫群虽也口口声声地嚷着“得民心”，但是“夷炮”一来也只能弃城而逃，狼狈不堪。然而更细心地分析一下史料，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其实只是在口头嚷着得民心，而并未真正的从实际上去求民心。在鸦片战争中广州失陷后，广东臬司王廷兰在与友人信中说：“国家承平已久，民不知兵，官不知兵，即兵亦不自知其为兵”。结果弄到大敌即在城外，而军队反在城内劫掠百姓，在这种情形下，还能得到什么“民心”呢？

然而民众真的没有力量么？在鸦片战争的史料中，也有一部分可以对这问题作否定的答复。固然在鸦片战争发生以前，沿海官吏只知贪污聚敛，收贿运烟，以至完全失掉民心，而战争起后，也未给民众以适当的组织，同时，英美又四布流言，以为与官为仇，绝不向民加害，于是“奸民贪其利，顽民受其愚”（亦见王廷兰信），民众并没有积极帮助战争，反而产生了许多汉奸。但是不久以后，英军入广州，大肆焚烧劫掠，这就引起广州市民的愤慨，发生了三元里的民众反英运动。据王廷兰信中所述，是：“初十日贼退出四方炮台，将取路泥城。三元里村众因其淫掠，愤极鸣锣，一时揭竿而起，联络103乡男妇数千人，围之数重。夷众仅千余，冒死突围而出，其毙百余人，又斩兵目二人，其余受伤无数。百姓虽有伤亡，然人众可恃，愈击愈多。”（王廷兰信转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第890—891页）诚然三元里民众绝不能如学者那样地懂得国际关系（这种学者其实在当时连在士大夫中间也找不出来的），但是他们至少是明白知道自己的切身利害的。

满清政府在鸦片战争的两年中，始终是和战不定，而且常一面



鲁莽地进兵，一面又偷偷地议和，它只是在作着战的打算时才想起了“民心”，而且即使在想到民心的时候，也只是空嚷一下就算完事，并没有能真正地把民心正确地发挥起来，使成为有组织的力量，那样的依靠民心当然是不能抵抗敌人的炮火的。然而这一点是不足以语当时的封建统治者与士大夫的，因为他们正是立足于对广大农民的压迫上面的，他们当然不愿意看见民力的真正发挥，而只是在企图利用一下的时候想到民心。然而存在着一时地利用的心理，却决不能真正得民心之用，那是可以断言的。

请看满清政权在鸦片战争以后，又以武力征服了太平天国的人民革命运动，它和人民一天天地更处于冰炭的关系。虽然士大夫对国际关系的知识一天天地更增加了，但是满清政权终于在“民心”的背离下而崩溃了。

禁 书

在欧洲历史中有许多关于查禁书报的有趣味的材料，这些材料很多是属于中世纪的，然而关于近代的也有。房龙叙述他在俄国革命前游历俄国时的情形说：“当时我所接到的外国报纸面上四分之一，都满涂着模糊的墨迹，其特别名称为鱼子酱(Caviar)，这墨迹下面的条目，都是关心人民的政府所不愿为其亲爱的子民入目的。当时全世界称这种监察是不可忍的黑暗时代的遗习。”（《思想解放史话》第188页）

恩格斯也记载过在十九世纪初叶的奥地利，“给予国民的精神食粮也都经过最审慎周密的选择，而在给予时又是尽量地吝啬。教育到处都在天主教教士手里。教士的首脑们像封建大地主一样，深以保存现有制度为有利。各大学是照这样子组织只许它们造就在



各种特殊学术部门或许能获得高深造诣的专门家，却无论如何不
让它去实行普及的自由的教育的教育，而后者则是别国的大学被人们期
望实施的。除了在匈牙利而外，奥地利几乎完全没有报纸，而匈牙
利的报纸则在帝国其他一切地方被禁止。……在奥地利周围各处的
边境上，凡是奥地利各邦与一文明国接境的地方，书报检查员的
警戒线总是与税关关员的警戒线相并立的，用以阻止任何外国书
报会偷偷进来——书报入境要经过两三次彻底细阅查明丝毫没有
沾染时代的恶精神才许放行。”（《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第40—41
页）

但是这种检查书报办法都难收效。在俄国人民间，一切秘密的
书报流行得既广而又快。而在奥地利，则在国外的莱比锡及各城市
中出版了许多论奥地利事的书籍和小册子。这些出版物在波希米
亚边境偷运了进去，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

在房龙的《思想解放史话》中还有一段极有趣的叙述：“罗马帝
国的最初一百年中，曾有塔西佗(Tacitus)宣言反对对于著作的迫
害，认为，这是‘为书籍登广告的愚事，否则这种书籍必不能引起任
何公共的注意。’禁书目录〔注〕证实了这话的不错。……在十七世
纪中，德国与荷兰善于进取的出版家总有专员驻在罗马，其责任即
在等候新出的删订书目。他们既得此种书目之后，随即交与专差，
尽速越过阿尔卑斯山，赶赴莱茵河流域，将此种有价值的信息传至
他们的店主，不稍迟误。于是德国与荷兰的印刷工场，就加工赶制，
将特别版本仓卒出版，售价极昂，并由书贩偷运至禁止该书的区域
内。”（第196页）

〔注〕15世纪中叶后书籍出版日多，罗马教廷成立特别法庭检查一切出版物，凡被
列入禁书目录的书，其著者与读者都要受严厉惩罚。



必然与偶然

历史的发展一方面贯串着脉络分明的线索，一方面又充满着许多不能预料的偶然事变。必然与偶然的联结与错综曾使许多人迷糊，然而英明的政治活动正表现于对这种错综形势的把握与认识，否则政治活动就无异于儿童之玩积木了。

下面这段话是深刻地对此作了一个基本的解释：“我们曾经只讲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准备，可是我们并不曾因此想说：专制制度只能受正确的包围或有组织的冲锋才会倒台。这样的观点是荒诞的信条主义，正是相反，专制制度将受一次自然掀起的爆发或不可逆料的政治纠纷（随时随地都有这种危险）底压迫倒台，这是完全可能的。而且用历史的眼光看来是更靠得住的。可是，无论哪个政党，如不想陷于冒险主义，则决不能把自己的活动建筑在这样的爆发和事变的希望上面。我们应当走自己的路，不断地进行自己有系统的工作，我们愈不靠望意外的事变，则我们愈有把握使任何的‘有历史意义的转变’都不能令我们仓皇失措”。（《从何着手》，《列宁选集》第3卷，第34页）这是在1901年对俄国革命而说的话。

从这一段话里正显示着，机械的必然论在政治活动上就表现为“荒诞的信条主义”，绝对的偶然论则表现为“冒险主义”。这一段话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走必然的路，去处理、顺应一切偶然。

抗战的发展也正是如此。从退守到进攻，从初期失败到最后胜利是历史的必然进程，但是这期间可以有許多偶然事变的爆发。死死守着一定的公式不行，专等待偶然事件的爆发也不行。前者或后者无论哪一种观点都将导引我们于绝望中去，到仓皇失措中去。



任何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总可以有許多突发事件,这些事件或多或少地具有着历史的意义。能沉着地应付它们的人也只有那些能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不断地进行自己有系统的工作”的人。

林 则 徐

在研究鸦片战争的时候,蒋廷黻先生在林则徐的身上看出了两个矛盾的人格:“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战百胜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国的古法。可惜奸臣琦善受了英人的贿赂,把他驱逐了。……林的奏章充满了他的自信心。……真的林则徐是渐渐的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他怕清议的指责,不敢公开的提倡。……”(蒋氏著《中国近代史大纲》第19—20页)

蒋先生说:后一林则徐才是真正的林则徐,而前一个主剿的林则徐是不是假的呢?他没有说;前一林则徐既是主剿的,后一林则徐是不是主和的呢?也没有说。

不过在我们看来,当鸦片战争刚发生时,当时中国所谓士大夫群中,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主剿的,而且是有自信心,这种自信心却是由于对“外洋事情”的茫然无知,从传统的民族自大心而来的。林则徐也是其中之一。但是战争一发生后,士大夫群中立刻分化。林则徐和其他少数人觉悟到事情不这样简单,应该力求自己的进步才真能“剿夷”。于是修炮买船,而的确英国人毕竟没有能从林则徐的手里抢去广州。另一部分人呢?则口里嚷着尊王攘夷,而实际上则已经在打算着“抚夷”了。而当时所谓抚夷呢?其实就是屈服投降的代名词,正如目前在抗战中,汪精卫之流拿和平做屈服投降



的代名词一样。

我看林则徐到底还是民族英雄。他主张战就主张到底，并没有叫饶，而且他在战争中的经验使他知道必须自己力求进步。蒋先生要我们不要崇拜前一个林则徐而要崇拜后一个林则徐，这也可说是对的。但我们崇拜他并不因为他曾经主和——事实上，他并没主和，他主张进步，主张战！

实在说来，我想蒋先生所说的林则徐的两个人格，并不见得是矛盾着的，而是在发展着的两个阶段。只因为他从战争中看到了中外强弱的悬殊，所以他主张进步。而另外一些人则由此而主张屈服妥协。蒋先生说：“主张抚夷的琦善、耆英诸人虽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的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而且他们无自信心，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同上，第21页）。这个评断似乎太忠厚了一点。这些“低调俱乐部”中的人物岂止宣传而已，而且实际干了出卖民族利益的事了。像琦善就是把林则徐参奏下野，而他一到广州接林任后就答应英人的割地赔款要求，并且尽撤林所设的防御工事，以致英军很快地占领了广州。蒋先生说他们是不足责的，但是蒋先生所给予他们的希望也太高了，难道主张屈服的人还会有什么自信心么？还会对民族有什么信心么？

幻想与真实

比沙勒夫有一段论幻想的话，他认为幻想假如不是远远跑到一切可能之外去，那并没有什么害处，这种幻想反而正是“在艺术科学和实际生活方面举行和彻底进行广大而劳苦的工作”的唯一的“刺激力”。比沙勒夫是在19世纪60年代俄国的一个带有虚无



主义色彩的文艺批评家。但我们却不能因他对于一般的政治思想所持态度，而轻视他在谈到幻想时所说的话。

一切从事实际的斗争的伟人都是抱有着可惊的幻想的。当中山先生被称为“孙大炮”的时候，正是因为他的幻想使当时在他周围的许多庸俗的人所不能了解。列宁还曾在《做什么》一书中特别引用了上记的比沙勒夫的这一段话（《列宁选集》第3卷，第240页）这时（1920年），俄国的革命力量还在萌芽时期，列宁却充满热情地说着怎样建立庞大而灵活的革命组织，预计着“在不久的将来”革命事业的大规模发动与全面的胜利，并且说：“这便是我们应当幻想的东西”，于是他就借用了比沙勒夫的话来驳斥那些只知道狭隘的地方工作，局部的经济斗争，而不敢、也不能展望革命的远景的人们。而在另一个地方，列宁甚至说：“在革命前夜，他（指革命者）不仅要指出革命‘最不好的结果’。不，他同样要指出好的结果之可能性，他要幻想，如果他不是毫无希望的庸夫，他必须幻想。……”（《列宁选集》第5卷，第50页）

革命者作现实的斗争是为了创造光明的将来。固然在现实中已存在着将来的发展的初端，但是将来并不是以具体而微的形态埋伏在现在中的，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牢牢地注视着现实，同时也要毫不放松地展望着将来。对将来的展望正是现实的斗争的推动力量。只有市侩，只有腐败没落者才完全丧失幻想的能力，或者只有梦想的能力，唯物论者并不排斥幻想，只是他的幻想不“跑到什么事变底自然进程都跑不到的地方去”！

关于此，恩格斯有一段话也值得引用。1885年士达克博士批评费尔巴哈时说，因为费尔巴哈相信人类的进步，并且热忱于怜悯爱情以及真理和正义，而这种热忱正是“心的力量”，所以——士达克认为——费尔巴哈就在这方面显示了他其实是唯心论者。恩格



斯在论费尔巴哈时驳斥这种看法，他说，士达克是在费尔巴哈不是唯心论者的范围内去寻求他的唯心论，因为外界对于人的影响常先及于人的头脑中，而人的行为亦必先经过人的头脑，这都是事实上所必然的，所以“如果一个人追随‘心潮’的发展并承认‘心力’的影响”，并不就证明他是唯心论者。恩格斯最后以这一段话作了有力的说明：“认为人类是遵循进步的路线前进……这个信心对于唯物论和唯心论的争辩绝对没有关系。法国的唯物论者与同时人伏尔泰和卢骚等自然神论者一样都有这个信心。他们的信心，而且差不多要到幻想的程度。他们个人而且屡次要为这个信心而大大的牺牲。如果有一个人为追求‘真理和正义的热忱’而牺牲自己的生命，那就是狄德罗(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唯物论者)”。

直到现在，恐怕还有人在企图把唯物论曲解成一种冷酷的、死板板的世界观吧，然而这种曲解是无益的。因为唯物论并没有排斥一切“心的力量”，反而是只有从唯物论中才能引导出对将来的合理的幻想来，而且这种幻想激发起工作与斗争的最高的热情。这种热情是进步发展的一种动力。

奇怪的逻辑

奇怪的逻辑常常表现于轮回式的论证中。

笛卡儿在其整个哲学体系中是把上帝(God)的存在当做一个很重要的落脚点的，因此他要努力去证明神确是存在的。在他著的《沉思集》(Meditation on the First Philosophy)书端的献给巴黎神学院中的诸位先生的小引中说：“我们知道上帝底存在实在是可信的，因为圣经是如此说的。在另一方面，圣经实在是可信的，因为它是由上帝来的”(关琪桐译本第4页)。但是，作为哲学家的笛卡儿



对于这种过分朴素的信仰主义的说法当然是不满意的，因此他接下去就说：“虽然如此，但是我们不能向无神论者拿出这些论证，因为他们会以为这是一种循环推论”。于是笛卡儿自称要根据“自然的理性”来证明上帝之存在。

然而笛卡儿的关于神的论证和那种以圣经与上帝相互证明的说法在逻辑上，还是陷于同样的境遇。他的推论大致是如此：

他首先认定，要建立正确的思想的体系，一定要先从对一切的怀疑下手。他发现一切旁人所认为确定的事理和感觉所供给的知识都是可怀疑的，都不可靠，而唯一可靠的，真的，只有那我们在意念中能一念之下，就清晰认识的东西（注意，这是一个假设，这个假设要在最后才能被证明）。而这种可靠的真理，笛卡儿说，第一个就是“我思，故我在”。因为我们尽可怀疑一切，但对于怀疑者自身总不能怀疑，因此我的存在，这是一个自明的真理。既然我是存在的，但我（我的思）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就一定有一个最完满的最初根源。这种根源就是神，因此神的存在也是不能怀疑的。既然神是存在的，而且是最完满的存在，是我们的思想中的一切的根源，那么他就一定不会欺骗我们，我们所明白清晰想到的东西是神所赋予的，所以都是真的。——推论中最后的到达点就又重新去证实了开始点。因此 Levy-Bruhl 批评笛卡儿哲学时也说：“这岂不是一个三段论证的圆圈？假使最明白论证需要神的保障，那么什么又来保证神的存在的论证？”（彭基相译《法国哲学史》第 10 页）这和圣经的可信是由上帝来保证，而上帝的存在仍不能不借圣经来保证一样。

Levy-Bruhl 说得好“不论笛卡儿证明神之存在的三段论证式是怎样，但这种证明与其说是根据于形式的推理，毋宁说是根据于直觉”。（同上）一切论证假如不是从对于客观现实的深刻剖析中出



发,而肇始于直觉中的认识,则其逻辑形式也一定表现为混乱的、模糊的。逻辑本不只是思想的外形式与规律的问题,而是直接由思想的内容所派生的。假如所努力的只在于企图确证上帝,绝对道德观念,绝对的法律等等空虚的东西,则其推理形式当然也不能是正确的了。

在今日中国的论坛上,也有着许多莫明其妙的道理在宣传着。既然他们所宣传的是莫明其妙的道理,则其论证的逻辑形式当然也是莫明其妙的了。类似于上帝与圣经互证的独断的论调也未始不存在,在给予这些论调以批评时,要注意其内容,同时也应注意它们的逻辑形式,有时是只要指出这种逻辑的荒唐已足够命中要害的了。

异 教 徒

欧洲中世纪对异教徒的杀戮,构成一幅极其惨酷的图画。论者是常以在中国历史中没有这样的思想与信仰上的迫害为幸事的。好在这已是几百年前的事了,我们也不妨用一种看热闹的心情去看一下。

在中世纪的杀戮者与迫害者,正是在早年身受压迫的基督教。“基督教过了不久的时间,便忘记了宗教宽容的原则了,而这种原则是当他们备受早期的杀害之时,他们所曾经大声陈请的”(转引自 Gieseler《教会史》,第1卷)。而且这时他们所压迫的绝非当初压迫他们的人,他们的压迫的手段却比旧时压迫他们的更为“进步”了。在纪元后 385 年,诺斯派的比利斯伦(Prislian)是被基督教所杀的第一个异端者。到 11 世纪以后,这种杀戮与火刑更普遍了,而从 13 世纪起又陆续在各地成立了“宗教裁判所”,这是常被历史



家称为精神界的审判所的。

这种精神界的审判所，我们试代为当时的基督教会设想，倒似乎也是必要的。那些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异教徒，其实并没有什么邪怪的主张与行动，他们只是要把原来属于平民的基督教仍旧还之于平民而已。但这自然就和已成为拥有特权的神圣统治的教会、主教、教皇发生抵触，后者为了鉴别民间流行的各种宗教思想，研究为民众所欢迎的某些教义中所包含着的“危险性”，并找到适当的理由来判决它们是异端，而把信奉这种异端的人——置于极刑，这当然是需要一些“精神审判”的专家的。而且精神审判所的设立还有这样一种好处，就是在理论上讲，僧侣是不能令人流血的，而现在教会不过从“精神”上去判定某一个人，因为犯了异端的罪恶，应当被逐到世界以外去而已。至于杀戮的执行，则是让俗世的法庭去办理的。

对异教徒的迫害情形，那是尽人皆知的了。至于杀戮者所借口的理由与心情恐怕倒是更令我们发生兴趣的事。在 Max Beer 的《社会斗争通史》(叶启芳译)第 2 卷于此略有记载，值得摘录一点下来。

据说有 11 个异教徒是以“自由恋爱”的罪名而被投入火堆烧死的。还有许多异教徒则因为反对残杀生物——反对战争，反对杀人，甚至反对杀害牲畜，而自己遭受了残杀。最奇怪的是有一些异教徒被处绞刑，其罪名是不肯杀死雌的鸡雏。因为主张禁欲，甘愿过贫苦的生活而被监禁、被焚、被杀的人更是千千万万不计其数了。因此连一个最热心于捉拿异教徒的“圣者”也不得不老实说：

“假若你考问他们，你会晓得，没有一个人比之他们更表现真正基督教的精神。若说到他们的行事，则异教徒并无可以咎责之点，他们言行一致。纯洁派(一种异端的宗派)的信徒不骗人，不压



制人，不打人。他的面庞惨白，这是因斋戒的原故。他不食由懒惰而得来的面包，他以自己的手工作，供给自己”。（引自《社会斗争通史》第2卷，第128页）

很显然的，在这一切美德上，他们和基督教会中的教皇、主教以至僧侣是截然地相反，后者是已经成为生活腐败、糜烂、奢侈的特权者了。然而就是这种对比，恰好成为那些精神审判者得以明确地鉴别何者为应受惩戒的异教徒的极好标准。所以有一个裁判官如此说：

“异教徒，由他们的道德和言语便可以确认出来，因为他们是非常礼让的，他们生活于良好秩序的关系中，他们并不夸耀自己的衣裳，无论是贵重也好污秽也好。他们禁止发誓、谎语和欺骗，因为要避免这些罪恶，他们便永不从事贸易，只以手工为糊口术而已。制鞋匠就是他们的教师。他们不积藏珍宝，倘使得获必须的日用品，便很满足了。他们是纯雅而节制的。他们决不到酒店跳舞会和娱乐场所，他们严戒愤怒，工作不辍，自己研究，教导他人，他们也有少许祈祷文。从他们的礼让及言语之谨慎便可以认识他们，因为他们特别避免俚语、诽谤之言和轻浮无根的说话。”（同上，第172页）

宗教裁判所对异教徒的判词上一定是有许多说异教者是荒淫无度，破坏社会善良风俗与正常秩序的话吧，然而他们鉴别出异端者的方法则是用着相反的看法的。这种鉴别异端者的方法真是中世纪的僧侣们的不朽的贡献啊。

蜘蛛、蜜蜂和蚂蚁

《资本论》中论到劳动过程时，有一段有名的譬喻：



“我们所要研究的劳动形态是专属于人类的形态。蜘蛛的工作与织工的工作相类似，在蜂房的建筑上，蜜蜂的本事会使许多建筑师惭愧。使拙劣的建筑师比最巧妙的蜜蜂更优越的是建筑师从一开始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脑筋中把它构成。劳动过程终末时取得的结果，已经在劳动过程开始时，观念地存在于劳动者的表象中了。他不仅在所工作的自然物上引起一种形态变化，同时还在自然物中，表现他的目的”。（《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第117—128页）

蜜蜂与蜘蛛这两个工人，在培根的著作中也曾出现过，他还请了位蚂蚁来奉陪，他说：“历来研究科学的人不是单重实验的人，就是只重教条的人。单重实验的就如蚂蚁似的，他们只图采集来供实用。爱引推论的就如蜘蛛似的，他们只是恋着自己底材料织成网子。不过蜜蜂采取一种中道，它不但从田园的花朵中采集来物质，还要以自己底力量来变化他们，消化他们。哲学底真正职务亦正是这样的。因为它既不专凭人为底能力，亦不只从自然历史和实验中收集起材料来，照样保存于记忆中；它是把材料置于理解力中加以变化与消化的”。（《新工具》中译本，第19—91页）

这一段话当然是培根著作中的精彩的语句，至少从这里面，培根表明了他自己不是陷入单纯的经验主义中的人。

但是这里的缺点也还是很明显的。培根以为他反对了蚂蚁就拔出了经验论的泥足，正如反对了蜘蛛就把理性论的观点肃清了一样；然而他没有想到，人的劳动与蜜蜂的劳动还是有根本上的形态的差别的。仅是说：“把材料置于理解力中，加以变化与消化”，这还是没有把人的工作的特点完全揭示出来。

马克思把劳动定义为“人类的目的活动”，这就成为“从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的飞跃”的始点；而在培根，却只有“要征服自然必先服从自然”的命题。由此前一个说：“哲学家仅仅以各种的方式



解释世界，但最重要的还是改变世界”；而另一个则只是说：“哲学是把现实存在的材料置于理解力中，加以消化与变化”。

程万里的故事

偶然读《醒世恒言》，在其第19卷中看到一篇《白苦娘忍苦成父》的故事，很感兴趣。原文前有一首西江月词，不必照录，只看这样的一段说明：“这首西江月词是劝人力行忠义，扶植纲常，从古以来，荣华泡影，只有那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名传千古……”。可见其题旨实在是正大得很。故事的内容是说：

宋末有一官员名程万里，闻元兵日盛，献战守和三策而忤时宰，遂弃职单身出京都。路上被元朝元帅兀良哈歹部下的万户张猛（他自然是个降元的汉奸）所擒，被置于奴仆之列。不久之后张猛又把一个掳来的美貌女子配与程为妻，“程万里感张万户之功德，一切干办公事，加倍用心，甚得其欢”，但又“想起功名未遂，流落异国，身为下贱，玷宗辱祖，可不忠孝两亏，遂思乘虚逃回”。年余后张万户派程乃另一仆人至鄂州送礼给兀良哈歹元帅，这自然是程万里逃走的好机会。既至鄂州，“程万里送礼已过，思量要走，却又思想道，大丈夫作事，须要来去明白，原向帅府候了回书”，自己也写了封信，偷偷地一起收在卧病在饭店中的同来的仆人的包裹中，就往宋朝地面去了……

我们来看看这一个程万里留下给张万户的信是怎样写的：

门下贱役程万里，奉书恩主老爷台下，万里向蒙不杀之恩，收为厮养，委以腹心，人非草木，岂不知感。但闻越鸟南栖，狐死首丘，万里亲戚坟墓，都在南朝，早暮思想，食不甘味。意欲稟知恩相，乞假归省，诚恐不许，以此斗胆辄行。在恩相幕从如云，



岂少一走卒，放某还乡，如放一鸽耳。大恩未报，刻刻于怀，衔环结草，生死不负。

这故事当然未必是实事，而是明代的说书人编造的。但由此可以看出至少在明代，道德观念是用了怎样的形式在民间传播着的。

传统的道德观念中有一个“义”字，又有一个“忠”字，程万里世代受宋禄，当然应忠于宋，却又因为受张万户“不杀之恩”，又被偶以佳人，则忘恩就是负义了。至于张万户是个不忠的人，是个汉奸，这点在说书人却是不加注意的。依照抽象的“义”的标准，则无论对方是怎样的人，他施恩是为了什么目的，既受恩就该报，所以程万里这样地做，写这样的信，正不失为堂堂的“大丈夫”，是可以为表率。

或许在明朝说书人看来，张万户也并非不忠之人，虽然原文中说他“昔年在乡里间豪横，守将知得他名头，放在部下为偏裨之职。后来元兵犯境，杀了守将，叛归元朝。元主以其有献城之功封为万户，拨在兀良哈歹部向导，屡立战功”。却亦并无贬词。至于被颂为大丈夫、英雄的程万里呢，他回到宋朝，20余年间，“已做到闽中安抚使之职”。原书中说：“那时宋朝气数已尽，被元世祖直捣江南，如入无人之境。逼得宋末帝奔入广东崖山海岛中驻蹕。止有八闽全省，未经兵灾，然亦弹丸之地料难抵敌，行省官不忍百姓罹于涂炭，商议将图籍版舆与，上奏书归元主。元主将全省官俱加三级，程万里升为陕西行省参知政事”。这就是说，程万里也叛归元朝，成为“贰臣”了。——然而程万里虽然这样也还是“忠臣”，因为他这时是忠于元朝了。所以书中又说他后来“直加衔平章，封唐国公，白氏（就是以前张万户所派给他的妻子）封一品夫人，二子亦为显官”，而加以歌颂。



这些就是这一段书中的一部分的情节。也许有人说，这只是市井俚语，不足据以立论。但是一种道德观念，既已被抽象化了，则其结果必然会表现为这样的支离破碎的形式的，——这是由逻辑和实践所能证明的。

把每一个道德标准抽象化了，也就是绝对化了，那么这些道德标准是必然要互相冲突起来的。明朝的说书人既要歌颂程万里之忠，却又称颂程万里对叛臣张万户之义。

而在这抽象道德标准实际使用起来，发生困难的时候，就不得不找一个比道德标准更高的原理出来。假如用客观的实际生活来做道德标准的检验，那就根本破坏了道德标准的抽象性、绝对性。假如坚持维持这种抽象性，那就只好捧出“天理”来了。所以程万里先可忠于宋，后又可忠于元，原因是宋朝的“气数”已尽了，理当元朝入主中国。

表现在这一篇明朝的《话本》中抽象的道德观，在当时明朝的统治者看起来，自是有利的，因为这样就把臣下对于他应该忠，应该不忘恩，绝对化起来了。但是到了满洲人兴兵来夺天下的时候，这一套抽象的道德观念也就被他们夺去了。到这时，明室的统治者或许会想到，用那一套抽象的道德观去灌输给人民是并非最好的办法吧。但是，当他生为统治者的时候，却无论如何不愿告诉人民，忠不是绝对的，有时应该忠，有时不忠也并不坏；义也不是绝对的，有时应该义，有时不义也并不错。

言语与情绪

我想，假如一个平庸的表演者以千言万语的叙述来传达出一种情绪的高涨，那么，一个有才能的演员只要用几秒钟的沉默，就



能把这种情绪更充分地传达出来了，因为可以用言语表达出来的情绪总还不是情绪的最高点，情绪发展到最高点就没有言语了。

关于这一点，法国人蒙田(Montaigne)曾经讲得很好。他在一篇题名为《论悲哀》的文章(见《世界文库》第7集，第3004—3007页)上举了许多例子来证明悲哀的极致就是无表情、无言语。下面这故事就是这些例子中的一个：“福尔定南王在卜特与匈牙利王底孛后作战。德国底拉衣思纪将军看见从战场上抬回来一个骑士，这骑士大家都亲眼见他在阵上显出异常的勇武的，跟着大众为他叹息，同大众一起要认出他是谁，等到脱掉他的盔甲的时候，却看见是他自己的儿子。在震天动地的哭声中，他独自不声不响兀立着，定睛凝望着那尸首，直到极量的悲哀冰冻他生命底血液，使他僵死在地上。”

当然不但悲哀的情绪的表现是如此。在同一文中，蒙田还提到热烈的爱情与意外的狂喜也常表现为无言的状态。“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上半天”，就正是很好的写照。关于说到愤怒的情绪，我想也是同样的。岂不是我们常用“咬牙切齿”来描写愤怒的极点。而在咬牙切齿的时候，当然是没有什么言语的了。

因此，我想，假如有人以言语来向你表示愤怒与不满的情绪，那么你不必憎恨他。在这场合，最愚蠢的是，你去制止——假如你有权制止——他的言语。因为即便你制止了他的愤怒不满的言语，却不过是在无言中把他的愤怒与不满的情绪更加提高到极点了。

所以，要造成无言的局面总不是聪明的办法。

据蒙田的研究，无言的情绪甚至会自杀其身。像上述的福尔定南王就是如此。此外他还举了因欢喜而死的例子，像“教皇里雍第三得到他所日夜想望的攻下米兰城的消息，由狂喜而发烧而丧



命”。但是愤怒的情绪是否会杀了自己呢？或者也会吧，但更多的场合却是在无言的愤怒下实行武力的攻击。江南人在互相不和时常百端诟骂，但很少真打起来的；北方人骂得不多，但真动手了。这是很自然的，人们不用言语来表现其愤怒的时候，就只好用行动了。

所以，以为消灭言语就是消灭情绪，那实在是最愚蠢的打算。

信徒与敌人

看完了前面这一段以后，又随便翻开这一本书（《世界文库》第7集）的另一页——这是第2988页——一句有力量的话突然抓住了我。这句话是：

“一旦某宗教得势，必以其最初一班徒众为敌人”。

这句话是尼采说的。对于尼采的作品，我有时感到很大的兴趣，虽然我不会成为一个超人主义者。他的以重新估价的态度面对淑世的一切所下的批判确往往能有一针见血的力量，像上面这句话就是。虽然，曾经说过像这样的话的人，并不只是尼采一个。

尼采在这里主要是指着基督教。研究基督教史的常把原始的基督教与中世纪的和近代的基督教分别开来。恩格斯在《原始基督教史论》中说：“原始基督教历史与近代工人运动中间，有些显而易见的类似之点。基督教与工人运动一样，起初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基督教最初是奴隶、自由民、穷人、无权利的人，以及被罗马压制或离散的人民之宗教。基督教与工人社会主义二者宣传未来的解放，脱离奴役和贫困，但基督教要实现此解放在世外，在死后，在天上；社会主义则要实现此解放在人世间，在社会变革。二者都是被禁止的，被迫逐的”。（林超真译：《宗教哲学社会主义》，第3—4



页)。耶稣和他的使徒们实在是当时的平民革命运动中的领袖，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为了和平，而是为了动刀兵。”所以耶稣的最初的使徒们所过的生活是：“他们售去他们的财产，分给各人，其分给是按照着各人所需要而定”，“那么多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一切东西都是大家共用”。（见《使徒行传》第二章及第四章）但是到了中世纪，情形大大地不同了。因为这时基督教已经得势了，教会的财产也增加了，他们嘴里念着上帝，心里在崇奉着玛门，于是从下层民众中起来了一批反对者，他们主张禁欲克苦，主张一切人过平等的苦日子，一句话，他们向往于原始的基督教的理想。但是他们立刻被教会判为异端者。他们怎样被定罪和被惨酷地杀戮，我在《夜读散记》的《异教徒》中已经说过了。

这些异端者之所以成为基督教的敌人，无非是因为他们想做真正的耶稣的徒众而已。耶稣自己和耶稣的最初的使徒们倘若复活在中世纪，是也不免被教会视为敌人的吧？

然而遭逢这种命运的，也不只是基督教的创始者。

马克思的学说也曾在第二国际的领袖们的手里遭遇这种厄运。为了把这学说从这种厄运中拔出来，列宁在1916年说：“马克思的学说在今日的遭遇，正和许多被压迫阶级解放斗争中的领袖们和革命思想家们的学说，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的遭遇一样。大革命家常常毕生受着压迫阶级的虐待，他们的学说常常引起了压迫阶级切骨的痛恨、极端的仇视和疯狂似的造谣与中伤。当他们死了之后，人们便企图把他们奉为无害的神像，颂扬他们，表彰他们的名字（仅仅是名字而已！——绳），来‘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删除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这个学说的革命锋锐，糟塌这个学说”（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13卷，第9页）。因此，第三国际



虽自称继承马克思的主义，却把马克思的真正信徒视为敌人。

这些故事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最初刊载于1939年12月1日、1940年1月1日、2月1日、3月1日、4月1日、5月1日、6月1日《读书月报》(重庆)第1卷第10、11、12期，第2卷第1、2、3、4期，署名雍蒲足。



新年致词

我们迎接新年，我们迎接抗战的第四年，迎接 20 世纪的新的 40 年代。

你曾经在冬天的长夜中坐而待旦过么？你一定会体验到，当漫漫的黑夜渐渐地过去的时候，天色已经有一点似明非明，似暗非暗的气色，这时在脸上拂过的风特别地尖峭，特别地冷，窗外的树影也隐隐约约地似乎可以看见了，但它显得是特别地巨大，特别地可怕。这是光明与黑暗作着最后的搏斗的时候。当黑夜完全统治着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能看见，但在黎明之前，你可以看见许多了，虽然并不能看得清楚。你可以看见白天是如何苦痛地渐渐出现，它似乎是出现了一点，但又似乎立刻被黑夜所吞噬了去。同时你几乎可以看到整个的黑夜的影子，蠢然地像一个无比庞大的恶魔，它被迫着从嘴里吐出一些东西，但又依旧固执地继续去吞噬一切。……

在长夜中待旦的人都会感觉到，这是整个长夜中最难挨过的时候。但是你必须顽固执拗地度过这个时候。于是你可以听到远处的一声鸡啼，它虽然立即被埋在黑夜中去了，但是立即第二声、第三声鸡啼又起来了。于是你可以看到从那似明非明的气色中，似乎集中了一切力量射出了第一条光线，虽然它还是很微弱，但是它迅速地扩大了，强烈了。于是你可以看见黑夜拖着蹒跚的步子狼狈



地向存在以外的什么地方逃遁去了。

这时，你站到窗口让阳光温暖地拂拭你的面颊吧，整个的田野是显得那么明朗与新鲜，风吹过，也显得很安静，很清爽。或许你会愕然想道：“白天与黑夜何以有着这样判然的差别呢？”假如你把现在这一时刻当作白天开始的时候，无疑的是错误的，因为白天开始在黑夜中，开始在那光明与黑暗，日与夜抗衡争斗的时刻中……

中国人有所谓“守岁”的习俗，原意不知道是什么，但假如从守岁中来观察一下黑暗与光明交替的情形，那么他可以真正知道新年是怎样到来的，比鼾然一觉醒来便鞠躬作揖地恭贺新禧要有意得多。

是的，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什么心绪来“恭贺新禧”，虽然我们已经是过着抗战中的第三个新年了。但我们还是处于黎明到来以前的时刻中！

记得在五六年前，有一年的《东方杂志》的新年号中出了一个“新年的梦想”的特辑，撰稿者非常之多，各自在幻想的境界中建立起渺茫的光明来，那可算是在黑夜中的无根据的憧憬。但是今天我们已经用不着这种梦想了。因为黎明虽然还未来到，但是已经是黎明从黑暗中胎生出来的时候了。

在黑夜中，一切都看不见，于是只能把光明置于梦想之中。但是今日，我们已经清楚地看见黑暗的庞然的影子了，因为光明已经开始挣扎着出现了，虽然后者还为前者所支配，但是这毕竟已证明了，这是白天出现的前一刻！

我们必须认识新的光明开始在黑夜中，开始在黑夜与白天的搏斗中，这种搏斗中包含着苦痛，但也包含着欢喜——从这意义上，我们战斗着去迎接新的一年！不要为黑夜的依然浓厚而苦恼，因为黑夜已经露出其庞大的影子而作着最后的挣扎了。不要为白



天的迟迟到来而烦躁，因为白天的步伐虽然还迟缓，但它已坚定地渐渐出现了。我们要做那一声继一声地冲破黑夜的鸡啼，我们要做那第一条射出来的强烈光线中的一分子！

最初刊载于1940年1月1日《读书月报》(重庆)
第1卷第11期，署名绳。



论向前看与向后看

1917年2月革命以后，俄国陷于两个政权的纠纷局面中。临时政府阴谋着复辟，想葬送革命的整个成果，而革命阵营中也充塞着机会主义的倾向。在这时坚决地领导着革命到底的列宁丝毫也不动摇，他看出了在这混乱局面下正产生着一个俄国历史上从未有的新国家。他说：“我们的实际生活，革命，已在事实上在俄国创造了这个新的国家（虽然他现在还处在软弱的，萌芽的形式中），这种国家已不是原来意思上的那种国家了。”因此他大声喊道：“不要往后看，而要向前望。”（《列宁选集》第10卷，第111页）因为他能向前看，因此他勇敢地有把握地向当时一切的反动者宣战，而后者正是坚持着向后看的。

1923年，在中国，北洋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势力统治着全中国，正如孙中山先生在这时所说的，“中国自辛亥革命以至今日，已经过十二年矣，而国内之纠纷愈甚，且政治经济诸端，反呈退化现象。”（《中山丛书》第3卷，第133页）而“现在吾党有多少党员，实在甚少”（同上，第135页）。然而孙中山先生是否灰心丧气呢？没有，他号召国民党改组，号召党员在新的方法下继续努力，他说：“一年间或二年间将革命精神普遍于全国，则我国革命虽迟于俄国，而终是成功。”（同上，第139页）为什么他能这样积极勇敢呢？也正因为他能向前看。假如只是向后看，则不免只是看见失败、黑



暗,也就只能走到妥协的路上了,但是孙中山先生决不如此,因为“我是相信革命事业要三十年成功者,则二三次之失败算得什么?”因此他一步不懈地把革命推向前去!

向前看,还是向后看,这曾是分别革命者与反动者,斗争者与妥协者的一个严格的标准。

凡是执着地向后看,而不把眼光向前望去的人,一定是不能看见在革命中的新起的力量,更不能遥瞩到这种新起力量的膨胀发展,因此他们也就不能向前进步,相反的,却用一切反动的、妥协的、后退的、保持现状的办法,来阻止新起力量的前进。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揭破了帝国主义与军阀的罪恶,并且扫清了当时的各种妥协的无效的主张(如所谓“立宪派”,联省自治派,和平会议派,商人政府派等等),这些主张一般地都是向后看的,他们看不见革命政党所倚靠着的民众的新生力量,这种力量在当时也还是在“软弱的萌芽的形式”中。

在任何时代,我们都要坚决拒绝做向后看的人。在今日汪派汉奸,无论他们藏在何种形式下,是标本的向后看者。他们害怕在抗战中的一切进步,顽固地要把中国拉回到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的地位中去。因为在他们的经验中,这种半殖民地的地位对于他们是无所谓的,在半殖民地国家中他们还是可以做统治者、压迫者。

但是广大人民不会这样打算的。我们在抗战中已经打了两年半的时候,决不来讨论中国回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或是回到“九一八”以前的状态的问题。假如说,中国抗战是为了退回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则无异于承认在1937年秋天以前的中国的情形是天堂,但这天堂对于广大民众只是地狱中的地狱。广大民众对于过去的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中国情况还能有什么留恋呢?而且



我们所希望的也决不是 1931 年以前的状态，那难道是幸福的状态么？我们在抗战中所要争取的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幸福的新国家，这样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必须向前看，才能看到它！

坚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是一刻也不能放松的。在抗战未爆发前，向前看的人看到统一团结，向后看的人看到分裂内争。在抗战刚发生时，向后看的人看到了再战必亡，向前看的人看到了愈战愈强。在宪政问题上，向后看的人看到民众的愚昧，因而认为民众没有能力进行宪政；向前看的人则看到抗战中人民的觉醒与政治兴趣的日益提高，他们将比今日所能想象的更好地去过民主的生活，只要宪政真正设施。在整个世界局势上，向后看的人只看见帝国主义势力在全世界统治权之强大，向前看的人则看见全世界范围上的新的斗争，新的胜利，只有在后一观点上，人们才能看见新中国在这新世界上的前途。

为什么对于一件事物、一种形势，总是必然地会有两种观点——向前看与向后看的观点呢？

基本的原因是在这里：在发展中间每一时期都是在新旧的更替中，旧的事物在发展中间必然地要趋于灭亡，而由新的事物来代替。但是过程还不这样简单，并不是旧的生命结束了，新的生命才紧接着起来了，决没有这样的事。实际的发展要比这复杂得多。那就是：新的事物一定就产生在旧的事物之中，而在新的事物既起以后，必然地仍有残余的旧事物在内。这一点，是任何革命家，在深刻地分析了现实之后，决不加以否认的，而且正要揭发它出来，根据它来规定出战斗的方针。比如列宁——无可怀疑地，他是近代最伟大的革命家之一——在分析国家的发展时说：“在第一阶段或第一时期中，共产主义还不能达到经济上的完全成熟，亦不能完全脱离



资本主义的一切习俗和痕迹。因此我们看到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中仍保留着‘资产阶级式的权利和狭隘眼界’那种有趣的现象。”这决不是什么荒谬之谈，事实上后来苏联在社会主义的阶段（亦即上引文所说的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上的发展证实了这一点。“在实际上，旧物的残余留在新物之内的事实，无论在自然界或社会中，到处的实际生活都指示给我们看了。”（《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12卷，第133页）

新物从旧物中发展出来，旧物残留在新物之内，新物与旧物在斗争中发展——这种事实就给了各种“向后看”的观点以现实的与逻辑的根据。“向后看”的人就是无视孕育在旧物中的新物，就是在新物的发展中夸大旧物存在的意义，妄想把已趋死灭的东西发扬起来。因此就在统一团结的形势已经成为主体的时候企图把个别的分裂不团结的现象夸大起来，扩大起来，就在民众的觉醒已经把长时期的黑暗的历史生活所赋予的愚昧渐渐地克服了的时候，还想去顾到这种觉醒的事实。

因此，在实践上，向后看的观点就造成了退步，开倒车的行动，就是虐杀生机，阻遏进步。

因此，我们要坚决地反对向后看，要坚持向前看！

而由此也可以见得，所谓向前看，不是叫人茫然地看着将来，不是以对将来的无根据的美丽的梦想来蒙蔽现实。恰恰相反，向前看，是要从现实出发而向前看，是以向前看的观点来把握现实。

如上所述，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改组时，并不只是空想着将来的，他首先就看现实。他指出在当时的现实中，反革命的军阀力量是相对地超过了革命党的势力的，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就承认了反革命势力的不可动摇（这是向后看的观点），却看出了：这种军阀势力虽然有帝国主义撑腰，虽然有百万大军的支持，然而已渐渐地



向没落的路上走了。相反的，在革命方面虽然党员不多，但是革命势力是正在发展着，它可以，而且一定能渐渐地“普遍于全国”，正因为孙中山先生不是向后看而是向前看，因此他看到在此刻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对比形势，一定会在发展中互易其位，因此他才决定改组国民党，团结革命势力，向北洋军阀作无情的搏斗。

因此，向前看的观点就是叫人在新物从旧物中产生出来的时候，即使新物一时地还处于被旧物所压倒的形势下，就已经要毫不犹疑地重视新物，重视它的发展，并且倚靠着它。因为只有它才是有前途的，会在发展中压倒旧物，消灭旧物。而且向前看的观点又叫人在新物成立了的时候，还是不要无视残留在其中的旧物，要坚决地和它斗争，最后消灭它，使新物更顺利地成长起来。

在任何一个时期，在每一时，每一刻，我们都要坚持向前看的观点。

向后看的人显然是无出路的，因为他们是把自己依靠在已趋于死灭的东西上，他们终于要在费尽了一切挣扎以后而与旧物同归灭亡。只有向前看的观点才能使人积极乐观向上，善于向前看的人在任何苦难中，任何黑暗中，都能看到新的生机，进步的方向，光明的途程，而永远勇敢地迈步向前进行！

1940年1月15日夜

最初刊载于1940年1月20日《全民抗战周刊》
(重庆)第106期。



论发展的两个前途

西洋的形式逻辑教人以排中，中国的传统的处世哲学教人以折中，而我们既反对排中，也反对折中。排中是忽视了矛盾的相互移行，相互转化。折中是不了解矛盾在斗争中的发展前途，或是矛盾中的这一方面克服了那一方面，或是那一方面克服了这一方面，不能有中间的道路。

我们绝不因为拒绝了排中的思想而自陷于中庸的观念中。我们常常认定，在发展中终结只有两个前途，假如有中间的道路，那么这中间的道路也总不能不归属于这两个前途中的某一个。事物中所包含的矛盾的多样性（不是一种矛盾而是多种矛盾）也可以使发展前途不是两个而是更多的，但显然不能以此来作为在矛盾斗争中的折中主义的辩护词。

这种思想或许会被视为偏激。是的，服膺中庸之道的人是常把自己所不喜欢的思想与行动视为偏激的。假如从“执两而用中”的观点来看，那么这诚然是偏激的，但是偏激的并不就是错误的。

曾经有些知识分子悲观地坚持着中国必亡论，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这大概是种偏激的论调吧。那么反之，主张要打就要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这是不是另一种偏激呢？假如执两用中起来，那么我们也许会停留在这一种主张上：抗战到长城边也就够了，能保全山海关内的领土完整也就够了。“过犹不及”。啊！——



在这里，真理是属于谁呢？属于这种“中”的思想呢？还是属于第二种“偏激”思想呢？

问题在这里：中日间的矛盾已经在发展中达到这样的地步，就是非以谁战胜谁来解决这个矛盾为出路不可了。或者是日本灭亡中国，或者是中国的独立解放。中间的道路有没有呢？不可能有的。当汪精卫及其党羽出走时，未始不存心想走中间的道路。但是就在那时候，蒋委员长已经指出，假如放弃了战胜日本而获得民族的独立解放这一个前途，那么不可避免的一定会上另一个极端地相反的前途，就是让日本来灭亡中国。《日支调整关系要纲》的揭露，证明了这种判断完全是正确的。

谁若不能清楚地认识这两个判然相异的前途，谁就——无论他愿意或不愿意——跌进那最坏的前途中去。

想走中间的道路的还有一个例子，那就是叶名琛，他以不战不和、不守不降来对付英法联军。他假如要战，就该像在他以前17年，林则徐守广州时那样的拿出一套积极的办法来。他既然想在战与和、守与降之间找出路，其结果却还是和而且降了。

发展中的两个前途是基础于矛盾中的两方面，所以结果是哪一个前途实现，则要由矛盾两方面的相互斗争来决定。——“斗争是万物之父，万物之王”！

表现在中日民族间的斗争，表现到中国国内，就是和与战的两种势力的斗争。这种斗争曾经只是隐藏的斗争而为许多人所否认，但是到了汪逆及其党羽逃走出去，在他们的出版物中“丑表功”地说明他们一向隐藏在抗战阵营中如何进行着破坏抗战的努力的时候，这种斗争便成为公开的斗争了。抗战发生，而且坚持下来，是由于抗战的势力经常地克服着妥协的努力。而要抗战到底，就必须继续地坚持着去和任何“妥协”的企图作残酷的斗争。



在中国民族中，妥协与胜利这两个阵营已经一天天地划分得更加清楚了。在一个阵营的门上大书着“日支调整关系要纲”，在另一个阵营的门上大书着“独立自由解放”，谁离开这一个阵营，谁就不能不走入另一个阵营中去。假如在断然有所择定之前，还可以有一个徘徊迟疑的时期的话，那么这个时期已经是一天天地更加短促了。

假如有人以为，可以在抗战到底以前妥协，而无须到“调整要纲”的阵营中去，那就错了，因为《调整要纲》中所列各项实在是日本帝国主义天公地道应该向妥协者提出来的。同样的，假如有人以为可以进入抗战的阵营中，而无须去舞动在这阵营中陈列着的各种武器：团结，民主，进步……那也错了。要抗战而不要团结，要抗战而不要民主，要抗战而不要进步，这正如要领土主权之完整而不要抗战一样，这种中立的地位已经不能存在了。假如有人坚持不要这些东西的话，那么也有一个适当的地位可以给他们立足，那就是在日支调整要纲的阵营的辕门之下。

假如汪精卫之流在一年前的出走并不是对于抗战有害，而从排斥渣滓的观点上看，是有利的，那么如上所说的这种壁垒森严的对峙形势并没有害处。这使我们看清了发展中两个前途——非存即亡，并且知道了我们应该怎样做。我们要走向独立自由，而且我们相信一定能够得到这一个前途的，因此我们就要努力地、毫不容情地去克服另一个前途、另一个阵营，而且要同样努力地去克服一切徘徊中道的企图，因为我们不相信有一个中间的出路，中间的前途常常不过是最坏的前途的化妆。

要和一切想立足于抗战到底和调整要纲之间的折中论、调和主义者作坚决的斗争！

明末的东林学派曾反对“中”的主张。顾宪成氏明白地说，他最



怕见中字，他认为：好为中行者其结果每每堕入乡愿的窠臼，而其原因就是他们在“起脚便要做歇脚事”。这是颇为深刻的话。岂不正是因为一念及抗战发展下去，自己和自己这一集团的地位、权利等等，汪精卫之流才扭扭捏捏地避开抗战到底这一极端，而终于堂而皇之地当了汉奸么？“乡愿，德之贼也”。在学问上的“中道”，一到政治实践上其结果是更加危险得多的。

在两个阵营的对立斗争更加尖锐的时候，一切好心的中立者，请把眼光放得更远大一点吧！要知道，只有残酷地斩灭坏的前途，好的前途才能顺利地实现的。同时，也只有忠实地向好的前途走，和一切同路者亲密合作，才能根本断绝与坏的前途的联结。

关于此，历史给了我们太多的证明了。当 1871 年俾斯麦的侵略武力已经迫近巴黎的时候，法国的大资产阶级既想保全巴黎，又想不去和巴黎的武装起来的工人合作，结果他们终于退出了巴黎，在凡尔赛结合了自己的力量向俾斯麦乞和，同时向巴黎公社进攻，在这一进攻中俾斯麦实在是他们的后台老板。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三个阵营还是两个阵营呢？是两个阵营！

1848 年德国革命中产生出来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是想在激烈的斗争之中保持中间地位的可怜的模样。它不使自己和革命民众联结起来，同时又把自己做得仿佛是和封建官僚对立着的。它很艰难地维持着这种地位，终于把政权交还给封建官僚而自己毁灭了。人们很有理由从这种历史教训中得到这样的结论：“即令是在革命剧最初开演的时候，除非是依赖于民众的和更进步的政党之援助，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就不能牢守阵地去反对那已被击败但未被摧毁的封建的官僚的政党；同时为了对抗这些更进步的大众的激流，它也同样地需要封建贵族和官僚阶级的援助。”在西欧，这种自由资产阶级的中立地位是跟着 1793 年法国大革命的去而早



被毁灭了的。

无论从当前的政治实践中,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我们总不能不把发展的前途归着于两个方向,而以发展方向为标准,把斗争力量终结地归列为两个阵营。假如好心的中立者以为斗争的尖锐化将阻止进步的发展,那么,我们恰恰要说,不坚决走进步的路,就是向反动者让步,结果正是妨害了好的前途。

1940年2月13日

最初刊载于1940年2月13日《全民抗战周刊》
(重庆)第110期。



二 月 偶 记

按照中国的旧习惯，新年一到，就算是新春了。虽然现在大家照着太阳历法过年，但还是新年一过，就说着新春的话。实际上是到了现在——2月里，才可算是渐渐地进入1940年的春天了。

人们是多么喜欢春天啊。喜欢春天的心情正表现了人们喜欢蓬勃发扬进步的心情。从肃杀沉寂死灭暗淡的自然环境中，走入了花开草长莺飞的境地，是不能不感到欣悦欢快的。因此诗人在冬天到来的时候，就已经歌咏着“春天还会远么”的句子了。虽然在春天已经到来的时候，也曾有诗人歌唱着“春天里的秋天”的句子，这也是当然的。因为人们乐于歌颂自然的春天，同时又更乐于歌颂社会的春天。假如社会的季节不能像自然的季节那样顺利转变，当然不免在春天到来的时候要有秋天的感觉了。

韩愈曾说过“以鸟鸣春”这样的话，他是用这话来说明“物不平则鸣”的意思，曾有人责备这句话不通。更聪明的说法是欧洲人的谚语：“一个燕子带不来春天”，因为春天是由于无数燕子所创造出来的。让我们也作一个诗人的幻想吧：假如没有千万个鸟儿，那么自然界的春天也不会从霜雪中间冲破出来的吧？从这种诗人的幻想看去，韩愈的话也不为无理。请看吧，千万个鸟儿在霜雪重压下感到了不平，它们挣扎着，鸣叫着，以千万个声音集成一个声音，唤起了蓬勃发扬进步的春天，这是多么伟大的景象呵！



自然界的春天是这样到来的，社会的春天也只有这样，才能到来！

我们跨入了1940年的春天。我们歌颂自然界的春天，我们也要来打开社会的春天，抗战的春天，我们要求在一方面的蓬勃发扬进步！

2月的中国历史中就有着一段是表现着在社会的发展中“以鸟鸣春”的景象的。这是在17年前——1923年——2月间的反对军阀、帝国主义的工人运动。那时正是帝国主义势力勾结北洋军阀统治着中国的黑暗时期，南方的一线革命的光明尚未充分地发挥。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这真是到北洋军阀的心脏里“捣乱”起来了，就遭受到武装干涉，被迫中途散会。总工会当即宣布全路总罢工。到了7日那一天，军阀就拿出最残酷的手段，在武汉、郑州、长辛店实行了血的屠杀。——这是中国群众运动史中的最悲壮的一幕，而这一次群众运动是大大地动摇了黑暗的统治，鼓舞了全国的人民，并且促进了国内一切革命势力的团结。两年以后，一个灿烂的春天就从黑暗的中国中显露出来了。

1848年的法国二月革命，1917年的俄国二月革命，也都同样是以群众力量的表现作出社会进步的信号。或许是当自然界正在渐渐经历着从冬天到春天的转移过程的时候，在社会的人的心底也更充溢着蓬勃发扬进步的活力了。

当2月来到的时候，我们要接受鸣春的鸟儿的启示。

最初刊载于1940年2月1日《读书月报》(重庆)
第1卷第12期，署名绳。



谈 学 习

读了本期中《马克思怎样读书的》一文，恐怕大家都会产生同样的感慨：为学真是一件艰苦的事情啊，而假如不这样艰苦从事，则学问上的成就是不可能的。但今天在中国学术界中正缺少这样的艰苦卓绝的精神。

人们曾经因为轻视书呆子，便一并地连对于艰苦执着的为学精神也加以轻视，这不能不说是种错误。显然的，谁也不能把在书室中的一心沉浸在希腊内战史中的马克思叫做书呆子的。书呆子只是用来指那种除书本中的天地以外别无所知的人，而不是用来一般地指那种在某一时期中专门读书，或是以其大部分的精力对付着书的人。

其实真正的书呆子，他所有的书中的天地也是极其狭窄的。他只是拘束在几本圣经贤传之中，决没有自由地浮泳于知识之海中的勇气。高尔基曾说：“你们应该爱书，——书是知识的源泉，只有知识有挽救我们的力量，只有知识能够使我们成为在精神上强壮忠实而醒觉的人，使我们能够诚恳地爱人类，尊重人类的工作，并且衷心地矚望着人类的不断的劳动的巨大成果”。这是书呆子所能讲得出来的话么？

有两种把书连同书呆子的浑号一并加以抛弃的人。一种人是以游戏的态度来读书，他们只是在吃饱饭以后，在没有人可以一起



聊天的时候，懒懒地躲在沙发或者睡椅上，于是一本书到了手里，轻轻地翻着，一直到睡觉的时候。——这是以狎客的态度来对付书的。

另一种人是以实践的名义来轻视读书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固然已经是一种常识了，然而对于这种常识的理解不够的实际表现依然还是很普遍。我们不说那种浅薄的事务主义者了，以为只要几本“大纲”、“入门”便于应付一下实践就足够的观念，在实际工作者中间是存在着的吧？因为要求轰轰烈烈的工作而不成，遂自暴自弃，沉没于苦闷中，甚至过着纵情自溺的生活的现象，在后方的大中学同学中也还是存在着的吧？

“学习，学习，再学习！”这个口号还是值得再三提出来的。

在抗战后这一时期中，比在军事、政治各方面，文化方面的有力干部的生长是逊色得多的，而目前正是需要着无数新起的文化工作者。他们要从，也只有从艰苦卓绝的学习中间产生出来。

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中，曾经表现着许多缺点，形成贫乏与平庸的现象。这些缺点最显著的便是：许多人常除了自己所致力的一部分外对旁的方面就茫然无所知，并且所知者也只是从基本的某些认识上有所发挥，而不能更多地搜集历史和现实的材料，更多地吸收前人的学术遗产。——这种缺点也只有靠艰苦卓绝的学习精神去克服。

最初刊载于1940年2月1日《读书月报》(重庆)
第1卷第12期，署名毅。



诗 与 真 实

正如哲学在古希腊所处的地位一样，文学在中国也曾是作为一切精神活动的总和的。

我们自然不能把在中国古来科学不发达的原因归咎于文学的优势，但是文学排斥一切的现象，使得人们在咿唔吟哦之余才能想到经世济民之学，这确是中国之所以被称为“文字之国”的一个理由。——然而由此而归罪于文学还是不公道的。当我们历数中国民族的伟大的历史遗产时，我们仍然不能不举出这许多名字：屈原、杜甫、李白、马致远、曹雪芹、施耐庵，他们都是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最高峰而屹立着。

要脱去了文字之国的诨号，当然并不是要抛弃文学，于是人们渐渐把文学与科学分离开来。然而这种分家实施到极点却表现出了精神活动上的一种病态。为什么？因为一切的精神活动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绝对地划分开，使科学走科学的路，文学走文学的路，乃是不可能而且有害的事。

这种分离就使得人们以为文学乃是在求美，而科学则是在求真，真与美对立起来了。

固然如大家所知道的，文学是要反应现实的，这也是求真，然而倘仅为浮面的刻划，则必不能达到“真”的要求。脱离了科学的认识，则文学中的“美”是浮雕的、虚空的。



科学的目的是在求得一切事物的真相，然而科学不只是为了了解一切，而且为了改造一切。科学家必须有好恶，有爱憎，脱离了文学的热忱，则科学中的“真”乃是轻浮的，无生命力的。

因此诗人常需要有科学家的冷静的头脑，而科学家也常需要有诗人的丰富的感情。

我们必须遵循歌德的不朽的命题“诗与真实”(Wahrheit und Dicht)，而在文学与科学间建立密切的结合。歌德的话只是对诗人而言的，而我们可以把这话适用的范围更推广一点。在诗人方面是以诗为主体而构成诗与真实的统一，在科学家方面是以真实为主体而构成真实与诗的统一。

马克思的《资本论》与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或许在一般人看来是性质绝对相反的两种著作，前者被视为硬性的，好像是非准备头痛不能去读的；后者则被视为软性的，可以用享受的心情去读它。然而从其以无限热忱批评现实，展望未来这一点上说，《资本论》是诗的。而从其以锋利的笔刃解剖着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交错中的俄国社会中的生活与思想这一点上说，《安娜·卡列尼娜》乃是科学的。

因为无论是科学还是诗，都是现实的反映。现实中有着诗，也有着科学。脱离了科学的诗是无病的呻吟，脱离了诗的科学是木乃伊。

当前中国的伟大的现实正是伟大的诗篇。惟有深刻地了解现实，才能以深厚的信心来眺望前途，歌颂一切；而惟有以无限热忱眺望前途，才能深刻地了解现实，剖视现实。在这里，无论是诗人还是科学家都可以无限地发展其创造力！

因此，我们号召一切精神界的战士结合起来，打成一片！今天中国的人民需要诗，也需要科学。他们需要科学，因为他们不愿愚



味。他们需要诗,为了可以更大胆向前。

1940年3月20日

最初刊载于1940年3月23日《全民抗战周刊》
(重庆)第115期。



论谣言攻势

在抗战以来，曾经产生许多新的、极有趣味的名词，像“谣言攻势”就是其中的一个。攻势而只表现为言语，则攻势之为不足道显然，因为谣言终于要被拆穿的。但谣言居然能成为攻势，则谣言似乎也还不失为一种力量。

什么叫做“谣言”呢？若以词典式的文字来解释，那么谣言者，有意或无意地使之传播开去的谎话也。说谎似乎是常被人称为艺术的，大概专门讨论说谎的书籍，教授说谎的训练班也是有的吧，可惜我对这些知道得颇少。我记得16世纪法国的文人蒙田(Montaigne)曾经在一篇题目为《论说谎的人》的散文中作过这样的记载：

我只知道那些文字学家把“说假”与“撒谎”分开。说假是说一件假的，而说者信以为真的事；至于“撒谎”这拉丁字（也就是我们这法字所由来）的定义却是瞒住良心说话，因此只应用于那些言与心违的人。

拉丁文与法文，我都不懂，上面这几句话是照梁宗岱先生的译文抄下来的。中国虽然被称为“文字之国”，但似乎倒并没有对于说假与撒谎作这样的严格区分。然而这种区分似乎也未始不可以接受。不过有一点要声明的是：蒙田对于撒谎所下的定义只是偏于口说这一方面，而在东方，则是以“口说无凭”为信则的，所以谎也可



以说到纸上去，变成文章，印成小册子，印成报告书，这大概是文字之国的缘故吧。

从口头的谎话到纸上的谎话——这一个进步不是一个简单的进步，这里是会造成根本的差别的。这一进步就使得蒙田对于说谎所作的评论不甚精到了。他以为，谎话不容易记得牢，不像真实的事情那样易于固定在记忆中，因此多次反复地说，就会显出纰漏来。“于是同一桩事，他们今天说灰，明天说黄；对这人这样说，对那人说那样。如果这些人偶然把他们所得的矛盾的消息像赃物般合拢在一块，这巧妙的伎俩又如何结果呢？况且稍一不在意，他们便自己打嘴巴，因为有什么记忆容得住他们对于每件事所捏造的形形色式呢？”自然，谎话倘只是在口头上反复说，是不免发生此种纰漏的，但是移到纸上去时，情形就不大同。日寇与汪逆大概可算是在说谎艺术上有颇高造诣的了。谁要是能读到同盟社电讯与《中华日报》的话，那么就可以读到有系统的谎话，它们一个与一个紧相结合着，像是一串贖制的珍珠，虽然是假的，倒也玲珑可爱。因为谎话安在纸上，有了一定的底本，就可以大大减少如蒙田所述的纰漏了。当然也仍不是绝对没有纰漏，因为到底还是虚构的。由此也才能从单纯的说谎进而为谣言攻势了。

执行谣言攻势的一定是有系统地造出谎话来，有系统地散播出去。假如说造谣是种艺术的话，艺术性大概就正表现在这里。据蒙田说，撒谎之法有二，即一、“虚构整个事实，连根带叶”；二、“改变或粉饰那原有真实基础的事物”。但实际上，还有第三法，即只说出“原有真实基础的事物”的一方面、一部分。这也许倒是看起来最真实的谎话，你说他是在说谎，他说这全是有事实根据的；你说这是否就是事实的全部呢？他说，就这已经够了，何必再多说呢？他恰恰就是要用这片面的局部的事实叙述，来造成人们对于全部



事实的虚假的印象。不过有时单单如实地说出片面的局部的事实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的，于是这一方法还不得不和蒙田所说的第二个方法结合起来用，就是，把这片面的局部的事实再加以夸大、粉饰和某种程度的改变。

不过用尽心机来撒谎造谣到底是“所为何来”呢？当然谣言并不像咒语一样，可以令人遭横祸，遇横死，而况咒语也并不见得灵。固然也曾有因为“人言可畏”而自杀的，但在政治上靠谣言而能逼得人自杀的事情还不多见。可是撒谎者与造谣者仍有其所企图的效果。“栽赃”是古已有之的老法子，而以谣言“栽赃”，虽近乎街头泼妇的行径，但施用得巧妙一点，仍似乎可以并不丧其尊严。

自然，谣言也有并不为了栽赃的作用，而是表现着造谣者所希望的事情的，他是希望在谣言中所捏造出来的，所夸大起来的的东西终于成为事实。日寇时时撒着中国内部分裂的谎，当然就是表示着他的一种希望。固然，一件事情不会仅因为曾在撒谎者嘴里讲过就居然会变成事实，不过我们又知道，“造谣”与“生事”常是连结在一起的，听着撒谎者口里在造着什么谣，我们同时就不得不谨防着他们手里在生着什么事了。日寇破坏中国团结的行动，正是和他的中国团结不稳的谎话的制造同时进行着的。

不过，谣言要真正成为有力，仅有一些撒谎的人是不够的。必须要有相信谎话的人，信以为真，惶惶然地代为传播的人。所以撒谎者是要尽量创造许多说假者的。

说着自以为真的，而实际上乃是假的事情的人，在我们的习惯上是不被称为说假话的人的，不过我们既接受了蒙田所下的定义，则我们也只得如此说了。而且在事实上，说假者所造成的罪过也并不小的。

人们之所以说假，或许是因为看事情看得不周到，于是信以为



真地说着假话。但大多数的情形不过是因为受了撒谎者的累，他们没有把听来的话考虑周到，就以为是真的了。从道德上说，这样的说假者比起撒谎者来，似乎是应该得到原谅的。而且撒谎者是为了生事，说假者或许倒是为了怕事的。但是说假者因为他轻信，却也不得不在客观上负担了撒谎者的一部分的罪过。撒谎者到底有点做贼心虚，所以有时也还要藏头露面，偷偷摸摸，并且时而又表示否认。但信以为真的人却把这些谎话不断地从一个人的口里传到另一个人的耳里去了。

虽然如此，我们也还是不能把撒谎者与说假者视同一列的。对于撒谎者，大概是难以救药的，因为也正如蒙田所说：“舌端一度向这方面伸展之后，你要觉得奇怪，任你如何也不能把它拉转来”。不过，蒙田在此举了一个即使对于他自己有利的时候也从不说半句真话的成衣匠来作例子，却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因为在事实上恐怕并没有这样天真的撒谎者，所有的撒谎者之所以永远不说真话，却是因为客观事实的发展对于他们的私人打算永远是无利的。对于这种撒谎者恐怕是只有让事实来给他们以最惨酷的打击了。

至于那些轻信的说假者，他们实在也是苦恼于不知真相，因为真相已经被那有系统的谎话所蒙蔽起来了。但是既然谎话是由于虚构、歪曲、粉饰事实而来，那么脱离谎话的圈套也只有去从虚构、歪曲与粉饰中去看清真正的事实。我可以抄引一段话来代替我自己的笨拙的说明，这段话却并不是蒙田说的。

一切明理的人都知道，如果为着某个对象而发生热烈的斗争，那末要找出真理，就必须不限于争论者双方的申明，而是自己要去审查事实和凭据，自己要去研究，有无证明人的供词，这些供词是否确实。

不消说，这不是时常容易做到的。把凑巧碰到的，偶然听



到的，人们“公开”叫喊的东西信以为真，这自然要“容易”得多。但是，以此为满足的人，就叫作“轻率的”、“轻佻的”人，谁也不会认真地去顾及他。谁要是不花费相当的独立的功夫，他就在任何严重问题上找不出真理来。谁要是怕费力，他便自己失掉找到真理的可能性。

不过要是每遇见任何一句话都要作这一番详细的检证，事实上也不可能，幸而也并不是必要的。因为造谣者本是系统地制造谎话的，这虽然有利于谎话之传播，但却也使人易于揭破它；因为我们只要揭破了其中一点，我们就可以系统地把它整个揭破了。我们不是早已听说么：凡日本军阀所喜欢的我们都不要，凡他们说的我们都不相信。对于有系统的谎话，我们正是要像这样地有系统地加以揭破的。

当撒谎者的谎话没有人相信，也没有人代为传播，反而是提起了大家的警觉的时候，就是撒谎者的末日了。本来，我们只听到过谎话流言曾逼死了弱女子如阮玲玉的事情，但借说谎而在政治上成功却是自古以来未有的，所以就像那样大规模地进行着的日寇的谣言攻势到底成得了什么事呢？不过只使我们在抗战中多了一个有趣的新名词而已。

最初刊载于1940年4月20日《全民抗战周刊》
(重庆)第119期。



由纪念“五四”想到思想自由

桂林出版的《救亡日报》在4月18日刊载了一段德国诗人海涅的话：

多么奇怪！我们日耳曼是国家中最强大最聪明的一国……我们发明了火药和印刷——可是我们如果将手枪开放一下，便要被罚三块钱；如果我们要在新闻纸上登一条：“我亲爱的妻子生产了一个女孩，美丽得像自由神一样。”于是检查老爷便要攫起红铅笔将“自由”这字划去。

海涅的时代正是德国的人民、全欧洲的人民为争取自由而进行不断的流血的斗争的时代，而在这样的时代，是有多少的君主、贵族、地主、主教、检查官一听到自由这两个字，就会发抖到站不住脚了啊。

无论是对于自由的拥护或是压制，都证明了自由之尊贵。在以教条为不可变的真理，以刺刀为真理之护符，以独断的教科书为强迫的粮食，而以盲目的崇拜为最优美的品德的时代，“自由”——这虽是简单的两个音节，在千万人的口中却成为最有力的呼声，成为进步与创造的动力。自由的呼声足以扫荡迷信的传统的腐败的殿堂，而在废墟上面为新的建筑物铺上基地。——在中国，“五四”时代就曾是这样的一个时代。

早在1907年，在“五四”运动发生的12年前，鲁迅就已发出思



想自由的呼声了，他歌颂在欧洲历史中的精神界的战士，而叹息于中国的沉沦，他说：“毒染既深，辄以习惯之目光，观察一切，凡所然否，谬解为多，此所为呼维新既 20 年，而新声迄不起于中国也。夫如是，则精神界之战士贵矣。”他以西欧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来作对照，“英当十八世纪时，社会习于伪，宗教安于陋，其为文章，亦摹故旧而事涂饰，不能闻真之心声，于是哲人洛克首出，力排政治宗教之积弊，唱思想言议之自由，转轮之兴，此其播种。……”（见《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100 页）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里，鲁迅努力宣扬个性的解放，思想的独立，文学与科学的相辅相依的自由生长。在他的笔下，人们不难读出来一种热烈而勇敢的斗争的呼声，这种呼声在 12 年后得到了广泛的反响。

初期的“五四”文化运动，在基本上，没有跳出在 1907 年鲁迅的思想的范畴。鲁迅在 1907 年所作的思想自由的呼声，在 1919 年前后成为较深较广的号召了。当时曾以一切力量反对孔教，反对传统的礼教，如说：“今效法汉武之术，罢黜百家，独尊孔氏，则学术思想之手制，其湮灭人智，为祸之烈，远在政界帝王之上。”（《新青年》第 2 卷第 3 期，第 2 页）鲁迅在这时也说：“旧帐如何勾销？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热风》，《鲁迅全集》第 2 卷，第 41 页）

反对学术思想的专制，解放下一代的孩子，这是“五四”时代的启蒙思想者的卓见，“五四”运动至今仍值得我们回顾追崇的原因，若单从文化思想学术一方面说，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了。“五四”以前，中国的广大人民受愚弄于封建统治者所钦定的思想而不自知。“五四”以后，人民不是那样容易地受愚弄了。自“五四”开始，思想自由的争取，成为一道阻挡不住的潮流。

这道潮流从“五四”时代一直流到今天，在抗战期间，它将激起



为壮丽的喷泉。但时代已经不同了，“五四”的声音虽仍能使我们奋发，但对于某些点我们却已不能同情。

“五四”时代以自由与个人主义相结合，这点恐怕已很难为今日的青年所谅解了。但这也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传统的封建主义的权威是根本否认个人的独立性的，而在“五四”时代，广大的下层群众还没有自觉的表现，于是少数的启蒙思想者便仿佛是以一己与社会为敌，就只能把自由的争取解释为个性的发扬了。而从这里确也显示了“五四”时代的自由思想中的弱点，这就是：脱离了民众的力量，以少数的先觉者的遗世独立的行为，而不是以广大人民的活动，看做是新时代的创造者，换言之，这只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是必然地和个人主义相结合的。

目前，我们显然不需要个人主义者的自由，这无宁可说是对当前的实践有害的，因为当前的实践是已经远远地越过“五四”的时代了。当广大群众已经到处自觉地站立起来了的时候，没有人能够以一己为中心，也没有人能够说：凡社会中流行的，为群众所普遍接受的思想理论一定是要不得的，必须离开它而独立才能算是自由。

反之，我们显然也不能因为反对个人主义而有根本否定思想自由的权利。旧式的练兵法是要把每个士兵的个性都剥脱，使之成为同一样的立正举枪的机器。新式的练兵法却是要发扬每个士兵的个性而造成自觉的纪律。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则也决没有抹煞个人，各种职业的人，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之间的差异。抗战建国是思想的总的准则，这总的准则不能不具有最大的包容性。

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范围，这是资产阶级的格言；而我们必须把这格言变易一下，自由以不侵犯集团的自由——而在现在，就是以不侵犯民族国家的自由解放事业——为范围。这一个变



更虽然是在字面上的，但却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就是从“五四”的个人主义的自由观念转变为在 1923 年以后中山先生的革命人权的主张了。1924 年 1 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国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均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这比那“五四”时代的自由观念，无疑地，是向前进了一大步。这是“五四”时代的自由观念的一个发展。“五四”时代所争取的思想自由必须在这样的新的基础上来充分实现。

在“五四”运动的 21 周年纪念的时候，当前的环境不能不使我们深深地想到思想自由这一个老的，然而又仿佛还是个新的问题，而实际上，这问题是已为全国民众所关心着的了。一个月前国民参政会上已通过了这样的提案：“保障讲学自由，以便学术开展，而促进社会进步”。同时在舆论界上也有同样的表示，4 月 25 日《大公报》社论指出，“教育最大的责任是给师生以自由的园地与空气，以最大的可能去培植学生向各方面发展”，而绝对不应令“统制与干涉”的手段参与其内。这二者虽是都偏于学校教育这一方面，然而推之整个思想学术文化活动的方面，又何尝不应如此呢？

老实说，学术思想上是不能容许专制的，而且专制也不可能收效。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孔氏，又何尝真能罢黜得了呢？而在历史上却落下个“湮灭人智”的大罪恶！这种罪恶的帐是终于要被勾销的，而要及早勾销它，就只有“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五四”时代思想先驱者的话不值得我们仔细想想么？“五四”时代有一大功绩，是建立了一个自由的北大（这，我们不能不向最近逝世的蔡子民先生致最崇高的敬意）。虽然北大从开始其自由的学风起，即不断地使许多人头痛，但历史却显然不会管这些人的头痛与否，而把北大摆在中国学术思想运动和整个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光辉的



地位上,这种事实难道也不值得我们仔细想想么?

在 33 年前,就有人高唱着“思想言议之自由”了。“五四”以来的历史,更证明只有自由才能保证思想学术的进步,民族的精神力量的发扬,任何方式的统治都只是梦想!在目前,宪政即将实施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切实地主张在不违背抗战建国的总原则下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讲学自由,出版自由!

最初刊载于 1940 年 5 月 4 日《全民抗战周刊》
(重庆)第 121 期。



怎样继续生活下去

读高尔基的《磁力》，那是写 1905 年俄国革命的前夜的故事的，在第 525 页上我读到了这样的几句话：

可注意的是连下层底中产阶级也不相信依照旧习惯继续生活下去的可能性了。还这么继续着，那不过是由于惰性而已。每个人都觉得旧秩序需要辨明解释。从哪里能够得到辨明呢？它是不适于生存的了。

在这样的几句朴素的话中间，是多么生动而深刻地写出了一个动乱不安的时代啊！

习惯对于人们的生活的作用是很大的，但是倘要仅仅依靠习惯的力量来使得一种社会秩序常此保持下去，那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民曾经在两千多年中生活在同样的社会秩序中间，但资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中国社会内部的生活的变动，终于使得“依照旧习惯而继续生活下去”成为不可能的事了。于是有太平天国，有戊戌变法，有下诏立宪，有辛亥革命，这些表示了什么？是表示着人民已不愿意按照旧秩序所规定的那样地生活下去，而在旧秩序中的统治者也已不能按照旧秩序所规定的那样地统治下去了。

俄国 1905 年的前夜的情形也正是如此。人民不愿意按照旧秩序所规定的那样地生活下去，结果就形成了广泛的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工人运动。虽然沙皇政府用了武力把这些人民的运动压制下



去了，但是它到底不能不发现，它是已不能再按照旧秩序所规定的那样地继续安稳地统治下去了，于是不能不颁布宪法，召开议会，给予人民以“信教、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10月17日宣言）。

在这里可以注意的是，并不只是社会最下层的人民感觉到不安与有所动作的必要。对于除了枷锁以外没有什么可以失掉的人，是没有比抛弃掉旧秩序更为简单的事了。而现在是连在“下层底中产阶级”中也发生不安与动摇的心理了，这一种人是比较地不易于对他们所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秩序表示怀疑与不信任的。

所谓“下层底中产阶级”虽然还只是处于中产阶级中的下层的地位，但毕竟要算是中产阶级了。他们之所以能够维持着这样的社会地位，似乎倒是应该感谢旧秩序的。然而在一定程度下，旧秩序也带给他们以灾害，而且在旧秩序开始动摇的时候，他们不能不意识到从底层爆发的炸药立刻就会祸及自己。这就启发了他们对于旧秩序的怀疑与不信任。而当处于这样的社会地位的人也不愿意作旧秩序的信徒的时候，旧秩序的前途实在是未可乐观了。

我想，假如依据对于旧秩序的关系与态度的不同，我们是可以把人们划分成如下的三部分的：有一部分是依靠着旧秩序而获得优越的地位与权利的，另一部分是恰恰相反，而第三部分是或许可称为中间层的，他们是正如上所述的，只在旧秩序的动摇深刻地冲击着他们的生活的时候，才以各种不同的程度而显示其不安。所以在怨愤之声从这一种不易被激动的人群中发生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不难想象到社会的底层是已极端地不愿意再继续照旧地生活下去，而社会的上层也已不能够再继续照旧地生活下去了（虽然它愿意还是照旧生活下去）。

中间层的特点就表现在这里：他们既没有决意来毁灭旧秩序，也没有决意来维持它。他们只是在旧秩序的破裂声中日益增加其



不安与忧虑，同时却又因惰性（如高尔基在上引文中所说的）而得过且过地生活着。也就在这里，透露出了中间层的苦痛与烦恼。再没有什么人比不知道明天将怎样生活而生活着的人更烦恼的了，再没什么比依靠着一个明知道已腐朽不可靠的支柱更能使人烦恼的了。

那么怎么办呢？

在《磁力》中，就在上引文句的后几行又说：“生活已经变为这样歪扭，在其中最正直最聪敏的人们，却是决意要拆毁它的基础，破坏它的支柱的人们。”当然事情不只是破坏，更重要的是以适宜于生存的新秩序来代替不适宜于生存的旧秩序。

不必再费心去为旧秩序寻找理由来辨明、解释它继续存在的必要了。需要和尚与牧师来赞颂灵魂不灭的时候，就正是垂危与死亡的时候。一切为旧秩序的辩护恰恰是证明了它已不再适于生存的了。而且这种辩护的声音，和那从社会的底层所发出的愤激的呼声，和那从中间层所发生的不安的怨诉比较起来，还会引起什么人的重视呢？

在旧秩序已不再能存在的时候，为旧秩序辩护，那正是断绝人们的继续的生存与发展。我们唾弃这种徒然的辩护，而重视那种从中间层所发出的怨恨之声，因为就在这种不安与怨恨中沉重地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怎样继续生存下去？问题的提出总是和问题的解决方法同时产生的。既然已经在旧秩序之中发现了继续生活下去的不可能，那么我们一定有把握能在另一方式下继续生活下去。

在抗战以前，我们曾听到对于生活的怨恨，结果抗战给我们解决了问题。抗战后的三年，问题又重新提到了我们面前，而实施宪政，建立民主政治的任务也同时被提出了。

在目前每个忠实于生活——个人的与民族的生活——的人，



都应该打破因循的“旧习惯”，废弃得过且过的“惰性”，去为民主的、宪政的新秩序的实现而努力！

最初刊载于1940年6月8日《全民抗战周刊》
(重庆)第126期。



学 与 思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两句话很有点道理。

这里的所谓“学”是偏于接受方面说的，这里的所谓“思”是偏于创造方面说的。学是指接受前人的经验的积蓄和前人的认识的成绩；思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与认识而有所发挥，有所发明。

由此也就可以知道思与学的不可须臾离了。因为一切的知识不是单靠个人的经验与认识，一己的心智的动用就可以获得的。但同时前人的知识的总和，却又未必即能呆板地应用于此时此地。所以，我们既需要有孜孜为学的精神，以前人的一切知识来充实自己，又该有能缜密思虑的头脑，以辨别这些知识，运用这些知识，并发展这些知识。

当然，绝对地“学而不思”和“思而不学”的人都是不会有的，但是在今日一般读书人中，却也不难发现有这两种应加以纠正的倾向。

有些人只是努力于吸收，记忆各种知识，但他们不大肯多用脑子去想一下。举一个最粗浅的例子，有许多中学生讨厌代数、三角，甚至化学、物理，以为里面只是充满了需要背熟的枯燥的公式。但是假如他们能自己多思索一下，就不难明白，这些公式是如何地产生，是如何地相互关联着的，那么就不必逐条背诵了。这正是说明，假如不思而学，那么学到的东西就永远不会成为自己的东西。我们



在学习中遇到困难就问人，这本是好的，但假如完全依靠别人，而自己不作独立的思考，那并不是真正的学习态度。

同时，也有一些人过分信任自己了，于是他们想得太多，而学得太少，这样的结果自然就会流于胡思乱想中。记得高尔基小说中曾提到过一个好几年把自己关在家里，想从三角学里证明上帝之存在的人。这或许算是个思而不学的人。现在的青年固然不至于如此荒诞，但是没有切实地、有系统地去接受前人的经验学说，而徒逞一己的才气的人，有时我们也可以遇到。

所以，“学而不思”者，每易成为教条主义者、公式主义者，这些教条与公式堆在他的脑子里，像是一批滞销的货色一样。“思而不学”则易流于自视甚高，而实则浅薄的妄人，他的思想其实只是胡思乱想。——要免于此二者，必须“好学深思”。

不过，孔丘以学与思的统一来教训他的三千弟子，或者是已经够了。但对于我们，则思与学以外，还须加上一点，就是实践。因为虽好学深思，但若脱离了实际的行动，也还是不免于“罔”，不免于“殆”的。

最初刊载于1940年6月1日《读书月报》(重庆)
第2卷第4期，署名毅。



疲劳与麻木

——“社会象”之一

在心理学上说,当一种刺激单调地延续或长期无变化地反复着的时候,感觉的反应在继续的注意中会渐渐地形成疲劳的现象,甚至形成麻痹的现象。由此可以知道,感觉与心理上的疲劳麻木现象的发生是有着一定的条件的,并不仅是不断接受刺激的缘故。这些条件,在我看来是:在客观上,刺激缺少变化与发展,只是单纯地延续或反复;在主观上,对于刺激只是被动地接受,而没有积极地能动地去应付这种刺激。

曾有许多研究中国的民族性的人把迟钝麻木也列为中国民族固有诸天性之一,这显然是无稽之谈。事实上,在封建社会中,一般民众——主要是农民,因为所接触的社会圈子小,所接受的刺激极其简单,而社会关系又剥夺了他们的自觉的意志与力量,这种种条件就正适合于形成在精神上的疲劳与麻木。特别在封建社会曾以最长久的历史时期而延续着的中国,这种情形或者可说是比较更为明显,然而这也还不是绝对的;至于说这是“天赋”的民族性,那当然更是无稽了。

假如一个民族真是陷入了绝对的疲劳与麻木的情况中,那就是说,不能积极地应付新的外来刺激,不能发挥主观力量来改造环境并改造自己的地位,那么这个民族就可说是衰老而且濒于死亡



了。然而民族的生命与个体的生命不同，绝对的衰老是没有的。民族生命可以返老还童，而要返老还童就必须打破疲劳，推翻麻木。鲁迅先生以“韧性的战斗”来教育中国人民，这正是针对这种疲劳与麻木的心理现象的。历史赋予中国人民以艰苦的战斗环境，一举而胜利是不能希冀到的，因此不但要战斗，而且要有韧性。所谓韧性，不只是使战斗继续，而且要使战斗不断地深入与发展。因为只有不断地提高与发挥战斗的威力与效能，战斗才能不断地继续下去。假如对于苦难，初则悲愤填膺，久则习而安之，因而成为麻木；对于战斗，初则一鼓作气，久则气衰力竭，乃至困于疲劳，那才是死症！

中国民族到底并没有陷入这种死症。100年前，英国人想以鸦片来麻醉中国，不料结果却发生了警醒中国的作用。从“九一八”以后，日本人想以不断地蚕食方式在不知不觉中灭亡中国，然而结果还是不免使用整个鲸吞的武力侵略的方式。而这次日本人的大炮对于中国人民所起的警醒作用，比起100年前英国人的大炮当然是更加巨大得多了。日本的侵略是个无可比拟的巨大刺激力，在这刺激之下，中国人民同声而起，响应抗战的号召。这就证明中国民族还有青春，毕竟没有为百年来的苦难所麻痹，因百年来的战斗而疲劳。在抗战中，从广大人民之间，产生了新的活力，这种活力，就上述的意义来讲，那正是对抗疲劳与麻木的力量。

这种活力必须长期地保存着，而且不断地发扬。活力的长期保存与发扬，乃是抗战能长期继续直到胜利的保证。在抗战开始时，由于看到许多本来对于整个民族的生命采取不关心态度的人，也一下子改变了他们的态度，而形成整个的民气蓬勃的现象，于是有些人就感动地说：中国是不会亡的！但中国不会亡不决定于人民在外力刺激一到的时候，一时地奋发起来，而要决定于当这种刺激继



续延长下去，不呈现疲劳麻木，仍不断地增长其积极性，以从事于战斗。惟有“韧性”的战斗精神才说得长期的抗战！

现在抗战已进行了3年之久，我们是不是已经丧失了战斗精力呢？一般地说来，是没有的，我们仍在继续战斗，而且准备着更长期的战斗；但是局部地说来，疲劳麻木的现象是隐约地可以发现的。汪精卫之流在还没有打到两年的时候，就已经丧失了战斗意志，已无需我们在此地再来说明，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抗战的信心的。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是在另一情形下所表现的疲劳甚至麻木的现象。重庆《大公报》6月29日社论中曾作如下的说明：

……我们做报的人，我们的心灵能感应时代，同时也能触知感应的感应。我们根据官方公布的文字编报，连篇累牍，皆是单轨的报道，不易辨别是非善恶，把人们的脑筋都弄成单调而麻木。举例说：现在是军事第一，但人们差不多就很少读军事新闻。这并非人们不关心军事，而实际是读了新闻仍是不懂。永远是那种像是热闹而实际单调的写法，把人们的脑筋弄麻木了。有时候真正获得胜利，人们也模糊看过。……常常一个战役犯了错误，报纸上仍然充满渲染文字，而政府对于应负责者亦无公开的责罚，则是非不明，责任模糊，既不足以激励士气，且使人心陷于钝感。这是一例。

当然，我们必须严格分开表现在两种不同人群中的两种在本质上完全互相区别的疲劳与麻木。一切形式的汪精卫对战斗绝望，对民族的生命毫无知觉，对于这些人，我们是要毫不顾惜地把他们赶跑掉的。但是如《大公报》记者所说的“感觉的迟钝”与“头脑的麻木”显然是另外一回事，其严重性不能与前者一概而论。虽然是健康的人有时也不免闹点伤风咳嗽的毛病，我们正不必讳疾忌医，而应该来切实地检查一下这种病症。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根据《大公报》记者的提示，并把前述的形成疲劳与麻木的主观客观的一般的条件引伸了来看，我们不难得到解释。固然抗战中的客观条件决不能说是没有变化，在3年来的过程中，无论是国内国际环境，无论是军事政治经济都有了非常急激的变化，这种多变的环境照理是只有锻炼出人们的敏锐的感觉力和时刻加强的警觉心的。而实际上，的确大多数人是受到了这种训练的。但是，第一，如《大公报》记者所说：报纸上“皆是单轨的报道，不易辨别是非善恶”，以至于人们“读了新闻仍是不懂”，因此“钝感”就渐渐形成了。我们不妨问一下，我们是否使得人们都充分了解抗战中的一切问题了呢？尤其是抗战中发生了某方面的困难，乃至形成了某种危机的时候（以一个弱国对付强国的战争，这种困难与危机本来是不可避免的）；有没有使人们彻底清楚这种困难和危机的真实情形与克服办法呢？我们不必害怕人们会在困难和危机前退缩。事实上，人们从他的直觉上总会模糊地感到这种困难和危机的，而正因为只是模糊地感到，反而滋生疑虑。“忧患兴国，逸豫亡身”的成语是我们在抗战中常加引用的，则我们就决不能蒙蔽忧患的现实，而使我们的报道蒙上单调无变化的色彩，以致人们因对于客观局势不能充分了解而日渐陷于“头脑的麻木”。第二，前一点是就抗战中的困难危机来说的，当然，在另一方面，抗战中也确乎有了积极的进步，进步是足以鼓舞振奋人们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一切方面我们的进步还非常不够，同时我们还看到某些进步的预约并没有具体地实现。长久地谛听着楼梯的响声，到底看不见人下来，这在心理上是最易造成疲劳而乃至表现为麻木的。第三，我们再就主观条件说，前面已经指出，造成疲劳与麻木的主观条件对于刺激只是被动地接受，而没有积极地能动地应付这种刺激。把这句话换成抗战中常用的语句来说，就是：要动员民



众,使民众成为自觉的能动的战士,而能够充分地发挥其力量,则自能从民众中不断地产生活泼的积极的有生力量。反之,封建社会的历史已昭示我们,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办法只不过使疲劳与麻木的细菌得到滋生的适宜场所而已。

由此显然可以看出,只有对于汪精卫之流可以说是绝对的疲劳与麻木;而说到另外的人,那只是在某种客观条件限制下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不正常的精神状态而已。人们没有绝对地失去抗战的活力,只是局部地、相对地受到疲劳与麻木的病菌的传染。这种病菌的存在与有人在故意散播这种病菌,唯恐人们受毒不深有关,这是值得重视的现象。行使催眠术的人,法术虽然高明,究其实在无非是利用旁人在精神上的麻木与疲劳。他们把被催眠者置入疲劳麻木的情况中,就可以驱使他们做各种事情了。社会的催眠术固然未必就有如此的灵效,但也还是应该注意的。

那么如何肃清这种病菌呢?

有人说,我们的抗战所依靠的就是“拖”字诀,似乎过去是“拖”了3年,以后还能“拖”到胜利,这是不对的。过去的3年绝不是从“拖”中得到的,而是“打”出来的。拖是消极的,打是积极的。消极的拖包含着一切照旧的意思,积极的打则必须伴以自力更生,伴以在一切方面的不断进步。只有不断进步中才能达到胜利,拖则必然造成更大的疲劳与麻木。汪精卫在3年前就是以拖的精神来解释抗战的,那正可视为是催眠者在开始执行其法术。他是想以拖为名义来拒绝任何进步,而在民众的疲劳中引之入于投降之路!所以消极的拖不是克服疲劳与麻木的办法,而正是相反。

克服疲劳与麻木不是靠消极的拖,而是靠积极的进步。有困难马上拿出办法来,有危机马上加以克服,在消极方面的克服困难与危机,在积极方面就是进步与发展。长期的抗战也就是长期的革命



过程,革命要能不断地发展下去,就只有靠每天有新的胜利和新的收获。这样才能每天提供出新的活力、新的有生力量。

所以必须用客观现实的充分暴露与解释来推翻麻木,以在一切方面的不断进步来打破疲劳。——在这里,民主政治的真正实行是个中心关键。

最初刊载于1940年8月17日《全民抗战周刊》
(重庆)第133期。



“没 办 法”

外国人看中国，常常会从我们的极平常的说话和行动中看出重大的意义来，这种言行在我们自己却已成为习惯，是很自然的了。比如，我在一本英国记者写的考察中国抗战的书中，看到他特别注意到中国人嘴里的“没办法”这三个字。他似乎是想在这三个简单的音节中看出中国的“民族性”。

固然，我们并不真有这种“没办法”的民族性，但是倘虚心地反省一下，用这简单的三个字来应付一切事情的人，在我们中间，确是很不少。这三个寻常的字值得我们来研究一下。

汪精卫和汪精卫之流的人，为什么从抗战中逃走了呢？为什么悲观失望呢？因为他们觉得“没办法”：军事上没办法，财政上没办法，外交上没办法。既然亨巴郎没办法，当然只好投降了。

对于这种因为感到没办法就不干了的人，固然我们要反对；但是我们还要反对另外一种人，这种人是一面说着“没办法”，一面在干着的人。因为他们还在干着，当然比前一种人好得多，但是存着“没办法”的心，勉强干下去，这种干在主观上也不过是敷衍，在客观上就是怠工。这样的干法不过是证明事情确是“没办法”，则其结果最后会走到什么路上去，是明明白白的。

我们要用“有办法”来反对“没办法”。但这样说，第一，并不是抹煞问题的存在与困难的现实；第二，并不是说，解决问题与克服



困难的办法已经现成地在我们手里了。正因为有问题，有困难，所以才需要办法，而这办法却也只有努力去解决问题，去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才会发现出来，完备起来。

德国有个哲人说过一句有名的话：“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产生。”这就是告诉我们，在现实中有了问题发生，就一定会有解决这问题的办法。不可解决的司芬克司的谜，在现实中是绝对没有的。我们必须用这样的信念来应付一切问题、一切困难，那么，我们一定会把妥当的办法找出来的。

但是这句话对于那些一遇到问题就忙着说“没办法”的人是绝不会准确的。这也没办法，那也没办法，于是只好敷衍敷衍，得过且过，于是现实中存在着的办法永远不会被他所发现，因为办法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因为在现实中存在着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必须靠我们在对付问题的切实的努力中才能被发现。结果，他的一切事情都会在没办法三个字中葬送掉！

因此我们大家要拒绝说“没办法”这三个字！

最初刊载于1940年8月24日《全民抗战周刊》
(重庆)第134期，署名于田。



关于谣言

一个刚从前方回来的朋友，在他到达以后的第八天的清早，匆匆地推开了我的门，用着似乎是在发现了自己已经为强大的敌军重重包围而陷于无可幸免的境遇中时的沮丧神气向我说：

“我真不知道，你们在这后方怎么能生活下去的？”

“你说什么？”我有点吃惊了，“难道你觉得这经过轰炸，烧毁了的城市，就不能让人生活了么？”

“哪里话！比你们所受的轰炸更猛烈可怕的炮火，我也坦然地经历过来了。子弹在我的身体四面乱飞，我不在乎；但是谣言——这样多的谣言，每一天，每一分钟包围着你，这玩意儿我受不了！”

我笑了，释然了，原来如此。

看见我的笑，我的朋友有点愤然了，“这样多的谣言！”他接着说，“当然，我要是准知道这都是谣言，那也好，我可以听到之后，立刻把它忘掉，安心睡觉。但是天晓得，这些谣言中哪几句是真的，哪几句是假的！而它在假的中间又包含着真的意义，真的中间又透着几分假的意味。……我很害怕，在我回到前方以前，我会变成神经衰弱！”

“朋友，你说，一个新兵是不是一上战场就能像你一样的对于子弹在身体四周乱飞全不在乎？”我正色地问。



“当然不！……”我的朋友显然地也为我忽然发出这问题而微微吃了一惊。

“当然要靠长期的训练，是不是？”我觉得，我应该给这位对于这个环境说来显得太简单的朋友开一个临时讲座了。我说：“一个有经验的老兵单凭弹声就能判别出它的性质、距离、方向和敌人的企图等等，这样他才能对于敌人的炮火攻势处之泰然，知道怎样应付。但是你知道，谣言也是一种攻势啊！”

“是的，谣言攻势，发明这办法的人是个聪明的家伙！”

“但是更聪明的家伙知道怎样应付这种攻势。老兄虽然来到这谣言攻势的战场上才7天，但其实也已经聪明一点了。因为第一，你已经知道谣言并不能当作耳边风那样看待。对谣言全不理睬的人其实只是表示对于谣言攻势的逃避，那和对于炮火攻势的逃避同样是懦怯的，有害的行为。第二，你已经知道在谣言中，真与假是互相错综着的。把一切谣言信以为真固然要上当，但是即使谣言的内容全部是假的，可发生了这种谣言却是事实。就从这一事实中你就可以了解到许多事情了。当然你还得训练，使你能如在战场上一样有把握，听到每一个谣言，就能迅速地判断出它的性质、意义、来源、作用等等。”

“我看我办不到了。”我的朋友渐渐地为我的“讲授”所打动了。

“但是你一定行的。孙悟空捉起一把风来一嗅，就知道前面是什么妖怪来了。我们对谣风也须有这样的本领。我们应当知道怎样戒备，当妖怪袭来的时候，用金箍棒及时地消灭它。”

“哈哈，就请你训练训练我这新兵吧。”我的朋友大笑着站了起来。

“且慢，现在让我们出去吃一点豆浆油条以后再开讲第二课



吧”，我说，“那倒是不用怀疑的，能使你肚子充实的真实的東西。”

最初刊载于 1940 年 12 月 7 日《全民抗战周刊》
(重庆)第 149 期,署名卜人。



辞 旧 迎 新

在我的家乡，年终时，有所谓“辞岁”的风俗，那就是在三十晚上亲友间的访问，意思似乎是对于旧的一年的逝去的惜别。老年人在作着“辞岁”的行动时是一定包含着很大的悲伤与悽怆的吧？因为对于他们，时光的逝去就表示着这个世界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日益缩短了，就表示着他们的青春，他们的壮健发展已日益被抛弃到他们的背后的远远的地方去了。他们恋恋不舍地望着过去，而冷酷的时间却使他们不得不“辞”去过去，而向着对于他们是不可知的未来走去。但年轻人也常跟着长辈同样地“辞岁”，而他们的心情恰恰和老年人相反。因为当他们一面向过去的时间辞别，一面却已在心里描画着下一天的新的一年的开始了，在心里描画着将从霜雪中萌生的新春了。他们的目光，虽在辞旧的时候，也仍在望着新的，他们对旧的没有什么留恋，因为将来对于他们是欢乐的、明朗的、发展的！

这两种心情的对照，在我幼时，随着父亲向亲友“辞岁”的时候，已经模糊地感到，因为我的父亲的森严的神态，竟使我不敢过分放纵我心中的欢乐。然而自然，在那时，我还不能了解这些。

现在我能了解老年人的心情了。而进一步，我又了解到，这样的心情也并不只因为年龄的衰老而发生。

旧年新年的轮替原来无非是自然的时序的推移，然而从这自



然的时序中也正隐约地显出了历史的发展。在历史的发展中我们岂不是也能看到两种人：一种人的眼光只能也只敢看着过去，而另一种人则永远是坚定地、热情地望着将来。

对于前一种人，时间的奔驰，历史的发展真是冷酷无情到极点，不顾他们的愿望，把过去转成了现在，而又必然地要把现在转成了将来！他们对于将来已经不存有任何希望了。然而他们虽用最大的力量也不能使时间退向过去，虽有最顽固的心情也不能不移动他们的脚步，一步步走向他们所不能预测的将来的深渊去。过去的王座虽然是舒适而温暖的，但毕竟已是过去的了。即使他们强硬到不愿向过去辞别，但过去也会向他们辞别的！纵然他们软弱到不敢去迎接将来，但将来也会扑面地迎向他们的！

但我们却以轰然的大声向过去告别，在过去还来不及回答我们的时候，我们已跨上了骏马，扬起了长鞭，疾驰向前，跃过那些拦在路上的坑沟和障碍，去追赶那轰轰隆隆地飞奔着的历史的车头。因为在我们眼前展开着将来的自由而广阔的原野，为什么不欢乐地笑，放怀地歌唱，为开辟将来的道路而努力呢？

既然霜雪已经开始融解，难道春天还会远么？

最初刊载于1941年1月1日《读书月报》(重庆)
第2卷第10期，署名绳。



“为仇者所快”

在大敌当前，一致对外的时候，任何为亲者所痛，为仇者所快的事都不应该做，这确是每个真正的中国人的行为的总原则。

但对这原则却不应该含糊地承认。倘滥用这原则，用来拒绝、排斥一切批评和督责，那更是有害的了。

“你既然是我的朋友，你就不应该触痛我的疮疤，即使我的疮疤马上会溃烂开来。”这种说法对不对呢？“良药苦口利于病”不已是古训了么？

人们或许又说：固然烂疮应该医治，但你一说穿，不免为仇者所快意，成了仇者的宣传资料了。那么为了不使亲者“痛心”，仇者快意，对于自己的烂疮也只好贴块膏药掩饰起来，而且在膏药背上画起美丽的图案来以为装点。

可惜的是在膏药的掩饰之下，疮会越烂越大，以至不可收拾，痛苦会更大，仇者也更感快意了。

诚然仇者愿意看见我们的内部官吏贪污，政治腐败，以及一切的落后现象。但他们所希望的是这种种现象继续地保存与扩大。倘若我们自己检举这些现象，加以肃清，以达到去旧更新之故，那却决不是仇者所乐于闻见的了。

对于这样的做法，凡真的“亲者”也不应该感到“痛心”。倘有人因而“痛心”的话，那不过证明他自己正是属于应加肃清的腐败分



子之类的人。

窒杀改革呼声，断绝进步之路，不事更张，自欺欺人，那才是为仇者所大快而特快的。

最初刊载于 1941 年 5 月 17 日《大众生活》(香港)
第 1 号。



报 销 主 义

“报销”是在中国官场上的非常微妙的一件事。

一切为了报销，报销代替一切，这就是报销主义。事情不在乎是否做成功，是否达到实际的效果，只要能够对上报销得过去就行。百分之百地完成一件事的是傻子，因为倘只做了百分之三十，甚至百分之十，其能够“报销”是同样的。甚至一点也不做，也还是可以报销，于是文字之功尚矣。在“等因奉此”，“相应函达”之中，一切都完满地“报销”掉了。

所以从上面下来种种良策美法，从下面上去就成为一纸纸报销文书。当这些文书一一“归档”的时候，万事都了清了。

这是旧封建政治的传统。因为在那时候，一切官吏都向安坐龙庭的“皇上”负责。从最下的地方官吏层层向上报销，最后到了皇上手里，就永远是风调雨顺，四海荡平。因为皇帝是最有威权也最易欺骗的人，只要善于报销，自然一切都可以报销的了。

但现在是民国了。老百姓固未必已被承认是最有威权者，但他们是最不易被欺骗的却是事实。层层向上报销固然不难，因为官官相护，但最后却非向老百姓报销一下不可。当报销主义被用来对付老百姓时，则虽最老练的报销主义者也不能不感到棘手了。

虽然在广播电台上，在演讲坛上，在宣言、告民众书中，“民主政治”的呼声震天价响，而一面喊着，一面已偷偷摸摸地想把这一



一切都“归档备查”去了。但是且慢“归档”，在老百姓未看到真正的事实以前，是报销不了的。

最初刊载于 1941 年 5 月 31 日《大众生活》(香港)
第 3 号。



审查官的文化观

“原稿审查机关是抗战后第一年组织的。……幸赖全国出版界的踊跃协助，使新兴的出版预防制度得以顺利的展开；而审查机关的本身也克服种种困难，杜绝了一切逆流的泛滥，使抗战初期那些汹涌澎湃的逆流都像泡沫一样的消灭于无形。它在精神国防上负起了重大的任务，事实上是维护战时出版界坚强有力的堡垒。”——审查机关成了文化堡垒，这种说法实在奇怪，但在我们知道了这原来是中央图书杂志审查会的副主任委员老爷印维廉先生的大文（载《国民日报》7月14日到19日）中所说的，也就不觉得可惊了。

就算是精神国防的堡垒吧，那么这堡垒上的枪炮应该都是向着侵略者与汉奸的言论的吧？但是并不，请听老爷叙述他所要对付的“文化逆流”：“汉奸的投降谬论自然也是这股逆流中的一个支流，不过他们只能在敌人占据区内狂吠，是传播不到内地来的。我在上面所述的几种谬论倒是心腹之患，而且曾有一个时期确实混乱我们的出版界，所以我特别郑重地指出，使得我们知所注意，知所防范。”那么可见这精神国防堡垒所要防范的倒并不是敌人汉奸，而另有所在，这里恰恰正是“日本乃疥癣之疾，共产党却是心腹之患”这一套理论在文化上的运用。

现在，据说靠了这堡垒的努力，心腹之患已经大致澄清了，于



是市面上就只剩下了如老爷所说的“每册成本要 6 角以上，而定价只有 1 角或 1 角 5 分”的刊物了。但是价钱虽然克己得很，销路似乎并不见佳。所以老爷提议要政府方面努力做到：“每一文化比较发达的省份，至少每月拨出 10 万元以上的巨款，扶植 5 种到 10 种优良的刊物，使每种刊物的销路至少要达到 5 万份以上”等等。我们相信，这种政策倘认真实行是能成功的，因为只要真肯赔钱，免费分发，10 万份的“销数”也不难达到的。

用“堡垒”来“防范”，用“巨款”来“扶植”，此即审查官老爷们的战时文化观。

最初刊载于 1941 年 7 月 26 日《大众生活》(香港)
新 11 号，署名于田。



“在监人”的自由

主张自由只能属于国家所有，个人则应牺牲一切自由，因而反对民主要求的论客们，为了确立他们的理论，先是从国外去找证明，据说是法国的灭亡就因为人民的自由太多了。最近又从国内来找证明，据说鉴于“在监人筹献飞机”的事，证明“有自由的国家，其人民虽失自由，还是愉快”。前一种论证是对真实的历史的歪曲，后一种论证也无非是帮闲的扯淡。但从这里却也可以看出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原来他们已经把全国人民一律看做是无自由的“在监人”了。

其实认真要到国外找例证并不难。在法西斯统治下的德国，正是人民牺牲了奶油与面包，而使国家获得了大炮坦克，人民被剥夺了行动思想的自由，而使国家获得了向外行动发展的自由！国家有自由人民无自由论者其实也知道自己的理想不过是法西斯统治，不过不敢明说罢了。你看，他们已经对德国的“社会组织”表示其心向往之了。德国的社会组织是怎样的呢？那就是，以国家的力量来使全社会成为一个大集中营，在这社会中任何一个自由公民都是在过着“在监人”的生活。

于是我们的官方论客就向人民劝慰说：“如果国家灭亡，则全国是一个大监狱，亡国人民身体思想自由所受之限制，没有范围，没有法律。受限制的人，自己不能预测限制之程度与性质。”这是



说,现在尚未亡国,你们就应自安于所受的有限度与范围的自由的限制,不准胡闹!但是在“老爷们说怎样就怎样”的时候,全国民众虽还未做亡国之民,但对于他们,已经没有了法律,他们的身体思想所受的限制,已经没有范围了,他们对于所受的限制的程度与性质已经难以预测到了!

最初刊载于1941年8月2日《大众生活》(香港)
新13号,署名卜人。



悼许地山先生

听到许地山先生的噩耗，重读他的最后的遗著，发表在《大公报》上的论文《国粹与国学》，不能不万分地感慨。

许先生是对于中国文化具有深刻的见解的当代学者之一。从这一篇论文中固不足以窥见他的全部思想学识，但是我们不难从这论文中读出他对于文化上的复古倾向的憎恶，读出他对于民族的新时代的新文化的向往。战斗与进步的光芒闪烁在这篇他在逝世前一个月所写的文章中间。

在这篇论文中，许先生沉痛地说：“屈原时代的楚国，在他看是醉了的，我们当前的中国在我看是疯了的，疯狂是行为与思想回到祖先底不合理的生活、无系统的思想与无意识的行为底状态。”这是对于当前的复古空气的一个学者的控诉。岂不是正有许多人凭借着权力的行使，利用爱国与爱民族的名义而有意地宣传思想与行为的倒退，努力使所有的人都成为疯子，以便利其统制么？在这时候，我们岂能不重视这样的声音：“凡无进步与失功用底带‘国’字头底事物，我们都要下功夫做澄清底工作，把渣滓淘汰掉，才能见到‘粹’。”“精神文化不是简单地复现祖先所曾做，曾以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必得有个理性来维系它，批评它，才可以。民族遗留下来底好精神，若离开理智的指导，结果必流入虚伪和夸张。”

许先生对中国新文化的开展也有他的积极主张，而尤其着重



于文字改革运动。几年来他对于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热烈支持是人所共知的，在《国粹与国学》这篇论文中也特别提到这个问题。新文字运动自来历受政治压迫，而许先生之支持却至死不变，这种只知真理，不惧权威，力求进步，毫不恋后的精神是永远值得崇敬的。

我们同情许先生的见解与主张，我们愈深感到在这需要更多的有理性的学者来共同击溃旧文化的魔影、建设民族的新文化的时候，失掉了许先生的悲痛！

最初刊载于1941年8月2日《大众生活》(香港)
新13号。



谈“全盘西化”

近来偶然在书店里买到两本陈序经先生作的关于讨论“西化”问题的小册子，觉得很有趣味。陈先生是历来主张中国文化的全盘西化论的健将，不但对于复古论和所谓本位文化论，而且对于各种形式的中西文化折衷论都有毫不容情的批评。在目前，文化上的复古倾向以各种遮遮掩掩的形式而猖獗着的时候，我们是相当同情全盘西化论的见解的。

但是把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与创造的路线，以“全盘西化”这一个概念来表达，实在是不恰当的。因为我们看到，在全盘西化论的主张者中有人说，学西洋文化之用，亦需学其体，而所指出之体却是柏格森哲学、新黑格尔派哲学等等；也有人把近代西洋文化之源泉归于中世纪文化，似乎全盘西化就是接受自欧洲封建文化以来的全盘。假如实行这种主张，则其结果会成为怎样奇怪的东西啊！所以在主张全盘西化的时候，实在还应该把“西化”好好地分析一下。西洋文化不是单纯的东西：从时间的发展上，则至少已有欧洲中世纪的封建文化，有资本主义向上时期的文化，有资本主义腐败期的文化；而从空间的不同来说，则也至少有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文化，有法西斯文化，有社会主义文化，这实在是一大盘炒什景，倘要全盘吃下去，将如何吃得消呢？

所以对于西洋文化仍须有所选择，有所甄别。极端的全盘西化



论者竭力避免说选择甄别,因为他们生怕因此就跌入了中西文化折衷论中。其实这是不必害怕的。折衷论者是以中国旧文化做底子,选择那能够收容得下而不至根本破坏它的西洋东西而收容之,以半封建的专制主义做底子以收容纳粹思想即是一例。但我们则是以中国社会的现实的历史发展做底子来实行选择与甄别,尤其重要的是我们不是以过去的历史生活做底子,而是以将来的历史发展做底子。

必须这样地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们才能坚决反对一切复古论、折衷论,也才能很好很适当地“西化”。

最初刊载于1941年8月30日《大众生活》(香港)
新16号。



人的改造

梁漱溟先生谈中国的民主问题时，首先列举“民主的精神或倾向”的要点是：一、承认旁人；二、平等；三、讲理；四、尊重多数；五、尊重个人自由。（见《光明报》，9月20日）这样的说明，我们觉得，的确是很重要的。所谓建立民主政治，其意义显然不仅在于行政机构的改革，而是整个文化，也就是整个民族生活的改革——从非民主的生活与文化改革而成为民主的生活与文化。这种民主的精神就必须贯彻于文化生活的一切方面。当然不能说只有在民主精神充分发扬了的时候，民主的政治才能实现。应该承认，在目前政治的民主化是整个文化生活改造的决定的问题。因为非民主的政治就是以强力来压制民主精神的发扬，而这种强力一被取消，民主精神自更能顺遂地开展。但倘不能看出民主政治是民主精神在政治上的一种表现，是民主文化的一个方面，则对民主的意义的了解可说是并不充分的。

在梁先生所举民主精神的主要点中，我觉得，其根本关键乃在于尊重个人。这从历史上可以得到证明，欧洲的文艺复兴从一个意义讲，可以说是一个“人的发现”的运动。唯其发现了每个个人都能、也都应有其独立的感情、要求、思想、意见，有其独立的生活价值，才能冲破中世纪的黑暗，而建立近代民主主义的文化。

尊重个人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是尊重自我，也就是尊重自己



这一个人；第二是尊重旁人，也就是尊重除自己以外的旁的个人。唯其尊重自我，才能觉得自己必须堂堂正正地生活与思想，发挥自己的存在的价值，这样才能算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奴才。奴才俯仰随人，不觉得自己的存在价值，也不去独立地有所思想与感觉，无论他所追随的是风尚或权威，他都不能算是一个独立的人。唯其尊重旁人，才会承认旁人也有旁人的感情、要求、思想、意见种种，正如我自己一样，“所有这些都要顾及，不能抹煞，不能排斥之，灭绝之”（梁漱溟先生语），因而才能有宽容的精神。法西斯主义者有我无人，自以为是而抹煞一切其他人的生活与思想的权利，是绝对地不宽容，也就是绝对地不尊重旁人。所以必须尊重自己而又尊重旁人，也就是自己不做奴才也不把人家当做奴才，才能算是民主的精神。

所谓尊重自己，既不是有我无人，自以为是的意思；则尊重旁人也就不把旁人的一切都当做正确的、对的。伏尔泰的名言：“我反对你的意见，但我尊重你的发言权”，就是这样的意思。我不能因我的存在而抹煞你的存在，不能因我有发言权而否定你也有发言权，这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说的平等。平等并不是说大家都对，其中仍有是非。到底谁是谁非呢？于是就要如梁先生所说的“讲理”。我们应该承认，理是超于每个个人以上的客观存在，我虽不必服从你，但不能不服从“理”。因此倘我所说的是对的，并不因为这是“我”所说的，而是因为我所说的是合于“理”的；反之只要你所说的最后被证明是合“理”的，则我自然服从你所说的。梁先生所提出的其余二点，尊重多数与尊重个人自由也同样地出发于此。唯其尊重多数是基于尊重个人而来，则才不是盲目的风尚追逐，唯其尊重个人自由是基于对一切个人的尊重，则自由自然不会被“滥用”。

尊重个人这样的说法是在“五四”时代才从西方传入国内，至



今虽不过只有 20 余年的历史，却已经被许多人看做是没有价值的滥调了。然而在实际上，我们实在还不配看轻这种“滥调”。封建时代的生活与思想的传统太根深蒂固了，其所起的影响太大了。它剥夺了个个人独立地思想感觉，过“人”的堂堂的生活的权利与能力，而纵有特立卓然之士，也习惯于把旁的人不当做是有价值的人。我们应该承认几乎我们个个人都受着这种传统的影响。它使得我们惯于以旁人走过的路为自己的路，惯于以旁人的思想感觉为自己的思想感觉；而同时——似乎是矛盾的——又惯于一种不宽容的态度，不肯认真考虑与自己不同的道路、不同的思想感觉。于是也就缺少讲理的精神。既不能以理服人，而以公开的权势与暗中的阴损来伤害人；也不能服人的理，纵然我对你所说的无词可辩，我回去还是我的一套。这种风气的继续发扬实在足以灭绝中国的民族生活。这种风气只足以培植精神上的奴才与小丈夫，而不足以产生真正的人与英雄。

精神上的奴才与小丈夫是不能也不配过民主生活的。民主生活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宽容，而相互宽容则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之上，并且只有真正能尊重自己的人才能真正尊重旁人。奴才不能尊重自己，因而也不能尊重旁人；而想教旁人当奴才的人，其实并不是把自己当做是一个健康真实的人那样地尊重。（剥夺旁人的自由的人，自己也没有自由！）民主文化的建立要靠真正的健康的人，这种人是以其整个的脑子，整个的心，整个的生命来思想，来感觉，来生活，因而是有独立的精神与魄力的人。改造中国的文化就是为了要改造人，建立民主文化就是为了要创造这样的新人。

最初刊载于 1941 年 10 月 11 日《大众生活》（香港）新 22 号。



马列主义使人谦虚

毛泽东同志批评那些有着宗派主义倾向的同志说：“这些同志读了几本马列主义的书籍之后，不是更谦虚，而是更骄傲了”。把这意思用正面的说法来讲，那就是，学了马列主义后，不但不应该骄傲，还应该更加谦虚。

骄傲就是自以为是，就是目空一切，旁若无人；也就是只知道自己，不知道除了自己以外的旁人和客观事物。但马列主义恰恰是最能尊重客观事实的一种思想。主观主义是产生骄傲的根源，而主观主义和马列主义绝对不能相容。同时，马列主义又是最能尊重群众的一种思想，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由此可见，一个人，假如真是学到了马列主义，就应该同时学到了不倦地向事实学习，向群众学习的谦虚态度。在事实前面，在群众前面，马列主义者不羞于低下头来，并承认自己不过是一个幼稚的学生。

马列主义又是最充分了解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关系的一种思想。马列主义从不以为自己已经是天经地义的绝对真理，也从自以为旁的思想体系中就不包含一点真理的因素。马列主义不是历史上突发的创造物，而是从人类过去的一切思想体系中发展出来的。马克思本人就不讳言在劳动价值说和辩证法上，他是亚当·斯



密和黑格尔的学生。正因为马列主义的态度是最客观的，所以它最能虚心地探讨旁的思想体系，它肯承认在一定的时地条件下，某种旁的思想体系也有存在的价值，并且能看出旁的思想体系中所包含着的合理的、进步的因素，而向之学习。在全人类文化活动的总成绩前面，马列主义者也不羞于低下头来，并承认自己不过是一个新进的学生。

固然有一些人，只学到几句马列主义的皮毛，就以为天下真理，尽在于我，眼睛长在头顶，什么也看不见。但这些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假如他们不改变态度，也将永远学不到真正的马列主义。

最初刊载于1942年9月27日《新华日报》(重庆)，
署名宗颐。



不守“规则”的英雄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部长在解释关于斯大林格勒的战事时说，德军统帅部的公报中已经渐渐地承认，在这战役中有着“使人不能相信的困难”，而且还“硬说苏军士兵不照规则打仗，拒绝承认自己失败”。在法西斯匪徒的脑子里是有着一套被侵略者在作战中所应守的“规则”的，那么斯大林格勒的英雄们确实是最不守“规则”的战士。

为 100 万的侵略军队所密集地包围，为几千的坦克和飞机从上空和地下猛烈地进攻，但是斯大林格勒城屹然不动。历史上有过孤城困守的事，但从来没有一次在侵略军的规模和守军的艰苦上，比得了斯大林格勒。在历史上也曾有过残酷的巷战，但从来没有一次巷战是用了坦克和飞机及一切最新武器，以这一条街和那一条街，以这一座建筑物和那一座建筑物，以这一层楼和那一层楼，作这样持久不屈的斗争过的。按照法西斯匪徒所想象的“规则”，斯大林格勒早已应该竖起了降旗，但苏联的人民竟没有理会这“规则”。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作战过程中，受了像苏联对德战争中所受的那样严重的损失，还能保持如此坚强的力量和坚定的信念来继续作战；从来没有一个民族能以一个城市抵挡半个世界，像苏联人民的保卫斯大林格勒那样。法西斯匪徒不能想象何以在他的巨大的压力之下，斯大林格勒还不屈服。他只能说，对方是不守“规



则”的——不是人，而是神。

但是保卫斯大林格勒确实是人而不是神。从社会主义社会中产生了新的人。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表现出这种新的人的勇气和力量，并表现出了用这种勇气和力量是会做出如何惊天动地的事业。斯大林格勒的战役创造了新的作战规则，法西斯侵略者所永不能理解的规则。这是一个真正的人民战争中的规则——这规则只有两个字：就是“胜利”。

最初刊载于1942年10月2日《新华日报》(重庆)，
署名陈桑。



真理的爱

对于一个真理的战士，真理不仅是外在于他的客观存在。他是用全生命的力量热烈地拥抱真理，真理成为他的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灵魂。——这样的人，我们可以说，不仅是信真理，而且是爱真理。

历史上的一切殉道者，对于真理都是有着最强的爱的。孔子曾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照我们的意思来解释，这就是说：有很多人对于真理的爱还及不上对其恋人的爱。人们向他的恋人说：我的生命是属于你的；那么人们就更应该向真理说：我的生命是属于你的！许多人因为失去了恋人而悲哀、愤怒，乃至自杀；但也有人漠然地看着真理被强奸，被从自己的身上夺去，苟全性命地过着离开真理的生活。这些人是“信道不笃”，也是“爱道不坚”。

在中国历史上，因为封建权力的压制，在男女之间，也很少有一种最诚挚顽强的爱。《西厢记》中的爱不待说了，就是《孔雀东南飞》中最后以死殉情的爱人，在生前还是因母亲几句话的压力而自动离婚。这和罗米欧与朱丽叶之间的爱是比不上的，后者乃是不顾一切，冲破一切权威与压力，生死赴之的爱。对真理的爱就应该是这样的爱，应该是人间最顽强、最诚挚、最伟大的爱；是不怕一切困难，不顾一切压力永远执着的爱。爱真理就要爱到这样的程度：“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生也在这里，死也在这里。



所以把真理的信徒看作是冷漠无情的人是不对的。一个真理的信徒，要以冷静的头脑去探索真理，也一定以热烈的心肠去追求真理，拥抱真理，为真理而生，为真理而死。爱的不坚，也就表示信的不笃。真理的信徒也就是对真理有着最强的爱的人。

10月1日

最初刊载于1942年10月4日《新华日报》(重庆)，
署名宗颐。



工厂矿穴中的战士

斯大林在最近曾说，苏联的力量，在强度方面，决不比法西斯德国的小些。这不是一句空话，有千百万像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英雄那样的战士们在做这句话的保障。罗斯福在10月13日的《炉边闲话》中说：“在生产战线上，我们是正在前进超过敌人。”这也不是一句空话，有千百万美国的工厂、造船厂、矿穴中的战士在做这句话的保障。罗斯福总统说得好，在美国的1.3亿的自由人中，有人是作为兵士和水手而战斗，有人是在天空战斗——而“有人是在宾夕法尼亚和蒙大拿州的深深的地下的矿穴中从事着斗争”。

美国的庞大的生产力是战胜法西斯的一个伟大力量，但我们不要忘记发挥这一力量的正是在那些工厂和矿穴中沉默地作着工的无名英雄——在这里面，妇女的数量是代替了男子而日益增加着。这样的男工女工的无名英雄有着一个巨大的数量，而如罗斯福总统所说的：“为了增加生产，我们必须在全国的生产力量上更加添几百万的工人。在新工厂开工的时候，我们一定还要更增加几百万人。”但“这几百万人到底是怎样的人？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的疑虑是什么？他们的希望又是什么？而他们的工作是如何进行的？”这些问题是作为美国全国统帅的罗斯福总统向自己提出的。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他做了发表《炉边闲话》之前的这一次巡行，而这一些问题，不也正是作为同盟战友的我们所最不清楚的么？



我们常常辗转抄录着美国生产的钢铁、飞机、坦克、船——这些战胜法西斯的武器的数字，而惊骇于其激增之速，但我们却常常忘记了隐藏在这种数字下面的生动的人力。没有那在工厂矿坑中几百万的战士自发地积极地为了反法西斯目标而努力工作，这种数字的存在和继续增长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多么希望更多了解这种巨大数字的真正创造者的面貌，正如我们从电讯报告中认识了那些保卫斯大林格勒的人们一样。

我们向斯大林格勒城中的英雄们致敬！我们也向宾夕法尼亚矿中的战士们致敬！

10月16日

最初刊载于1942年10月16日《新华日报》(重庆)，
署名陈桑。



赛珍珠的话

赛珍珠女士固然是中国抗战的一个朋友，但是生长在中国，欢喜谈中国事情，却不一定就能表示对中国事情了解得很清楚。譬如报载 14 日纽约电，赛珍珠最近的演说中说，“不论任何朝代，中国平民恒为其国家之真正统治者”，就是一种很奇怪的说法。虽然我们只凭简略的电文，不应深论，但如由此结论说，中国在过去的历代封建王朝之下，人民都有充分民主权利，一如今日的民主国家，那就是海外奇谈了。

固然我们可以说，人民大众是历史进程中的真正主人，纵然在高重压迫之下，被剥夺了一切自由权利，但历史的方向最后仍取决于人民大众，而不取决于少数压迫者。但当然不能因此而说，人民大众就是历史中任何时代的“统治者”。

因为现在我们是参加民主国家的联盟，所以我们国内也有人想把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的政治解释成为民主政治，譬如把朝廷中的内阁制混同于民主的内阁制，把从上到下的科举选举制混同于从下到上的民主选举制。——然而这实在是大可不必的。英国固然是一个老牌民主国家，但他们的学者似乎也从没有把本国在 14、15 世纪的政治解释成民主政治。

历史是不必也不能改造的。我们的国家曾经长期在封建专制政治统治之下，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能够从最黑暗中创造出最光



明来,这才是我们的光荣,才表现出人民力量的伟大。我们不必争民主国的老牌,我们需要努力的是建立崭新的民主制度。假如把汉晋宋明的政治解释成“民主政治”,那么倒使人弄不清我们所要建立的民主国家是什么国家了。

10月17日

最初刊载于1942年10月17日《新华日报》(重庆),署名成弦。



老实是科学的态度

“老实是无用的别名”，这句话不对。因为无用的人并不一定是老实的人，不老实的更不见得就是有用的人。固然有一种人，毫无真本领，对社会起不了什么积极作用，于是就尽力去学不老实，学“调皮”，学玩手段，弄花样，使人相信他是有真本领的、有用的人——那么由此恰恰证明不老实倒正是无用的表现。

而有用的却一定是老实的，因为他无需掩饰自己。科学与巫术哪一个是有用的呢？当然是科学。所以巫师要画自己也不懂的符，鬼话连篇，欺人自欺——是不老实的。但科学却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一点说一点，有九分决不说有十分——是老实的。所以说：“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又说：“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的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的态度是根本不行的。什么是老实人？马恩列斯是老实人，科学家是老实人。……”

现在大家在提倡科学，这是很对的。学科学并不只是学些技术，更应该学科学的精神和态度——那就要尊重事实，不造谣，不说谎，不乱谈并没有确实根据的话，不捕风捉影，不人云亦云，这种老实的态度正是科学的态度。

三角形内的三角之和等于二直角，水的成分是两分氢气一分氧气——在这里，人们除了老实以外是别无办法的，任何狡猾和调皮的手段都无用处。在社会现象上，不老实的人总还以为可以有



武之地,但其实也同样是心劳日拙。要提倡科学就应该在一切方面提倡老实的态度。

10月21日

最初刊载于1942年10月21日《新华日报》(重庆),署名祝丘。



论 卓 别 林

卓别林是怎样的人呢？

许多人把他看做只是一个丑角，不比丑角更多一点。譬如有一次在他见了英首相麦克唐纳之后，记者包围着问道：

你在首相面前照例走着你那令人发笑的步法吗？

好像这个“丑角”，在水银灯光圈外，也老是走着那滑稽的步法，过着令人发笑的生活似的。

任何一个马戏班里、舞台上、银幕中的丑角，在某几小时内使自己充做供人发笑的人物以外，他还有他自己的生活的，这种生活也许是忧郁的，悲哀的，他也有自己的思想和情绪，这种思想和情绪全然和“令人发笑”毫无关系，甚或恰恰相反。

但是也许只有这一个丑角——卓别林，是唯一的丑角，企图把他在作为丑角的表演时间以外的生活反映到他的表演中来；诚实地把他的思想和情绪贯彻到他用那“令人发笑”的皮鞋、帽子、短胡子、手杖所演的趣剧中。

他曾怎样地生活呢？

他从五岁起住过二年长时间的孤儿院，他自己说：

这个地方葬送了我的生活中最忧郁的时光。对于我这里



是监狱，是耻辱之家。那时我过着非常贫乏的生活。而贫乏即是罪恶，在七岁的幼小的我就知道了。（见卓别林著：《一个丑角所见的世界》，杜宇译本，第50页）

他在7岁出院，以后就开始了在流浪的戏班子中的生活。照他自己的叙述，在他八岁的时候，他扮演过狗，在他十四岁的时候，他参加一个巡游剧团。“但因年岁太小——他说，不许我和剧团人们同住，所以我无论何时都是孤零零的。我为解除寂寞，乃买了一条狗和一只兔子作伴。我把这两个朋友装在手提箱内带着到各地旅行。”他又说：“年轻的时候，我几乎走遍了英国乡村。”

这种幼年和青年时期的生活反映在他后来的电影中，他常是扮演那种在社会上被排斥的畸零人，被迫害，被关到监狱里，负担沉重的苦工，又随时被剥夺了工作，最后常连女人也失掉。他就用他的令人发笑的动作来表演出这种可怜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固然也有些丑角扮演过这样的人物，但他们的扮演是为了嘲笑这种人物（好像我们的传统的许多嘲笑乡下人进城受了欺侮的笑话似的）。但在卓别林的认真表演中他不是嘲笑他的人物，而是同情他的人物。固然也有许多丑角能够赢得观众的笑，使观众欢喜，但是能够赢得笑中的眼泪，喜欢以上的爱的只有卓别林这一个丑角。

这就是他在他的丑角的表演中反映了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的生活，并把深厚的同情给予社会底层的人民的原故。

他自己记叙这样一个故事说：

一天晚上我们经过道拉法普尔广场，有几个街头流浪者，我被他们所注意了。

“查利来了”。其中有一个走到我面前阻着去路。

但其中又有一个人大声地喊道：“快到这儿来，不要乱挡路。你不知道谁来了么？”



我被这种尊敬的照应所感动了，觉得很快乐。我们不是陌生的人，我是他们的朋友。我对此深深地感动了。

当一个艺术家真心地要做下层人民的朋友，并用他的艺术作品来表明他的同情是确定地摆在贫苦人民这一方面，而把他的憎恶置于迫害者和损害者那一方面——那么这个艺术家就已经是一个革命的艺术家的了。

卓别林是无愧于被称为革命艺术家的——他是一个从生活中

自发的革命艺术家

而这一个艺术家，这一个丑角，这个为全世界几乎三分之一的人自幼所熟悉所深爱的丑角，在银幕上，用他最动人的动作，表示出他对于人类生活的意见，对于政治的意见，那难道不是一件极重要的事么？

虽然卓别林自己说：“我对于宣传毫无兴趣——宣传的东西大都是沉闷的，说教式的。”

但作者是否承认自己是在作宣传，那不是重要的。作者有一个思想要表现在他的作品中，而透过具体的形象，使这思想渗入到观众的脑里心里，这就是宣传了。这种思想如与大众的利益相违背，那是反动的宣传，与大众的利益相一致的，便是革命的宣传。

为什么他要采取这丑角的表演来做他的艺术宣传的手段呢？他在讲自己的《大独裁者》时说：

我要大家笑笑。一个不准人笑的世界是没有保存的价值的。

仔细体味这句话，正如欣赏他的那些使人笑的趣剧演出一样，是会使我们感到一种凄凉的意味的吧？当一个女诗人向他说：“你



的电影内容无论怎样说也是悲剧的”。他回答说：“事实上我是厌恶悲剧的。人生是悲哀的。我只把美作为活的手段而把悲哀表现出来就是了。”

曾经生活在寂寞与贫困之中，把他的同情深深地寄托于寂寞与贫困，没有花，没有笑的广大人民。他是希望着一个充满明朗的、愉快的笑的世界的吧，而现在他只能供给一些带泪的笑，来慰藉寂寞与贫困中的人民，并作为对于不准人笑的世界的抗议。这正是

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

从卓别林的作品中，是深深地渗透着一种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的。正是这种真诚的人道主义使他成为一个艺术宣传家。在《大独裁者》初次放映时，美国工人日报的影评者说得好：“那些说卓别林的演说破坏了这电影的人，不过是表示了他们不喜欢这演说的性质，因为卓别林在《大独裁者》中是又一次宣扬了他的高超的艺术才能，他的深刻的人道主义，他对人民的透彻的忠诚。”

在卓别林和旁人讨论“在我们所看到的東西中最美的是什么”时，他举出“在一张新闻画报上看到的在大战后布朗达斯郊野耕种的一个农人的像片”。因为，他说：“这个农人可怜地躬着背，他那种耕地的决心和勇气，和他的不懈的精神，以及对残败的土地建设的意志是最美的”（《一个丑角》，第124页）。

而他在参观了监狱之后，他说：“犯人一向是非常的沉默。但为什么直到现在仍旧保持着这种沉默，我真是不了解。从人间把人类社会最文明的要素，即所谓言语也夺去了，想来实在是非科学的”（同上，第38页）。

他反对失去了笑的世界，他反对使农人土地残败，他反对把人



民的言语夺去——在他的许多影片中，他是多么爱着那些失去一切权利，孤苦无告的小人物啊。尽管他反对这些人间不平，他爱这些小人物，都只是出发于人道主义，但就凭这，他就不能不决心向世界上最黑暗的制度——法西斯制度，这制度的代表人物——希特勒开战了。

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在这时代，就不能不是一个反法西斯的战士。倘是一个艺术家，就不能不以其艺术贡献于：

反法西斯的斗争

但是在《大独裁者》最初开映时，个别的美国报纸居然有说他是作着共产主义的宣传的。这是因为他反对纳粹，并又主张一切民族间的亲爱平等。——但就是这，难道不仍是一个真诚的人道主义者所应有的理想么？

是的，共产主义者也坚决反对法西斯，也要求一个无民族压迫与歧视的世界。卓别林的演讲正表明现实的形势使得一切忠诚于良心、忠诚于人民的人都自然地走向同一的阵营，这就是使得在两年前美国的一些影评家对卓别林发生错觉的原因吧。

当时好像还有人觉得卓别林应该在所描写的两个独裁者以外，还加上“第三个独裁者”。卓别林回答说：

从我们所取的立场来说，我没有理由将他包含在内……他并没有摧残无告的人们，只因为这些人是犹太人，或中国人，或回人，或是因为他不喜欢这些人的眉眼的样子。如果斯大林这样做，那么他就会被包括在内。

这是诚恳的人道主义的声音。我们周围至今还有些人喜欢说3个独裁者这类的话，他们的见识是在卓别林之下的，——虽然他



“不过”是个“丑角”，而他们却也许是“学者”。

在《大独裁者》中，卓别林除了继续过去的作风，演出了那被欺凌迫害的小犹太人以外，他又演出了大独裁者本人，这是他第一次扮演为他所憎恶唾弃并号召千百万观众来憎恶唾弃的角色。但大独裁者在卓别林的艺术史中的特色还不仅如此。在这片子中，他又第一次让他的可怜的小人物有了向世界说出他要说的话的机会。虽然这还是偶然地借用大独裁者的化身来说的，但已预示了为卓别林所同情爱怜的小人物们以自己的本身来说话的时间已经快近了。

在1931年，卓别林漫游了世界之后说：“在世界的不安中，我看出一个新时代孕育其中。一个宗教的、社会的、经济的新时代——人类文明史尚无先例的划时代的转变已被酝酿成熟了。这个未来的新时代把我刺激得鼓舞起来。我希望能够不用陈腐的方法而用一种新的方法在这时代内完成新鲜的事物，我为这种期待激励着”（《一个丑角》，第221页）。

这种对新时代的向往，又从小犹太人的演说中更具体地说了一次。假如在10年以前这还是近于幻想的话，那么现在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大战争中，人们已经可以看见，这丑角，这人道主义的革命艺术家的幻想是快要实现了。

最初刊载于1942年11月23日《新华日报》（重庆），署名沈友谷。



何以读书人少

在报纸上的《衡阳杂记》中看到一段说，县立图书馆第一天开放时，参观人只有 21 人，而放映《孔雀东南飞》的戏院中的观众，却 50 倍于此。记者之所以特别举出这数字的对比，当然是感慨于读书人少，而看《孔雀东南飞》那样的电影的人则多，而且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在中国，固然有读书能力的人只有极少数。但是在有读书能力的人中间又只有极小一部分人有读书的兴趣与习惯，而各地设立的图书馆更只能吸收有读书兴趣的人中的极小一部分，确是不可否认的事。——这恐怕不仅是衡阳图书馆如此。

但这是什么原故呢？

假如一个人，他在什么机关里工作，他只能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为了使自己和自己一家大小吃饱肚子而活动的机器，只是在他的上级驱使之下抄写、计算或者做其他各种事务的机器，而不是在社会上、政治上独立自觉的人，可以有自己的思想，并且自己的思想也对整个社会尽一分责任，那么他就不会有追求知识、读书的兴趣与习惯。假如对于他，应该怎样思想，应该有多少思想，都已经被死死地规定了，那么纵然他是学生，他也仍不会有读书的兴趣与习惯。而一个图书馆，假如他所包含的书并不是多方面的，并不能满足各种读书人的兴趣，那么它当然就只能有最少数的人来光顾。



我想，观察一个国家的图书馆中所收藏书的范围，和来读书的人数，是可以看出这个国家在民主上所达到的程度的。因为近代式的图书馆，本是民主社会的产物，它里面必须无偏见地收藏一切书籍以公之大众，而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会使多数人有读书的兴趣与习惯。

12月11日

最初刊载于1942年12月11日《新华日报》(重庆)，
署名祝丘。



何 为 科 学

当已经没有人能公然反对科学的时候，似乎也没有再来宣扬科学的必要了。

但实际上是不然的。有些人虽也主张科学，但他所谓科学是用他自己的思想来解释的，结果他所谓科学却正是非科学，反科学。

举一个例。像冯友兰先生，我们不能说他不懂科学，但当他在其所著《新事论》中说，汉代的三统五德说也是一种科学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说，这正是对科学的歪曲说明。

我们知道，在汉代的讖纬之说中，有所谓三统五德论的，把古代的朝代硬套上自己预定的公式中去，或为金德，或为水德，或为土德……或为赤统，或为白统，或为黑统，甚至为了使公式配得上，可以捏造或改变古代的帝系，这实在是最主观主义的，最反科学的说法。而冯先生却以为，“他们的看法，都系从类的观点，以观事物者；就此方面说，汉人知类，汉人有科学底精神”。但我们知道，分类对于科学固然是必要的条件，但却决不是充足的条件。倘若不从客观的事物出发，而从主观的头脑里捏造出若干概念，以之套上客观事物去，那恰恰是最不科学的。固然冯先生并不是赞成汉人的一切说法，他说“此等知识之内容，虽可以说是荒谬绝伦者，而其形式却不妨仍是科学底。此所谓形式，即指一切科学底知识所同然者。一知识如其有一切科学底知识所同然者，即是科学底”（第4页）。那



么由此足以证明，冯先生所说的科学，不过是脱离了内容的形式。假如我们接受对于科学的此种看法，把最荒谬绝伦的说法和严格地根据现实而得到的理论，只因二者的形式上都有分类的表现，即视之为同样的具有科学精神，那么我们现在来提倡科学，提倡科学精神还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在提倡科学，提倡科学精神的时候，必须先弄清楚科学是什么？

最初刊载于 1943 年 1 月 5 日《新华日报》(重庆)，署名友谷。



做更强的人

抗战已经到了更接近胜利的时候，也到了最艰苦困难的时候。艰苦的时期是有办法度过去的，困难的问题是有办法解决的。我们知道了具体的办法，当然就有可能度过艰苦，克服困难。

但是也很显然的，倘光是有办法而没有能执行这办法的人还是不行的。如同要通过大沙漠虽是艰苦的事，但不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是有办法的。但假如旅行者的体力不济，纵然按照办法行事，也还是会在中途倒毙的。而要通过像现在这样的艰苦的历史时期，就不仅要有能应付各种艰难的体力，而且要在任何复杂的境遇下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不为任何困难吓倒的精力。没有强烈的意志使自己在任何环境下不放弃自己的信念和工作岗位，没有旺盛的精神使自己无论逢到什么遭遇决不灰心丧气，退缩屈服，那么，这种人是不能度过黎明前的黑夜，去迎向光芒万丈的晨曦的。

从1789年以后，八十几年间的法国的国内的斗争中，锻炼出了那样一种英勇坚决的人，这种人终于创造了巴黎公社那样伟大的事业。从十月革命以后的25年间的社会主义建设锻炼出来了那样一种无论在智力、体力、精神都高度发展了的人，这种人终于创造出了像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那样神奇的事业。——“历史是人所创造的”，在越是艰苦困难的历史时期中就越是能显出这句话的分量。



我们要让我们所遇到的困难艰苦来锻炼自己。我们不要只是愁穷说苦，一味埋怨环境，却把自己的力量忘掉了。我们更要加强自己，使自己成为更强的人，去创造更伟大的历史！

1月20日

最初刊载于1943年1月20日《新华日报》(重庆)，
署名友谷。



希特勒还没有死

美国前驻苏大使台维斯在广播演说中说：“德国国内之哀痛及忧虑，似暗示希特勒可能业已逝世。”（合众社4日纽约电）

希特勒这个罕见的姓，已经成为了有史以来最丑恶野蛮的一种思想、文化、制度的代表了。他假如真的死了，当然大快人心，但台维斯的猜测固未有什么旁的证明，而我们敢断然说，希特勒还没有死！

希特勒还没有死，因为轴心国的武装还没有被全部解除。在每一个轴心国的钢盔下面都是希特勒的面貌，把轴心国彻底缴械的时候，希特勒才是真的死亡！

希特勒还没有死，因为法西斯的思想还没有从人类的头脑里彻底铲除。每一种反对民主的思想，民族侵略的主张，归根结底是皈依在希特勒的神坛前面。当我们把希特勒的肉体消灭的时候，他们还会叫希特勒的精神继在。

整个的人类历史固然向我们证明了，凡黑暗倒退的势力最后是必然要死灭的；但同时也证明了，黑暗倒退的势力，正如百足之虫一样，是有着坚韧的生命力的。假如一次不把它连根铲除，它就还会若隐若现地绵延其生命，而在适当的机会再次三次地重新挺立起来扰乱和平幸福的人类生活。

希特勒也不会那样快地死亡。全世界曾经因为希特勒的罪恶



而忍受了无比巨大的痛苦，全世界已经因为消灭希特勒而付出了无比巨大的努力，但是希特勒现在还没有死亡。让我们更勇猛坚决地前进吧，为了使希特勒彻底地死亡——不仅使这个人，而且使这个人所代表的思想和力量从这个世界上连根的死亡！

2月9日

按：如大家所知道的，希特勒是到了1945年纳粹德国最后灭亡时才死。以前的传说自然都是谣言。但是到了现在，也还有相信希特勒还没有死，至于希特勒的“化身”，更没有人敢断言已在这个世界上绝迹。

1945年10月

最初刊载于1943年2月9日《新华日报》(重庆)，署名洪索。



“死 魂 灵”

“死的拖着活的。”——这的确是非常可怕的事。

一个民族，它的过去无数年代的历史，固然可说是已经死去了，但死去了的历史全部却仍然会积压着，隐然存在于新的生命之中。固然在全部历史中也有积极的因素，可以鼓舞这民族走向新生，但却不能否认其中消极的因素总是占着更大的比重，假如不能断然地和这些隔绝，那就必然会被拖累着难以走向新生。

可悲的是人们常常捧着死的骷髅，看作是奇珍，来排斥新鲜、活泼、有生命的事物。人们还假意地承认这新的生命，同时却继续颂扬那死的幽灵。但是既然自认是上帝的信徒，实际上却和魔鬼结成好朋友，其真实面目总不外乎只是以魔鬼来拖累，来阻挡，来扰乱上帝的道路。

公然反对医药的人是几乎没有了，但是以为骸骨必须珍重，不能作为解剖实验之用的人，岂在少数呢？所以郭沫若先生要大声疾呼：不能再让死的拖住活的。而死的对活着的拖累又不仅表现在这一事上。假如人们既好像是提倡科学，却又在唤起五行与八卦的亡魂；既好像是主张民主，却又在复活三纲五常的死魂；既好像是不反对妇女解放，却也毫不放松男女内外的“古训”；既憧憬于近代工业的文明，却又死抱住以农村小生产为基础的，据说是“永远不变”的社会组织，那么这些就都不仅是以死的来拖累活的，而且是以死



的来杀害活的了！这些乞乞珂夫们正在搜集一切“死魂灵”，来阻塞在新鲜的生命的发展的路上！

但纵然在前面挡，在后面拖，新鲜的生命终归能从骷髅堆里艰苦地开辟出向前发展的道路，这是我们所深信不疑的！而要使新鲜的生命，科学与民主，能够顺利的发展，那就必须首先肃清一切旧时代残留下来的“死魂灵”，不再听任它们作祟！

2月25日

最初刊载于1943年2月25日《新华日报》(重庆)，
署名陈桑。



爱 与 憎

有一种论调，叫人不必对事情有什么自己的意见，表示自己的态度。因为一切意见和态度都已有先知者代为筹划好了，你们这些不配称做先知者的人只要照着去干就行。——这种论调虽不是驱人为木石，因为还有行动，但也与犬马相去不远了。

于是另一种论调说，凡人对于事情只应该有是非的观念，不必有爱憎的态度。一有爱憎，便有所牵累。——但是灭爱憎与存是非，二者其实是不能并行的。既消灭了爱憎之情，对事情没有了鲜明态度，则也就表现着，他对于是非并无判别。

于是又有最后一种说法出来，其说曰：爱是可以有的，但恨却不应该有。这种说法很露骨，因为它是叫人爱忠臣，也要爱暴君；爱鲜血，也要爱跳蚤臭虫；爱健康，也要爱大麻疯……例如屈原，据说就是“只有爱，只有怨，怨而不乱，决没有恨”。而且听说还有人写过这样的剧本，其中是连敌人汉奸也写得有可爱之处，那就是完全合于这标准的了。

在跳蚤与臭虫们所写的文学作品中，把吃血者和被吃血者写得一样地可爱，自然是不足怪的。而他们所真正觉得可爱的其实还是吃血者，那也是不问可知的。然而屈原，这个有着分明的是非与热烈的爱憎的大诗人，也被拉来做同道，却是对他的一种侮辱。“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杰兮，固庸态也。定心广志，余何畏惧



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这正是屈子的愤激的声音。

鲁迅说得好，“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能爱才能文。”——没有对于吃血者的憎，哪里会有对于被吃血者的爱？

3月3日

最初刊载于1943年3月3日《新华日报》(重庆)，
署名洪素。



入世与出世

“入世有烦恼，出世不可能”。——这曾是自古以来许多人生哲学家加以探讨的问题。

大凡到了一个动乱激荡的时代，由于对现实不满意，而又没有勇气深入现实去求改革现实，因而失掉了对前途的信心和希望，知识分子常常卷入这种问题的考虑之中。

像弘一法师那样地削发做和尚，虽然也并不能真正出世，但在其主观上总是采取了出世的解决办法。然而既然是直到他圆寂以前究竟也不能算是真正出世，则出世的办法毕竟仍不是妥善的解决办法。

既然不采取出世的办法，而又仍是没有勇气与能力面对现实、变革现实，那么徘徊在出世入世之间，就产生了一种主张。其说曰：生活与一切行为尽管是在人世间，但在精神上则可培养一种广大的“自觉”，自觉他是“宇宙间的人”，而以超然的心境来俯瞰人世一切。这是聪明的办法，不如释家那样苦苦地追求现实生活的解脱，却能得道家的三昧，虽入世而仍出世。

以入世为烦恼，却仍过入世的生活，而在入世的生活却又培养起出世的心境，这难道又是可能的么？

不能满足于这种自己骗自己的办法，另一些人就大声疾呼道，无论是在现实生活和心理上，出世都是不可能的；但能够入世而无



苦恼的，就必须有着超人的力，我们自己若不能成为这样的超人，那就应该去依附一个超人的力。这是尼采的论调。既然按照尼采的说法，超人的英雄，在一个社会上不过是极少数人，甚或只是一个人，那么其他的人就只好安于做英雄手下的奴隶，在现实前面做奴隶了。而且既不能从正视现实而获得改革现实的能力，却凭空幻想什么超人的伟力，那岂不是软弱的知识分子的哀鸣么？

这两种说法都无非使人在主观幻觉上成为现实的主人，而在实际生活中做现实的奴隶。让我们听一听那从实际的斗争生活中产生出来的警言吧。“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点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生活”。

3月10日

最初刊载于1943年3月10日《新华日报》(重庆)，
署名苏浩。



科学研究的態度

很多做科学工作的人常常会因为他们的专门学术研究和实际的社会生活之间的矛盾而苦恼。也有许多人以为解决这矛盾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把自己关到科学研究室里,不要让室外的世界的变动来“扰乱”自己的工作。他们以为假如在研究中顾虑到社会的实际功效,那是足以损害研究工作的尊严的。

这种想法实在是很错误的。社会的风浪不是研究室的墙所挡得住的,而且科学研究的结果终于是要跑进实际社会生活中去的,当科学家一旦发现自己闭门所造的车,出不合辙,也不免会茫然自失了吧。但是我们反对这种想法,却并不主张另一极端,以为科学研究必须贪图急速的功效,甚至以为一个科学家在任何时候安静地留在研究室里就是罪恶。

解决上述的矛盾,是要使专门的学术研究和实际的社会生活二者间获得适宜的统一,而不是以其中的一方面来否定另一方面。关于这点,马克思——他就是孜孜不倦的科学研究者,同时又是社会主义的实际运动家——的生平是一个极好的模范。拉法格说:“虽然马克思以为必须为科学本身而研究每门科学,在我们进行科学研究时,不要惑于研究所能达到的结论;但是他主张有学问的人,假如他不愿自贬身价的话,必须不停止积极参加社会生活,不满足于把他自己关在书房或实验室中,像酪中之蛆一样,逃避生



活，逃避他那时代的社会和政治的斗争。”

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常常以为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为了一定的结论而研究，是把专门研究看做实际生活的一个附属的零件一样。那么在这里所说的恰恰相反，原来为科学本身而研究科学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绝对排斥的一种态度，而正是他所主张的。但马克思主义者又绝不使自己成为“酪中之蛆”。他们一面诚诚恳恳地做科学研究工作，一面仍旧要不断地向书斋或实验室外呼吸那时代的社会和政治的斗争的空气，使这种空气也流进他手下的工作中。这岂不也正是做任何科学研究工作的人所应该有的态度么？“科学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娱乐，那些从事科学研究的幸运人，首先应该贡献他们的知识给人类服务。”这句话正是马克思所常常喜欢说的。

最初刊载于1943年3月26日《新华日报》(重庆)，
署名陈桑。



中国的声音

——献给音乐节

中国人在历史上，曾经长时期没有声音地生活着。

固然中国人民中也有传遍南北的孟姜女，不能说是完全没有声音，但这种声音是何等微弱啊！那是在一年年、一重重积累下来的重压之下，所发出的无可奈何的凄婉的声音！那不是人民从胸膛里发出来的完全的声音。这些调子不能打破无声的中国。

所以鲁迅先生在 15 年前一次演讲中说：“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人会没有声音的么？没有，可以说：是死了。倘要说得客气一点，那就是：已经哑了。”

但人究竟还有着的。既有着人，就还是会发出声音来的。抗战爆发了，千万人民起来为生存斗争了，“救亡”的歌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响遍了前方、后方、农村、工厂、街头、原野——这是何等宏亮的声音啊！

无声的中国发声了。

但是不过几年，抗战的火焰依旧在燃烧，代替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们却曾在大后方听到了“人生能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的凄迷哀怨的歌声的弥漫。这不能不使我们想起了那在千年以来中国被压迫的人民所发出唯一可以使人听到的“孟姜女”的声音。那种真实的，健康的声音到了哪里去了呢？



鲁迅先生在那篇演讲中又说到旧时的文人道：“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刊、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时代的韩愈、苏轼的声音，而不是我们现在的声音。然而直到现在，中国人都还要看这样的旧戏法”。——这所讲的，是做文章。但声音直接的表现——音乐，更何独不然？孔子听了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也许是十分美妙的吧，然而却是 2500 年前的声音了。我们要的是现代的声音！

我们要现代的真实从人民生活中发出来的声音！

有石在，火种是不灭的。有在战斗中生活着的人，真实的战斗声音也不会灭的。“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让我们的音乐家谱出人民生活中的真实的声音吧！让人们能够满腔精力唱出真实的声音吧！让全世界听到现代的中国人民的真实的声音吧！

4月5日

最初刊载于 1943 年 4 月 5 日《新华日报》(重庆)，署名陈桑。



黑 影

读左拉的《卢贡家族的命运》，这是他的 20 卷的巨著《卢贡马卡尔家传》的第一本。在这里面，对于在 1848 年二月革命与 1851 年拿破仑第三政变之间的时期，表现在一个小城市中的政治斗争，有非常动人的描写。在这 4 年中正是法国恢复民主共和的时期，但在暗中，那些贵族教士们却偷偷摸摸地在进行着各种阴谋。试看左拉怎样描写在一个小城市中贵族区的情形：

“贵族们自己严密地幽闭着。他们很少外出，匆忙地回到他们沉默的大邸宅里，偷偷摸摸地行走，好像是在敌人的国土里一样。他们的居住区是带着有如一所坟场那样的沉闷的清静。间隔久久的，人们看见一个修院长老经过，而他的谨慎的步履姿态在关闭的屋子的沿列上更增加了一种沉寂，他像一团黑影似的在一道半开的大门中消失了。”

这里所用的文句很简单，但使我们分明地感到笼在黑暗中的千种阴谋，藏在沉寂中的万般诡计。修院长老的黑影更显出鬼蜮的神情。他们不在修院中讲经说道，却出入于这些半开的大门之间干什么？而在那庄严的道袍之中所包藏着的活动是不简单的。

左拉所描写的这种黑影的活动终于使法国的第二共和国崩溃，给野心的拿破仑第三以登极的机会。诸如此类的历史教训使得现在的人们已经懂得，在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之间，也还要注意那躲



在黑暗角落里的活动。

但是也由于历史经验的积蓄,使得歹人们也更加聪明了。他们甚或表面上并不太遮遮掩掩,偷偷摸摸,而同时他们的黑暗的阴谋诡计也躲藏得更加严密了。因此,我们就更要大张警觉的双眼,看住那若隐若现的“黑影”。

4月8日

最初刊载于1943年4月8日《新华日报》(重庆),
署名卫建。



墙

每个人都希望有一间自己的屋子，这就是说，每个人都希望有四垛墙把自己包围起来。当然人们又都不忘记，要求在这墙上有宽阔的窗子，可以眺望外面的天地，又有自由的门，可以让旁的人进来，也让自己走出去，到人群里面去。否则，最坚固的墙莫如监狱，但住在那风雨不入，盗贼无虑的监狱的墙之间的人，是用着如何渴慕愤怒的目光，望着那在墙壁上方只容一线阳光进来的装着铁杆的小窗子啊！他们是多么希望打破这四垛墙，生活到那没遮拦的大自然界和活跃的人群中间去啊！

但除了这种用石头、泥土筑成的墙以外，人们又常为自己筑起包围着自己的精神的墙。建筑这种墙的原料是自私心、偏见、成见、习惯、兴趣，甚至理论。而且人们都知道，在那种实质的墙上要开窗开门和外界沟通。只有在被强迫的情形下，才会进入那无门无窗的监狱中间。反之，人们却会自动筑起那精神的墙，连一扇最小的窗子都不开，自愿地局促在四座墙之间做囚徒。他们还因为人们不能侵入到自己的墙里面来而得意，却没想到自己也丧失了自由地和墙外的自然界与人群共同生活的真实快乐了！

难道理论也能成为这种精神的墙的建筑材料么？能的。当理论被僵化成为教条的时候，它就成为建筑这种封闭自己的感觉与心灵的最坚固的墙了。很多人把一层又一层的教条堆积起来，上面



一个空隙也没有，于是安心地躲在里面：满足于抽象的思想法则，却再也看不到丰富活泼的实际；满足于正确和错误的呆板标准，却再也感觉不到一点真诚的喜爱和憎恨；满足于空洞的理想与愿望，却再也不关心真实的人民的命运。实在说来，他们和那在监狱中的囚徒有什么差别呢？所不同的是后者还永远不放弃打破这包围自己的墙的渴望，而前者却还欣慰着，从此以后“错误”的思想与感情再也不会侵犯到自已了。

4月10日

最初刊载于1943年4月10日《新华日报》(重庆)，
署名李勃。



科学与民主

明天就是五月四日了。想到“五四”文化运动，当然就立刻想到当时所提出来的中心口号——赛因斯和德谟克拉西。

在今日来为当年的“五四”文化运动有所辩护，其实已是不必要的了，因为它在中国民族的自觉的斗争过程中的功绩已是清清楚楚写在历史上，不能被抹煞的了。对于那至今还企图否定“五四”文化运动的功绩的人，我们只要问一下：我们要不要民主？要不要科学？

很显然的，直到今天，我们也仍旧迫切地需要科学，需要民主。而且我们还不得不像“五四”当年一样，把科学与民主二者互相联系着一起提起来。因为在这二者之中，任便舍弃其中的一个，独取其一，都是非常不合理的事。

固然只有通过民主的生活，才能从人民大众中生长出伟大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假如不经过科学的洗礼，那还是发生不了实际的效果。从封建时代的农民战争中就常可看到这种情形。另一方面，科学对于客观的现实，固然可以起实际的效果，但倘若不通过民主的洗礼，科学的力量也可以被利用来对抗人民大众，对抗历史进步。法西斯国家的情形就正是活生生的证明。

正因为民主不能和科学分离，所以民主的内容决不能用愚民的手段来填充；正因为科学不能和民主脱离，所以民主的内容就决



不仅是相等于工业技术。德先生和赛先生，我们还是和“五四”运动当年一样，欢迎你们二位一起携手而来，我们决不容许人家扼死你们中的任何一位！

最初刊载于1943年5月3日《新华日报》(重庆)，署名博仁。



潘麟的漂流

前几天报上刊一合众社的电报，报告有一个从击沉了的商轮中逃出来的船上伙夫，用一只小救生艇，在茫茫大海上漂流了132天的故事。这故事的主角是中国人，可惜他的名字我们不能知道，只知道其发音大约是“潘麟”两个字。

合众社记者报告这消息，似乎还不仅因为潘麟在救生艇中的漂流的时间打破了世界纪录，而且因为潘麟是个中国人，想从潘麟的漂流经过中看出中国人民的性格与情趣。据说，潘麟在获救后告诉人道：“我自以为必死，但我并不烦恼，中国人是永不烦恼的。……我歌唱中国民谣来消磨时日，我靠月亮知道时日”。能够在海上孑身漂流了100多天，这表示中国人民性格的坚忍，虽处在几乎是绝望的情况中而不“烦恼”，这表示中国人民性格的乐天。——的确，坚忍和乐天这两种性格是常被人认为中国人民的优良性格的，也正是潘麟成功的原因。

但是我们也不要忽视这两种性格在消极方面的意义。坚忍诚然是好的，中国人民在历史上几乎不断地过着非人的生活，因此养成了无论在什么坏的境遇下都能活下去的那种生的执拗性。但坚忍一加上乐天知命，就消失了为现实的目标而积极斗争向前的努力，成为逆来顺受，随遇而安，只是在心理上给自己以解说与超脱。于是坚忍变成苟安，乐天变成麻木。——这便是这两种性格的最



坏的表现了。

但我们也不必因此就有民族的自卑感。当把苟安、麻木的成分去掉，从积极方面来发挥坚忍与乐天的性格时，那就是韧性的战斗精神和永不灰心的乐观态度了。既然靠了这种民族传统的特质，潘麟完成了他的惊人的漂流的历史，那么在把这种精神和态度发挥起来时，中国人民是一定能创造出惊天动地的历史来的。

5月29日

最初刊载于1943年5月29日《新华日报》(重庆)，
署名陈桑。



民主与诚实

在任何社会里，诚实总是被看做一种美德，而在民主社会里，尤其是非看重诚实的态度不可。

诚实的内容包含着一致的意思——那就是思想和言语的一致，言语和行为的一致，思想、言语和客观事实的一致等等。

心里怎样想，口里也怎样说；嘴里怎样说，手里也怎样做，这叫做诚实。想什么，做什么，决不瞒人，老老实实说出来，与天下人共见，不另外说一套，以图掩蔽天下人耳目，诚实更是非如此不可。

言语思想都是为了解释和说明客观的现实，行动也是为了应付现实。但对于现实的真象，固然未必个个人都能完全知道，但总不能不以与现实完全一致为其目的，因此也就不能不努力去追求对现实的完全了解，更不能故意掩蔽现实，反乎现实而行。假如指鹿为马，是真以为这是马，那还不过是无知；但若明明心知为鹿，而偏偏说这是马，那就是无赖了。

诚实是对人的态度，但也是律己的准则。假如故意说假，而旁人相信，便津津自喜，以为得意，其人必不可救药。用不诚实的态度对人，固然是对人的侮辱，其实又是对自己的侮辱。

我们相信，倘大家没有这样诚实的态度，民主就不可能存在。民主讲究讨论商量。但假如开会时大家说了一大套，却全不真是心里所想的，会散后人们各做自己的一套，那么民主的世界岂不成为



欺骗的世界了吗？

要发扬民主精神就得建立诚实的态度。这种态度也并不是舶来品，而是民族的固有道德。心口如一，言行一致，说一是一，这原是民间向来的要求。

7月16日

最初刊载于1943年7月16日《新华日报》(重庆)，
署名李勃。



墨索里尼和马志尼

墨索里尼的倒台使我想起了马志尼。因为和墨索里尼相反，马志尼正是意大利民族中的民主主义的伟大的先驱者。虽然马志尼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人物，但是正在从事彻底铲除法西斯力量，争取自由民主的意大利人民是会亲切地想起他的名字的吧。

关于马志尼，中国人一向知道得很少。但福建的改进出版社的《世界大思想家丛书》中却有一本关于他的书。从那本书我们可以大概看到一些他的思想和生活。

向他所领导的革命青年，马志尼说：“（被略）”，他又不住地反复申说，“意大利得救之望全在其人民身上”。因为他有着对人民的极端信心，所以他曾在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未成功时就已用最鲜明的话反对独裁制，（被略）所以他不能忍受在革命的进行中，人们拿反民主主义的精神来歪曲革命，他痛斥在 19 世纪 30 年代各国民主革命中的变节者说：“到处都有虚妄的、有毒的理论使革命离开真正的目标。某一社会阶层的理想被用来代替整个民族求全体的解放的理想；乞助于外国的思想削弱了或竟消灭了自力更生的思想。没有一处的推动者、领导者、或革命政府，曾用充分的决心和毅力来发动全部的力量，使他们一律投身于决定国运的争斗中。没有一处担当领导责任的人，其行动听命于负有伟大使命的自觉，对其能够完成的信心，以及对其时代及其主要思潮的真正理解。”



因为他是一个忠诚坚决的民主主义者，所以他虽是“意大利复兴三杰”之一，但甚至在意大利建国工作完成之后，他还是在外国流离颠沛——他不满意于君主政体，他对民主的信念永不减弱。他说：“无论什么暴政，即使是最恶劣的暴政，在10年、20年、30年之内必然会引致自由的更大发展。照着存在于自然界的一条基本法则，（被略）”——这话恰恰就是对于在他80年后墨索里尼的命运的预言。

没有人能否认马志尼是意大利的爱国者，他毕生为意大利民族而奋斗。但是马志尼之为爱国者和墨索里尼之为“爱国者”是根本不同的，因为前者同时是民主主义者，后者却是民主主义者的敌人；并且前者又曾号召“一切国家的自由人联盟”来反对专制政治，而后者却是把意大利带到侵略战争中，成为屠杀一切国家的自由人的刽子手。马志尼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墨索里尼却是祸国的罪人。意大利民族中有马志尼是它的光荣。意大利民族中有墨索里尼是它的耻辱！

7月31日

按：那时在重庆报纸上，说墨索里尼不失为一个爱国者的文章很不少，但要说他不是爱国者的文章都不易发表出来。在尝试了几次失败后，我试写此文，但经过官方的检查，所引马志尼的话“被略”了很多，现在找不到当时参考用的书，也就不去补上了。

1945年10月

最初刊载于1943年7月31日《新华日报》（重庆），署名陆曼。



向西挺进

《真理报》社论说：“心里怀着神圣复仇的要求，怀着必胜的意志，苏军将士们向西挺进着”。

苏联红军用着巨人的步伐向西挺进。他大踏步地越过那被纳粹的血污秽了的河流，被纳粹的尸体糟蹋了的草原，被纳粹的毒手所毁灭了的乡村城市。现在在红军前进的步伐下，河流和草原又快活起来了，乡村和城市又复活起来了，被仇恨深锁着脸的人民又沐浴在自由的阳光下了。

苏联红军继续不断向西挺进着。在西方，还有大块的苏维埃土地，仍在黑夜的笼罩之下，等待红军的到来好像等待太阳一样。在更西方，还有整个在奴隶的锁链中的欧洲，它已经在开始挣扎着，争斗着，它远远地听着那红军向前挺进的脚步声，从每一个沉重而着实的脚步声中获得比从一千句空洞的诺言中更多的勇气。

苏联红军用着排山倒海的力量向西挺进着。在他们的脚步下面，纳粹的全部战争机器化作了灰烬，戈培尔的宣传沙哑得不成声音，希特勒的脸色越来越灰白了。全世界的法西斯力量在红军更向西挺进一步的时候，更发抖得厉害，因为这每一步都是在为他们更紧迫地敲起丧钟。

苏联红军用着坚定的、胜利的脚步向西挺进着。全世界的眼睛都看着他们的脚步，虽然这些眼睛中，有些是惊讶，有些是害怕，有



些是嫉妒,但是最大多数的眼睛却是充满了感激和兴奋、信心与希望。对于全世界人民,红军向西挺进的每一步,都更增加了一分对这无敌的力量信心,更增加了一分对人类的明天的希望,更增加了一分在今天向法西斯敌人搏斗的勇气。

苏联红军带着自由人类的要求和崇高的意志,向西挺进着。

9月10日

最初刊载于1943年9月10日《新华日报》(重庆),
署名沈漠。



科学不是招牌

人们还必须来反反复复地解释科学的重要，提倡科学，这固然表明至今科学还没有能在社会生活中起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科学的实质虽没有充分发扬，科学的名义却已不胫而走，到处可以看到了。科学成了一个招牌，给市侩的商品作宣传；甚至科学成了一个烟幕，给迷信欺骗作掩护。月饼的广告中用着“科学焙制”这样的字样，或者还不值得计较，但“科学圆光”、“科学扶乩”、“科学相面”这样的说法也一直是大吹大擂，那实在是不能不令人愤怒的。

偶然看到一块“科学相面”的招牌，人们大概总是一笑置之的吧。但仔细一想，这实在不是可以一笑置之的事。在这情形下，其实是这块招牌，在嘲笑着你，它代表了整个的腐败落后的旧社会，在向你讲：你们不是提倡科学么？你们不是反对迷信么？但是我倒偏偏不反对科学，而且我也可以就是科学。——于是胜利者不是你而是它。招牌依然高高挂着，骗人的勾当依然在继续进行着。科学没有打倒它，好像倒只是为了供给了它一个更有利的骗人的名义。

这才是科学以及一切进步事业所可能遇到的最可怕的敌人。

这个敌人就是通过那样长期的封建时代的历史而积累起来



的落后生活，在里面根深蒂固地培植着无数黑暗的、可怕的细菌——它是一个黑色的染缸，它大张着口容纳一切东西，好像并不拒绝企图淘净它的东西，而一切东西跑进去时，它却不动声色地吞噬了它们，浸润了它们，终于使它们变成了和自己一样的颜色。

真正的科学，为了对付这样的敌人，就必须打韧仗，用最执着顽强的精神打仗，永远不妥协，永远不懈怠，自己要站得稳，立脚点丝毫不让步，对敌人要不放松，永不轻易地承认胜利。你挂着的纵然是科学的招牌，但你干的还是“圆光”、“相面”这一套，那不行，还得指出你是反科学的迷信，非和你打到底不可。纵使你用了分光镜、凸透镜来圆光，你用了X光来相面，还是不行。你既然还是在那里给人胡说八道，推算流年，那你还是科学的敌人。假如我们高兴地以为，连江湖术士也得假借科学的名义，足见科学的重要已被人承认，那么我们就已变成敌人的俘虏了，因为这样一来，就是自动把科学的阵地放松，使敌人获得了一个缺口冲进来了。

无疑的，科学正是一个最有力量的东西，足以淘净这个黑色的染缸。它是一个巩固的阵地，因为它是以客观的事实为基础的。但是阵地纵然巩固，仍旧需要人去坚守。何况反科学的敌人凭借着那样深厚的传统，正是不可轻视的力量。当你让出了一个缺口给敌人的时候，它就会像纳粹军队惯用的楔形攻势一样，漫山遍野地冲进来了。

你看，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河图洛书，阴阳五行、太极八卦……这一大堆东西都是在寻找机会，好把自己装成科学，钻进到科学阵地里面来呢。

所以真正的科学，为了要能确实地取得胜利，就必须认真地把



这一切反科学的东西，从它们的巧妙的化妆之下，揭破出其真实的面貌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总究还是属于真正的科学。

10月10日

最初刊载于1943年10月10日《新华日报》(重庆)，署名陈桑。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 都和我有关”

——读《且介亭杂文》的笔记，用以
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

一连差不多两个星期没有看见晴天了。枯坐在室中，望着窗外弥漫在山头谷间的似云非云，黯黯淡淡的烟雾，整个心也好像压在这烟雾下面低沉下来的。就在这时，忽然想到再过4天就是鲁迅先生的逝世7周年了，不由地感到一阵激动。真的，只要一想到这个伟大的名字——鲁迅，那么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中，勇气是总会来到人的心头，而把那低沉的情绪压盖过去了吧。

于是随手翻开《且介亭杂文》来，就读到了这样的话：

庄生以为“在上者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死后的身体，大可随便处置，因为横竖结果都一样。

我却没有这么旷达。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吃。……

这是一种何等严肃认真的态度啊！

这里在文字上说的是死后的处置，但表现的意思却是生活的态度。庄子说，死了把尸首给天上的飞鸟吃，给地下的小虫吃，还不都是一样，哪里值得去计较？但他所认为不值得计较的，却不仅是死后的处置，而且死与生在他看来其实根本就没有差别，生也好，



死也好，也值不得去计较。既然如此，那么在生活着的时候，到底是怎样地生活，应该怎样地生活，也就同样是值不得去计较的了。这样生活也好，那样生活也好，反正是这么一回事，一定要有所选择，有所争取，岂不只是自讨苦吃么？——这正是老庄一派思想中所包含着的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在整个民族——特别是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生活中所起的坏影响是不能低估的。这种生活态度就是“马马虎虎主义”，就是对一切不认真的态度。那么，鲁迅在他毕生中是不仅以其文章，而且以其实际的生活，和这种生活态度坚决斗争到底的。他对一切事情都要认真，决不苟且随便，他决不希罕那士大夫阶层所引为自得的“旷达”，所以甚至死后的尸首，假如非喂给动物吃不可，给什么动物吃，也得计较一下。

历代的士大夫，纵然本来也满怀热烈，然而一遭到流离丧乱，痛苦颠沛之际，就往往堕入了道家思想的烟瘴之中，于是便努力使自己对一切无所用心，把不敢去计较一切的懦怯的心情，用“一切都不值得计较”的理由来掩盖下去。于是活着是做真正的人，还只是做奴才，也和死了是喂狮虎，还是喂癞皮狗，同样都是无可无不可的事了。既不敢正视现实的生活，自然只好努力使自己生活在冥想之中，最后就如鲁迅先生所说的：

冥想的结果，拟定了两手太极拳。一，是对于世事要“浮光掠影”，随时忘却，不甚了然，仿佛有些关心，却又并不恳切；二，是对于现实要“蔽聪塞明”，麻木冷静，不受感触，先由努力，后成自然。第一种的名称不大好听，第二种却也是却病延年的要诀，连古之儒者也并不讳言的。这都是大道。还有一种轻捷的小道，是：彼此说谎，自欺欺人。

到了“自欺欺人”，诚然是最卑劣的手法。但是假如已做到“对世事要浮光掠影”，“对现实要麻木冷静”，而且渐渐从努力而习惯



成自然，则离开“自欺欺人”，也就不过是相差一步而已。所以鲁迅在批评一些 1926 年以前的作家们的作品时，提到有一个作家借“秋雨的诉苦”，来表示“我现在要离开这世界，到地底去了……”的哀思，他的评论是：

这和爱罗先珂的悲哀又仿佛相象的，然而又极其两样。那是地下的土拨鼠，欲爱人类而不得。这是太空的秋雨，要逃避人间而不能。他只好将心还给母亲，才来做“人”，骗得母亲的微笑。秋天的雨，无心的“人”，和人间世界是不会有情愫的。要说冷静，这才真是冷静；才能够和“托尔斯小”的无抵抗主义一同抹煞“牛克斯”的斗争说；和“达我文”的进化说一并嘲弄“克鲁尼特金”的互助论；对专制不平，但又向自由冷笑。作者是往往想以诙谐之笔出之的，但也因为太冷静了，就又往往化为冷话，失掉了人间的诙谐。

而鲁迅自己，在他一生中，是也有过悲哀的，但这悲哀的产生，不是由于要逃避人间，却是由于要更迫近人间。在他的文字中，是也有诙谐的，但这诙谐却决不是对现实世界没有情愫的冷话。因此他的悲哀表现着沉重的人间的苦难，他的“诙谐”乃是有力的讽刺，他说：“如果貌似讽刺的作品，而毫无善意，也毫无热情，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那就并非讽刺了，这便是所谓‘冷嘲’。”

其所以有悲哀，有讽刺，自然都由于主观和现实的冲突的结果，但无论怎样冲突，鲁迅永不放弃对现实的认真探索，永远不停止从现实中辨明是非，从现实中燃烧起爱憎，这真是鲁迅的伟大之处。他之所以毫不留情地斥责一切苍白面孔，稍遇挫折，就立刻初而徘徊自怜，继而冷静麻木的知识分子，也正因为他在他们的面前，是无限雄伟坚实的存在。在鲁迅逝世前 2 个月，他写过一篇文



章,说到他在病中的一个夜里躺在床上情景: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旁点引者加)

啊,假如鲁迅还活着,他也许不愿意我们称他是伟大,而宁愿我们只称他是一个切实地生活过来的人吧。其实他的伟大就在于他的切实的生活,就在于无论怎样的病痛和苦难,都不能阻止他,使他不想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他“有关”;更不能阻止他,使他的一切感情和思想不和“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发生密切的关系。

鲁迅曾批评一位先生的艺术理论。这位先生说:“艺术的最高境界却不在热烈”,而在“静穆”。什么叫做静穆呢?“静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以说它泯化一切忧喜。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这种理论的真实意义无非是说,艺术的最高境界的产生是由于对现实漠然不关心的态度。既能“泯化一切忧喜”,自然就是对现实没有情愫,也就首先必须使自己相信,外在的一切事物和一切人都与自己无关。这种理论至今还被有些人喜欢,反复搬弄不已。可是鲁迅早已指出了:“自己放出眼光看过较多的作品,就知道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这是非常精辟的看法。真正伟大的艺术作品决不产生于



对现实的浮光掠影、冷静麻木的态度中间。而特别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因为有着那样沉重地积累下来的道家的玩世逃世的传统，倘更要去把静穆的境界当做向往追求的目标，所得到的就一定只是艺术和整个精神生活的死亡。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他能突破这传统，打翻这传统，用这样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发着金石的声音高唱着：

文人不应该随和，而且文人也不会随和，会随和的，只有和事老。但这不随和，却又并非回避，只是唱着所是，颂着所爱，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

最初刊载于1943年10月19日《新华日报》(重庆)，署名洪索。



感激与祝贺

——寿叶圣陶先生

贺圣陶先生的 50 寿，我愿说出我的感激的话。

回顾我学习写作的过程，我要感激几位先生。其中有两位是我在初中时候的国文教师，他们不像后来我所遇到的教师那样，填鸭似地把史汉论孟的文章教学生死念活念，却启发我去注意语文文法、篇章结构的分析，这样，不仅使我学得了初步的写作能力，而且又初步地使我学得了思想的能力。除了这两位先生以外，我所要感激的就是圣陶先生了。

他虽然没有直接教授我，但私心之间，却向来是师事圣陶先生的，因为我曾有一次寄稿给圣陶先生，请他评阅。现在我已忘记当时寄去的是什么文章，圣陶先生当然更不会记得这事了，但我至今分明记得，圣陶先生在退还我的文章上面，用端正的笔迹，改出了其中写错的每一个字，并且很仔细地把全篇的标点符号重新点了一遍。——对于一个毫不相识的少年，这样认真地修改文章，在圣陶先生，固然是习惯做的事，但是给与我的教诲却是再深刻也没有了。所以虽然也曾从圣陶先生所著《倪焕之》及其他小说，《文心》及其他讨论阅读写作的书，得到过不少益处，而我首先要提出的还是这一件小事，因为在这一件事上，我从圣陶先生学到的不仅是关于写作的方法，而且是关于写作的根本态度；又不仅是关于写作的态



度,而且是关于做人的根本态度。认真、切实、不苟且、不马虎,这种态度,正是圣陶先生可以做我们模范的地方,就从上述那件事上,给了当时正是少年气盛的我很深刻的教育。

以后在每一次遇见圣陶先生的时候,我总想起这一件已经过去好多年的事,而从圣陶先生的言语行止之中也更加深了这印象。

当我自己也开始来为更年轻的朋友看稿改稿的时候,有时不免发生厌烦之感,但是一想起自己曾从圣陶先生那里得到过什么,我就不能不振奋起来了;纵然不能做得像圣陶先生一样好,但也必须努力跟着做!

听说今天成都文艺界为圣陶先生举觞称寿,我也愿借这机会,带着感激的心情遥向圣陶先生举起我的祝贺的杯子。

最初刊载于1943年11月14日《新华日报》(重庆)。



从学习说起

被当作“圣经”看的《论语》第一句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既然学习是件快乐的事，那么照理是人人都愿意学习的了，但问题却不这样简单。

学习被看做快乐的事，是因为从学习中可以接触到和接受到新的东西，欢迎进步的人自然就愿意学习。

然而也有不欢迎进步的人。有些人“故步自封”并不只因为愚蠢，不知道还有新的更好的东西，而是因为他们害怕进步。他们以为只有按照那种旧的生活方式、旧的知识，自己才能生活，假如换了一套新的生活方式和知识，就反而会活不成。——既然他们害怕进步，他们也就害怕学习。

这种害怕学习的人，假如也有学习，那么学习对于他们的意义便只是回顾旧的时代。把1000年、2000年以前的“圣贤典籍”，读得滚瓜烂熟，这曾经是在科举时代中国读书人的学习的唯一内容。这种学习只是“温故”而决不能“知新”，但真正的学习却必须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

以上所述的意思不仅仅指个人的学习，在一个民族的发展上也是如此。要敢于向新的世界学习，而不是老回头望着自己的尧舜禹汤。孙夫人宋庆龄在中山先生忌辰对美广播中说：“任何国家的革命都得借助于各处的进步思想与进步行动，美国革命在英国人



民中有其朋友，同样地法国革命也受美国的影响。我们推翻满清政府的运动，大大得助于美国的革命传统，而我们推翻军阀的革命，以求民主及完全的民族平等，很受俄国革命的鼓励与支持。”——我深信，这几句话是很能代表中山先生的精神的。这就是敢于向先进的民主国家学习来使自己也得到进步的精神。

孙夫人又说：“像美国的孤立主义以及印度的僵局等问题，我们要求有批评之权，我们也承认别人对我国的现状，也有分析与批评之权”。——这所表示的更是一种光明磊落的勇士的态度。必须首先自己有敢于学习求进步的精神，才不至于怕批评旁人，更不怕旁人批评。

中国的人民大众要向世界表示，他们是完全同意孙夫人的这些话的，他们在争取进步的路上，决不是怕向别国的长处学习的懦夫，更决不是怕被旁人看见本国的短处的怯弱者！

3月15日

最初刊载于1944年3月15日《新华日报》(重庆)，
署名陈桑。



读《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中对于当时的读书人真是形容得淋漓尽致。这些人认为读书的目的无非就是应科举，入仕途，因此除了可以帮助他们达成这个目的的书以外，他们不承认有任何其他应该读的书、应该知道的知识，他们的整个思想也只是封锁在这个小圈子里面。

这种思想可以用马二先生的话做代表。他向旁人说：“古语说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什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原来当时科举考试本只要求人们读四书五经，而实际上，连四书五经都不一定要读，必须读的只是八股文的选本。用科举制度下的正统眼光来看，除了这种文章选本以外，天下就再没有其他的书了。

除了八股文章以外，其他的一切是都被认为“杂学”的——也就是所谓“纷歧错杂”的东西了。周学道向一个自求面试“诗词歌赋”的童生喝道：“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生，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学他做怎么？”马二先生也认为，“后生们想到诗词歌赋那条路上去，便要坏人心术”。这也正是文学是软性书，只足以助长麻痹一类的说法。

但《儒林外史》中也有些自命风雅的诗人，这些诗人中有一位却老实说：“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因此他们之所以做诗，也不过是为了交结官府而已。所以这类诗人的思想其实也还是封锁在同一小圈子内。



实际的知识当然是这样的读书人完全没有的。《儒林外史》中记载着两个举人和一个进士出身的县长的可笑的谈话。张举人：“想起洪武年间，刘老先生……”汤知县：“哪个刘老先生？”张：“讳基的人。他是洪武三年开科的进士，‘天下有道’三句中的第五名。”范举人：“想是第三名？”张举人：“是第五人，那墨卷是弟读过的。”——生在明朝，连明朝开国时的刘伯温的历史都被他们搅得这样一塌糊涂，这自然是因为讨厌和害怕读历史的结果。

《儒林外史》中这些描写的确是明清两代实际情况的反映。所以向来人们都承认在明清士风是败坏到极点的。固然就当时一般社会情况看，确可说是社会风气的败坏，然而我们不可不知道，这种风气的败坏却正是统治者所有意造成的。《儒林外史》作者对于创建八股取法的明太祖是也有所腹诽的，他借王冕的口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但他还没有明白揭出，统治者正是要用这方法牢笼天下读书人的思想。

一方面是开了这条“荣身之路”，使天下读书人除了八股文章外无思想；一方面也不惜用强制手段来加于不甘心上圈套的人身上，更使一切读书人惴惴小心，不敢越雷池一步。《儒林外史》中的庄徵君劝一个好奇收集被禁了的《高青邱文集》的人说：“青邱文字，虽其中并无毁谤朝廷的言语，既然太祖恶其为人，且现在又是禁书，先生就不看他的著作也罢。”

在《儒林外史》作者的锐利的笔锋下，也可以使我们看到，由思想统治所造成的是怎样的恶果！

4月15日

最初刊载于1944年4月23日《新华日报》(重庆)，
署名陈桑。



保卫“五四”

近年来，反对和抹煞“五四”运动的言论渐渐地多起来了，这实在是令人寒心的现象之一。

反对“五四”运动的人说：“五四”运动提倡自由，自由是外国人想出来的花样；“五四”运动提倡民主，民主是外国人的发明；“五四”运动提倡科学，科学也是外国人闹的玩意儿；“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甚至提倡拼音文字，那自然也是学了外国人的榜样；但“五四”运动反对文言文，反对骈四俪六，反对旧礼教、旧道德，反对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反对阴阳八卦、算命扶乩，而这所反对的一切却都是中国的国粹，是有价值的精神文明。所以，总而言之，在他们看来，“五四”运动不是中国民族自己的产物，“五四”运动是洪水猛兽，它本身不应该存在，它的一切影响也都应该扑灭。……

这就是在“五四”运动的 20 多年以后，有些人对于它“再估价”所得到的结论。而这也正是他们对各种问题所得到的最荒谬无稽的结论之一。

“五四”运动诚然是提倡了一些在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的东西，而且确曾向先进的民主国家的文化学习来很多东西，但假如说，“五四”所提倡的东西只是外国的东西，绝不适合于中国的土壤，这就完全不对。这些东西在中国土壤上也并不是绝对没有根据的。比如白话文，在宋元以来的词、曲、平话小说中已经萌芽，不过



只被看做市井俚语不能登大雅之堂，占据统治地位的始终是那力求古雅的古文。民主，固然在思想与实际上，从来没有成为有系统的和完成的东西，但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怀疑（如黄黎洲的思想）和从广大人民中自发地起来的未完成的民主革命运动（如太平天国运动）却显然是存在过的。对旧道德的怀疑，对实事求是的学术思想的追求，这些也都不是从未有过的。只是在过去，这一切都是处于被压迫的、被束缚的地位，在沉重的传统文化思想的压力之下，在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的控制之下，不可能活泼地成长。直到“五四”运动时，才如一声春雷一样把一切被压抑在大地之下的东西都震醒起来，使它们冒出地面，蓬蓬勃勃地生长活动。

而且纵然“五四”运动所提倡的可以说是全新的从未有过的东西，但是一件东西，在过去从未有过，却并不足以证明它在今天和今后也不能和不当有。假如在一个民族中，今天和明天存在的东西，只是在昨天已经存在过的东西，那除了证明这民族的衰颓以外，还能证明其他什么呢？“五四”运动正是要使从来未真正实现的民主在中国土地上实现起来，使从来未充分发扬的科学在中国土地上发扬起来。除非认为中国的民族已经奄奄待毙，只能抱残守缺，不能由接受一些新的合理的东西而使自己的血液更新，人们就没有理由说，“五四”运动是中国民族所不能和不该有的。

事实证明，民主和科学在中国是能够有的，所以“五四”运动，已经在一切反对者的攻击之下建立了巩固的堡垒。民主和科学在中国是应该有的，所以“五四”运动所提出的要求成为这20年来中国民族向前进步发展的斗争中的基本口号。假如到了今天，还来抹煞“五四”运动的意义，反对“五四”运动所开始提出的科学与民主自由的主张，那就只是反对中国民族向前进步发展的道路！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25年了。现实的情势虽和“五四”当年已



不相同,但是既然还有人在反对和抹煞“五四”运动,而且有些在“五四”运动中的健者已经陆续叛变自己的历史,那么,一切真正关心和追求中国民族的进步和发展的人,就必须宣告自己是“五四”运动的真正的继承者。我们要保卫“五四”,因为保卫“五四”就是保卫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使它在新的现实情势中更加发扬光大。

刊载于1944年5月4日《新华日报》(重庆),
署名唐蔚。



历史可以捏造么

历史可以捏造么？——对这问题，德国、日本的法西斯统治者和他们的宣传家是给以肯定的答复的。

本来，历史就是事实，这些事实既已过去，便成铁案。人们常说：“事实胜于雄辩”，想凭空改造历史的事实，那岂不是最愚蠢的事么？——但法西斯的宣传家不这样想法，他们总以为一手可以掩尽天下耳目，他们总以为历史的事实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而加以改造和重新解释的。他们不管历史的事实到底如何，只想利用历史来证明法西斯统治下的秩序是最合理的，证明法西斯的道路就是历史所规定的最好的道路。

改造历史虽然是愚笨的事，然而德国、日本的法西斯宣传家有计划地从事这种改造工作，并不是一点效力也没有收到。他们曾由此而达到麻木本国青年，使盲目信从法西斯，成为忠顺的奴才的目的。

在这方面，法西斯收效越多，其对文化所犯的罪恶也就显得越大了。但是这种捏造历史事实的欺骗方法，到底只能收效于一时，到了现在，当前的历史事实的教训已使得人们更多地看出法西斯捏造历史的无耻与罪恶了。那种为了证明人种优劣论，为了辩护个人独裁制而捏造出来的历史，很显然地，将随着法西斯势力的消灭而同归于尽，除了在人们回忆法西斯的罪恶时还会想到以外，任何



一本严正的历史书上是不会采用他们的一字一句的。

但究竟因为直到现在，法西斯还没有完全崩溃，而法西斯的捏造历史的欺骗工作至少在他们的国内也还没有完全失效，因此我们就看到，还有人以为，改造历史未始不是值得仿行的事。如一篇论青年运动的文章中说到“新希望与新动向”时就如此说：

精神训练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各国因时代的险恶与民族的生存威胁，特别从历史的光荣（如意大利），与民族的优越（如德国）方面，激动青年的爱国热，增加青年的民族自信心。甚至不惜歪曲历史的事实，如德国政府于1933年7月下令规定“今后的历史教学必须从原始时代的德国森林开始，用以代替尼罗河与幼发拉底河，而对于古代条顿民族之特殊道德应当发扬光大，以引起国家之自尊。（见《新认识》第8卷第23期，旁点引者加）

这位先生显然看得出来，在民主国家进行爱国战争时所需要的爱国主义，和法西斯侵略者所制造出来的爱国主义是有着原则上的不同的，因此德意法西斯对历史的“不惜歪曲”也就在激动爱国热，增加民族自信心的名义下被赞扬起来，被认为是“训练”青年的一种好方法了。

据另外有人说，改造历史并不只是现代法西斯所行的事，而是古已有之的了。他说：

本来在中国古代历史的观感就是教育的，完全拿历史作生活轨范和理想，不折不扣的照着实行或警戒，教育家把它操纵在手中，索性就利用它作为教育工具，因此极力美化历史，把自己的理想世界寄托在历史，于是历史成了教育家乃至政治家思想家发表主张的工具。所以康有为称孔子为托古改制（其实托古改制何止孔子？），所谓托古改制实际就是托历史以



实施教育。不过作风逐渐过火，演进的结果，简直改变事实，增减事实以迁就教育，弄得历史不复成其为历史了。……这种原则我们赞同，但这种作风我们却觉得有些过火，因为彰明较著的事实硬要睁着眼睛说假话，先失掉了信仰，而教育作用反而减少了。同时纵然要使历史发挥教育作用，但仍要对历史学术留有余地，不能一笔抹煞。（见《文化先锋》第3卷第14期，旁点引者加）

这位先生说的是“教育”而不是“训练”，而且说了“历史不复成其为历史了”的批评的话，其态度似乎比前一位公然同情“不惜歪曲历史”的先生谦逊得多，但是这位先生也仍明白表示他是在“原则”上“赞同”这种办法的。他只是采取较谨慎的态度，要求在改造历史时，不要做得太“过火”，以至反而失掉“效力”罢了。

历史的研究应该是一种科学。科学必须实事求是，是不容许人们说谎行骗的。假如认为为了“训练”与“教育”的目的，可以“不惜歪曲历史事实”，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事实，增减事实，那都是自行宣布了离开科学的立场。离开科学就只能走向反科学去，在这里是没有中庸之道的。这位聪明的先生却说：“在态度上我们必须折衷至当。不能太不忠实，但也不能太呆板。”这种处世之道上的滑头哲学用在学术研究上是得不到好结果的啊。他的真意正是说对历史可以不必太忠实，岂不是已经完全透露在纸面上了么？这位先生也举出了一个法西斯国家——日本“改造历史，欺骗民众，利用历史提高其民族自信力，自尊心，以至自傲性”的事实，作为对历史“太不忠实”的例子，但又加以评价说，“他们近一百年的进步，受此影响甚大”，根据这看法，他就回头来检讨“我们的史学界”了。他说：

晚近由于方法上的进步，倒不知不觉做了些自己拆穿西



洋镜的工作,把一向人民心中奉为至宝的假境界推翻,这在历史学术上固是莫大的功劳,极可称赞的进步,但在历史教育功用上却得到了很不利的效果。……这种作风,谨严科学是作到了,但若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来一想,则似乎太老实了。

我想,每一个稍有科学训练的头脑,都能从中看出这段话里是包含着一种最荒谬的内容。既然本来只是“西洋镜”、“假境界”,那么加以拆穿,岂不是完全有利的事情么?既然承认是科学上的进步,却又以为在历史教育上造成了坏效果,那么,这所要求的到底是什么效果呢?假如科学的进步反而对于国家不利,这所说的又是什么国家呢?

最初刊载于1944年5月8日《新华日报》(重庆),署名陈桑。



谈 陋 规

一件事做久了，成了习惯，就难以改革。——自然，并不是绝对不能改革，只是在改革时必须要有更强的决心，花更大的力量，也许还不得不以很大的痛苦做代价。所以苟且偷安，惮于改革的人就用“积重难返”的理由来搪塞了。

试去问抽鸦片的瘾君子，100个中大概总有90个人坦白地承认这是个坏习惯，但他们摇头说：既已成了习惯，还有什么办法呢？

明清官场中有所谓“陋规”，也是这种意思。“陋”是说这事情是坏的、不合理的，所谓“规”，就是说这事情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成规了。

“陋规”这一观念正是官僚政治腐败到极点时的产物。他们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不能不承认是坏的、不合理的，但他们却又在“陋规”的名目下，让这些坏的、不合理的的事情继续存在下去。

像这样的“陋规”在明清官场中是很多的。有些是由前代的官僚政治中继续保留下来的，有些是在新的情况下新增加的。譬如去谒见大官的人，必须给看门的人送“门包”，否则就见不到或迟见到。当时人们是否认为这是合理的事呢？并不，但他们说，这是“陋规”。而一切衙役门斗便托庇于这种“陋规”之下而生存了。但这还是“陋规”中的小的。官员自己也是要靠陋规而生存的。譬如当时地方官员在向人民征收钱粮时要收一种名为“火耗”的附加税。钱



粮正税归国家，耗余完全归私囊，占到正税的二三成乃至四成之巨。这可以说是一种完全不合法的税收。朝廷明明知道，并不加以干涉，官员也公然征收，竞相分肥，人民迫于权势，更不敢说一个不字。上上下下都说这是“陋规”。事实上，没有这种“陋规”，官员们也就活不成了。

当他们必须依靠着“陋规”而生存的时候，这种官僚系统的崩溃瓦解的末运是可想而知的了。他们不能改革“陋规”，结果就只能葬送在这个陋规之中，正同一个人不能戒绝鸦片，就必然在鸦片上送命一样。

6月24日

最初刊载于1944年6月24日《新华日报》(重庆)，署名求之。



“理想中的中国新文艺”

读报见某杂志以“理想中的中国新文艺”为题征文。这个题目很好，我也打算去应征试试看。向来考生投考，总得揣摩考官的意思，应征与投考虽微有不同，但也不能不“如法炮制”一下。

“理想”中的中国文艺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没有瞎子，也没有瘸子，没有瘦得只剩骨头的人，也没有病得形容枯槁的人。所有的人物都是面白唇红、肥头胖脑的——因为所有的文艺作家都严格地遵从着“不暴露缺点”的训令。

“理想”中的中国文艺作品中的一切描写，看了都叫人舒服，譬如就是描写刑场上的情形吧，他们也是这样写的：

“喂，亲爱的先生，让我的刀为您的尊头服务一次吧。”刽子手很恳切地说。

“不敢当得很”，被处死刑的人非常感激地说，“像我这样卑微的脑壳竟要劳动您的贵手，实在使我惭愧之至了。”

“哪里哪里，不必客气，这对我其实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好的好的，就劳驾高抬贵手吧。——但当心不要闪痛了您的手，那就使我更加不安了。”

“理想”中的中国文艺作家都要经过考试。考试合格的作家中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从大饭店的“仆欧”改行的，因为他们善于用最简单的“是是否否”来表示自己的意见。譬如，考官问：“你觉得



生活过得很好么？”他们就回答：“是的是的，很好很好。”又问：“你不觉得有什么不舒服吧？”他们的回答是，“真的，我一点也不觉得呢。”——他们因为自己能说这样的话而感到自由已经太多，并且感到自己的确是“文艺”界的“先锋”了。

到了这样的“理想”时期，诗人节已经不在端午了——因为屈原的牢骚太多，已经由国家的明令否认他是中国的诗人——有一个考古家考证出了孔子删诗的日子，这一天就成为国定的诗人节。每逢诗人节时，照例举行盛大的纪念会，行礼如仪后，诗人们轮流朗诵诗经中的一章，从早晨6时到深夜12时才能朗诵完毕散会。

但虽然实现了这种“理想”，人们似乎还不完全满意。所以有一个杂志用重金悬赏征文，征文题目就是：“我理想中的中国新文艺”。征文揭晓时，得到头奖的一篇文章大意说：“我理想中的中国文艺作品都是由机器制造的。只要你投下去若干钱币，把机器上的指针拨到你所需要的题目上，就会有一篇绝对合法的诗或文出现了。其篇幅的长短与你投入的钱币的多少成正比例。”

7月8日

最初刊载于1944年7月8日《新华日报》(重庆)，
署名陈桑。



记 梦

昨日午后，天气闷热，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不知怎样，我走在一条大路上。要说这不是一条路吧，它的确是一条路，是界在田野之间的一条大路，上面有车马走过的痕迹。但要说它是一条路吧，却实在又几乎不能算是一条路，路面上凹凸不平，到处有聚着污水的坑，也有石头或泥土积成的小丘，田里的沟水常常横过路面，使人必须涉水而过。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个人在这条不能算是路的路上辛苦地步行着，我的满身溅着泥浆，脚底疼得很，但我还是一步步前进着。

但忽然，一条很宽的河拦住了我。河上固然也有桥，但是这哪里还能算是一座供人行走的桥呢？桥的柱子已经摇摇欲倒了，桥上的木板也是有一块没一块的，还保存着的木板也好像都已腐烂了。

然而我必须过河去。我提心吊胆地在桥上走了过去，每一步踏下去都使整个桥震动了起来，好像它随时都有因载不了我的重量而塌下去的危险。

我终于走过桥了。定一定神，一抬头就看见一座大木牌，牌上当头用金字大书着：

“保护公路桥梁办法”

这使我吃了一惊，我还以为这路和桥都是废弃没有人管的了，不料还有人在保护。我仔细地把这上面的办法一项项看下去，一共



列着 36 项,诸如“穿钉鞋的人不得在公路上行走”,“严禁抽去桥上的木料当柴烧”等等,不能不算是周到。除了这座木牌外,旁边还有一座木牌,那上面写的是“3 个月内完成修桥补路计划”45 条。但从下面注明的日期看来,这计划已经公布了两个月零 28 天了。

我回头一看,那座桥和桥那边的路确实是如我刚才一路走来情形一样,再往前看,前面的路也还是和桥那边的路一样,甚至还要更坏一点。站在这两座木牌前面,我糊涂起来了。我想找一个人来问一下,到底是怎样一回事。一个身材高大的警官站在我的面前,他似乎已经站在这里很久了,正在上下打量着我。

“对不起,请问您,这路和桥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很恭敬地问。

他显然不愿意和我讲话,只是把他的手向那两座木牌挥了一挥:“你看那上面写的。”

我告诉他,我已经看过了,我所奇怪的事就是为什么有了这些办法和计划,路和桥还是这样的糟。

“但是我们已经有了办法,有了计划。”那警官庄严地说。

“可是这计划快满期了,我一路走来就没有看见一个人在修补路。”我说。

“但我们不是已经合时地公布了这些条文了么?”他很理直气壮的样子。我觉得他很愚蠢,便反问他:“你们公布这些条文是不是打算执行的呢?”

“你敢反对我们的办法和计划!”那警官咆哮起来了。

我吃了一惊,赶忙辩解说:“不是的,我是说办法计划纵然都要得,但只是写着恐怕也没有什么用吧。”

我没有料到,我的话刚说完,那警官猛然扑到了我的身上,两手紧捏住我的喉咙,大声喊道:“你,你是个奸细!”

我已没法申辩,因为我已经发不出声来,而且已经神志昏迷



了。但我还模糊听得见那警官的声音：“来人啊，捉到一个破坏公路的奸细，把他淹死到河里去吧！”

于是我觉得有好几个人把我抬了起来，从半空中把我扔了下去。……

于是我醒了，汗水已经浸透了我的身体。

7月22日

最初刊载于1944年7月22日《新华日报》(重庆)，署名友谷。



纳粹是胜利者么

希特勒的军队在每一个战场上节节失利，现在还有人敢把胜利的注押在纳粹的一边么？

但纳粹失败的征兆，并不是直到在军事上不断败北的时候才开始显露出来的。

纳粹在德国一上台后，就在国内实行最野蛮的独裁政治，它把集中营代替学校，把戈培尔的吹牛皮代替舆论，它教老百姓拿大炮代替牛油，使他们的一切日常生活都落在严格的统治网下，而在精神上灌注以兽性的毒素。——这样，纳粹就使自己和人民对立了起来。它既和本国的人民对立，它的失败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

纳粹更把它的毒素向全世界散播。它有计划地在一切国家中制造“第五纵队”，从一切国家的内部生活中挑拨起反动的阴谋和叛乱，它把战争的阴谋带到全世界人民的和平生活中——这样，纳粹就使自己和全世界人民对立起来。它既然和全世界人民对立，它的失败的命运就更加是无可幸免的了。从来没有一个力量，和人民对立着，为人民所反对，而能得到最后胜利的。——这是早已有历史证明的真理，纳粹的失败是又加上一个极有力的证明。

但只在3个月前，我们还能够读到这样的文字：“自希特勒执政以来，德人日夜处心焦虑，加强其政治组织，充实其民主经济，扩大其主义的宣传，积六七年之努力准备，而发动第二次欧洲大战，



挟其所谓闪电战之武力，凌后无前，欧陆各国几无不被蹂躏于其铁蹄之下，匍匐屈服，无有异辞。然而其闪电战之武力仍是生产于其平日学术研究之奥博精深，主义宣传之普遍无碍，政治组织之完密坚强，粮食储蓄之充分有力，此即证明德人目前胜利，不是止决于其在疆场上形式的闪电战之优点，而实由于其在平日的学术研究上，主义宣传上，政治组织上，经济发展上，种种条件超越其敌人的原故。”（见《三民主义》半月刊第4卷第9期，今年正月一日出版。旁点是引用者加的）

这一段文字对于纳粹的歌功颂德可算是至矣尽矣了，但是在这样的刊物上，在这样的时候，居然断言希特勒德国是胜利者，并且认为这胜利是由于他实行了“民生经济”，在主义与政治上“超越于其敌人”，岂不是太糊涂，太荒谬了么？

8月5日

最初刊载于1944年8月5日《新华日报》（重庆），署名李勃。



不要上纳粹宣传者的当

有人歌颂纳粹说，它在主义、政治经济上都有超越旁人的特点，所以它是“胜利者”。这种论调自然是荒谬已极，在8月5日的文章上已经指斥过了。最近又在—个杂志上读到—篇论文，题目是《纳粹德国的新国家经济理论及其设施述要》。在这文章中，—开头就是这样的声明：

“无论此种理论最后之功过如何，及纳粹德国武力之终必式微，但在其战前于经济财政方面的惊人成就，那是为任何人不能否认的。还不但于事实上的表现是如此，即于经济理论上其建树与影响，在将来世界上亦必占—相当之地位。现在我国出版界对此虽亦常有所讨论或译载，但属于批评方面多，其为真面目之介绍者尚不多观。为学术之探讨及政策上之借鉴，此等客观之介绍，似为必要。本篇于此，希有所抛引也。”（《新政治》第7卷第3期，第25页）

所谓纳粹经济的理论与设施，在实质上就是以少数金融寡头通过国家机构来控制全部国民经济，以实行侵略战争为唯一最高目的，缩紧了人民的肚子去喂养大炮。假如说，纳粹德国在经济上有“惊人成就”，其成就岂不就表现在它这几年来所进行的侵略战争上么？但这本由“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部”所发行的杂志居然对于它的“功过如何”，不敢作肯定之辞，怎能不令人惊异！

但这篇文章还不只是对纳粹经济的功过如何不下断语，且更



是很明显地站在歌颂它的立场上的。你看，他不是对于凡带有“批评性”的讨论或译载都表示不满么？他正是用“学术之探讨”、“客观之介绍”做幌子来散播有毒的纳粹思想，而且公然宣称要拿来“政策上之借鉴”。

纳粹失败的形势已经无可挽救，再来宣传纳粹是胜利者未免可笑，所以才产生了这种新的论调，说纳粹武力纵然失败，但是它的理论与政策还是值得景仰，值得模仿的。为了根绝法西斯，我们必须扫清这一切纳粹宣传者的花言巧语！

8月20日

最初刊载于1944年8月20日《新华日报》(重庆)，
署名陈桑。



天是怎样亮的

在解放法国的战争中，证明了人民的力量伟大。

拿法国的近代史来看，人民的力量是一道汹涌奔腾的激流。虽然在有些时期，黑暗的势力掩盖着、约束着人民的力量，但是总无法使之消灭。一到紧急的关头，就是历史的火车头转弯的时候，人民的力量就从巴黎的街头，从法国到处的城市乡村突然起来，散发出无比的光明，把民族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了。波旁王朝的黑暗统治阻止不了进攻巴士底大狱的进军，在拿破仑第三的专制统治的废墟上终于飘扬起了巴黎公社的人民的旗帜。现在纳粹及其傀儡——贝当、赖伐尔之流的统治也终于遭受到法国人民的铁拳的制裁了。一切专制统治者总是幻想他们能够把人民的力量埋葬消灭到地底下去，但人民的力量却像神话中的巨人一样，每一次从地底下重新挺立起来的时候，总是带来了更雄伟的生命力量。

不仅在法国的历史上，人民的力量有着这样重要的意义，在任何民族的历史，倘除去了人民的力量，也就看不见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角。尤其在目前的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间，倘抹煞了人民，就想象不出战争的胜利从何而来。

法国人民在几年来的苦难生活中始终没有丧失对于自己力量的信心，坚持着锻炼和团结自己的力量，终于一举之下，推翻了征服者与国贼，这正是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好榜样。巴黎的光复，



法国的解放已成为一个最好的范例,说明着一切沦陷在法西斯毒手中的土地,只有在人民力量起来时才能自由,而也只有人民的力量前面,法西斯力量才会彻底崩溃。

经历了4年多的漫漫长夜,法国的土地终于开始天亮了。倘要问,天是怎样亮的,那是由于人民争取和斗争的结果。

8月27日

最初刊载于1944年8月27日《新华日报》(重庆),
署名李勃。



阿 Q 的幻境

有人讲政治哲学说：古代的中国并不是民族国，不是有限范围的国家，而是“天下国”，是以天下为对象，“四海”为范围，内部既无种族差别，也无阶级对立的“浑然一体”的国家。

有人讲人生哲学说：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天地境界”。入于天地境界之后，自我和宇宙就能合为一体，以浩然之气应物，无往而不自得，一切世间的烦恼、争执、纠纷都可以置之度外了。

这是说，“天地境界”是人生最高境界，“天下国”是国家的最高形式。

然而这些都不过是空想的产物而已。——陶醉在自己所杜撰的幻境中是可怜的，追逐自己所虚拟的幻境是愚蠢的。

人生中何尝有什么“天地境界”呢？实际的生活是受着自然和社会条件的种种束缚与压迫，却在主观想象中把自己看做是天的主宰者，那岂不正是阿 Q 思想的表现么？历史上又何尝有什么“天下国”呢？实际上是不断地“内忧外患”，一会儿“胡骑南下”，一会儿“赤地千里”，却在主观想象中自以为天下一统，四海荡平，那也只是历代专制统治者的欺人自欺之谈而已。看不见中国以外的世界，自以为天下尽在于此，但实际上，在经济文化生活上还是常常不能不受到外来的影响。这种“天下国”的迷梦，难道不是极其可笑的么？



追逐幻想的境界，以精神的胜利自满——这种阿 Q 的心理传统是早就应该打破的了。彻彻底底地放弃这一切欺人自欺的方法，认认真真的去看看世界和中国，那才是走向进步的道路。

9 月 9 日

最初刊载于 1944 年 9 月 9 日《新华日报》(重庆)，署名陈桑。



在全世界到处都是胜利的时候

——“九一八”十三周年纪念有感

邱吉尔首相到魁北克开会时向人说：“到处都是胜利。”这话就全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战争而言，确是事实。这种事实自然也能使我们无限振奋。但是无论怎样，在我们听到这话时，总不能不在心头涌起另一种滋味。

欧洲各沦陷国家，太平洋上各沦陷岛屿的自由解放的消息一天天不断地传来，自由的旗帜从一个城市插到另一个城市，解放的呼声从一片土地传到另一片土地。是的，到处都是胜利，民主的胜利，人民的胜利。这些从远处射来的自由的光辉使我们眼前发亮，从远处传来的解放的呼声使我们满心鼓舞，而这些也更使我们不能不加倍迫切而忧虑地瞩目我们自己的国土。不仅是沉沉的夜影依旧笼罩着广大的河山原野，而且在有些地区，这黑影还在严重地侵蚀着别的地区，扩大着它的范围，我们怎能不感到苦痛呢？

难道只是遇到“九一八”纪念日，我们才梦魂萦回于白山黑水之间么？不！我们哪一天不想到沦陷了的土地！我们哪一天不想到黑暗期长久、苦难最深的东北！我们深深地怀念在那里辗转呻吟，过着奴隶的生活的父老兄弟，更深深地怀念在那里顽强苦斗，坚持着游击战争的武装人民。他们面对敌人的刀锋，执行着守土抗战的任务，他们在最沉重的夜影中用着自己的血肉散发着胜利的



光芒。到了现在这全世界到处都是胜利的时候，我们更不能不急迫地要求，给这些敌后抗战的人民力量以更有效的支助，向敌人索还拖欠得太久了的血债！

既然像在法国，当地下的人民起义和军事活动，一旦得到了盟军正面进攻的支持时，就能在短短的3个月中光复了三分之二的土地，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对于我们自己的前途作乐观的想象？在我们的敌人所占领的心脏里，是已经存在着那样强大的抗战力量了，只要在正面战场上，也由于广大的人民被发动起来，不再继续退却而是全面反攻，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能想象，胜利的旗帜是会迅速地一直插到鸭绿江边去的？

是的，我们能够这样想象，而且我们必须认真这样做！时间不再等待人。不能容许再迟延了。世界胜利的局面不容许这种迟延，广大人民中的愤火不容许这种迟延！在这时候，因循苟且是罪恶，容忍偷安将铸成大错。“可怕的冷静”必须连根铲除，反攻和准备反攻的绊脚石是必须根本肃清的了！

9月18日

最初刊载于1944年9月18日《新华日报》(重庆)，
署名陈桑。



变

天下有什么事情不能变？

整个自然界到处都在变。沧海变桑田，平野变湖泽，冬变成春，夜变成日。蛹必须变成虫，否则就是死亡。生物的旧种在新的环境下必须变成新种，否则就是绝灭。

人类历史也是一部变的历史。春秋变成战国，战国变成秦汉。车战不能不变成骑战，弓箭又终不能不变成枪炮。秦始皇想建立万世不易的政治规模，但变的潮流迅速到来，把他的企图打得粉碎。清朝皇帝想用粉饰遮掩的方法维持不变，但他总是逃不了临到头上的大变。——专制帝国总不能不变成中华民国。

变有什么不好？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在专制主义者的统治下，变曾经被看做是造反，是离经叛古，是大逆不道。但不论人们主观企图如何，变总是在不断地进行着的。因此古人也有看到了这个真理的，他们说：“穷则变，变则通”。

老的一套办法已经走到尽头了，那就叫做“穷”，也就是“此路不通”。既已走穷，就一定要变，非变不可。从老的一套变成新的一套，也就是绝路走到生路，也就能够走通。这有什么不好？不好的倒是在该变的时候不变，在能变的时候不变。

变有大变小变。



小变是局部的变,表面上的变;大变是全部的变,是根本的变。小变只能解决小的困难,大变才能解决大的困难。但在有了大的困难,要求大变的时候,假如只实行小变,那就连小的困难也解决不了。

在应该大变的时候就必须大大地变一下,也一定能大大地变一下。在这样的时候,局部的变只有搪塞的意义,表面的变只有敷衍的作用,但搪塞和敷衍也仍是“此路不通”!

变的敌人是等。

老的一套既然是再也不能走通,变的潮流既然是再也不能违抗,就有人拿出“等”字诀来了。他们嘴里说的是:“稍安勿躁,变总是要变的,不过要等一等。”他们心里想的是:“不要紧,且等这阵风过去,一切又可以长此照旧了”。

垂死的生命靠着这等字诀苟延残喘,想前进的人也会被这等字诀害得绊手绊脚。——我们说:困难来得大,变就不能不大;困难来得急,变也不能不急!等是等不到什么的,除了等到死亡!

9月26日

最初刊载于1944年9月26日《新华日报》(重庆),
署名陈桑。



再没有可退的地方了

从湘桂各地辗转流亡到了重庆的人，为数据说已在 10 万以上。

于是重庆市上的房子恐慌更加严重了。

但是这些“不速之客”的来到，只能使我们发生重庆人口太拥挤了的一个感想么？

能够到重庆的“逃难”者还是有办法的人，而这一路上更不知有几十万人在各地彷徨着，他们眼巴巴望着黑市车票，用惊人高价吃着不知道什么滋味的饭，尘土和忧伤使他们满脸黝黑而憔悴……

纵然他们来到了重庆，迎接他们的也只是“此地无空房出租”的条子！

这里不留人，到底何处可以留人呢？——可以退的地方岂不是少得很了么？

现在还有人敢说“用空间换取时间”这样的话么？

这些湘桂逃难者，也许已经有过好几次从京沪、平津、武汉……逃难的经验了，而现在据说是胜利在即的“时间”，住在原以为已是后方腹地的“空间”，却又被一阵炮火驱上了向后走的道路。

当他们找不到房子而露宿在街头的时候，倘也想起了“以空间



换取时间”的话，能不苦笑！

有人说：“重庆的高楼大厦空着的还多得很，没有了生存空间的不过是你们老百姓而已。”

是的，是有些人还在利用他们最后的一点空间在享乐着，但是对于老百姓，连喘息一下的空间也都几乎没有了。

七年来，在敌人的炮火下，人们从一个城市逃亡到另一个城市，在抗战的名义下，人民奉献出了自己的劳力、财产，而且被迫着牺牲了作为民主国家的公民所应有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到现在已经弄到再没有可退的地方了，再没有可以牺牲的东西了！

古兵法上有“背水为阵”、“哀兵必胜”的说法。

现在中国的人民是已经到了这样的情况了。

抗战不能不胜利，民主不能不实现。中国人民今天站在争取胜利，争取民主的战线上，真正可以叫做“哀兵”，因为他们已经退无可退了！

9月27日

最初刊载于1944年9月27日《新华日报》(重庆)，
署名陈桑。



韬奋先生的道路

韬奋先生的名字和他所主编的刊物是分不开的。

我也曾经是他的《生活周刊》的读者，但是最初期的《生活周刊》，我是后来偶然在S城的一个小图书馆里，从旧纸堆里看到的。记得那里有很多关于“健美”的文字和图片，其他所谈也多半是个人职业生活修养的问题。拿来和后期的《生活周刊》以至《大众生活》等刊物比较，真令人有隔世之感了。

韬奋先生也曾说到过这一层，他说，《生活周刊》之成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是经过了一个“转变”过程的：“《生活周刊》既一天天和社会现实发生密切的联系，社会的改造到了现阶段又决不能从个人主义做出发点，如和整个社会的改造脱离关系而斤斤计较个人的问题，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于是《生活周刊》应着时代的要求，渐渐注意于社会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渐渐由个人出发点而转到集体的出发了。”

使得韬奋先生能够不断进步的根本原因，我想，是在于他向群众学习的态度。当他编刊物时，他总是努力从群众中去发现问题，注意群众中的意见和反应。他曾说：“我个人是在且做且学，且学且做，做到哪里，学到哪里。除了在前进的书报上求锁钥外，无时不皇皇然请益于师友，商讨于同志”。——因此在他周围的群众向前进的时候，他也就跟着一道前进了。而且因为他一天天更深入地看出



群众中的问题，因此他就能站在群众前面成为人民大众的益友和良师。

贯串在韬奋先生的一生中的这种不断学习、追求进步的精神，是最足以使人仰慕的。他经过认真的思考，根据实际而判别是非。当他发现了他所应该站的立场和值得为之献身的理想时，他就百折不回，坚持无他了。他的全部精力和他的事业合而为一，他的全副心肠灌注在他的理想中间，因此在不断进步的路程中，就使他成为黑暗反动势力的最顽强的敌人，成为争取民主的战线上的最勇敢坚定的战士了！

在他逝世前，虽然他被迫不得已而辗转流离，但也因此，得到了一个机会，更亲切地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他说：“当我在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亲眼看到民主政治鼓舞人民向上的精神，发扬抗战力量，坚持最残酷的敌后斗争，并团结各阶层以解决一切困难的情形，我的精神极度兴奋，我觉得年青了，我对于伟大祖国更看出了前途光明。”

现在韬奋先生虽然死了，但他所留下来的道路仍将为千百万人民所遵循着更勇猛地前进。

10月1日

最初刊载于1944年10月1日《新华日报》(重庆)。



谈 规 矩

向来统治者对那敢于表示怀疑或反抗的人都称为“暴徒”、“乱臣”、“贼子”。所谓“暴”、“乱”、“贼”，都是不守规矩的意思。封建社会是最讲规矩的社会，“君要臣死，不得不死”，这是规矩；“君子勤礼，小人尽力”，这是规矩；“天无二日，民无二主”，这也是规矩。谁敢不遵守这规矩，便被看做是大逆不道！

但这些其实只是封建统治者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创造出来的规矩。虽然他们在礼和法的名义下，把这些规矩说成是永久而普遍适用的东西，但就在这封建社会中已有不遵守这些规矩的人了。这只要读一读《水浒传》就可以知道。梁山泊上的好汉确是不守规矩的人，但他们所不守的是大宋天子的规矩，他们仍有他们自己的规矩，他们把“劫富济贫”、“除暴安良”，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当作他们的规矩。

有人说，既然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人们就不能不守规矩，假如大家可以胡作乱为，这社会还成什么社会？——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有理，但假如用这种说法来为封建统治者的礼和法辩护，那就错了。因为封建统治者所订的规矩，并不是社会生活的唯一的规矩，在这种规矩以外，还有人民大众的规矩。

旧的封建统治者总以为民主社会是一种混乱无秩序的社会，这正是因为把他们把封建社会中的礼和法当作是人类社会中的唯一



的永久的规矩。但其实民主社会中有民主的礼，也有民主的法。统治者不能懂得民主社会的规矩，人民大众也用不着遵守统治者的规矩！

我们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就是要找出社会发展的法则和规律来。这种客观的法则和规律可以指导我们的行为，也就成为我们所应遵守的规矩。但是统治者的规矩，因为是以维持少数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往往和客观的社会发展法则相违背。只有从人民大众的利益出发的规矩，才能和客观社会发展的法则相一致，也就是说，只有人民大众的规矩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向上。

我们讲科学，讲民主，就是要以社会发展的客观法则为规矩，要根据人民大众的利益来订出规矩，我们要以这种科学和民主的规矩来推翻封建社会中的一切在礼和法的名义下的老规矩！

10月2日

最初刊载于1944年10月2日《新华日报》(重庆)，
署名陈桑。



史事札记

后来居上

自来盛传邓通、石崇之流的豪富的故事。但他们的财富的确数多少，没有记载。

在封建政治下，做官发财，本是互相连带。这些官僚的财富，究竟有多大，却是外人所不得而知的。但明清二代有些大官僚，因为被皇帝抄家，留下了他们的家产的清单，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惊人的数字。

如明之严嵩，为相 20 年，其家产有黄金 3 万余两，白金 200 余万两。但还远不及擅权了不过 10 多年的太监刘瑾，他有黄金 250 余万两，银 5000 余万两。到了清代，乾隆帝的宠臣和珅有家产值 8 万万两，而且是 75 所当铺、42 所银号、46 所各色铺子的主人，那就更是后来居上了。

岳飞之罪

宋代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制，其对于军队，强内兵而弱外兵，使兵无常将，军不驻常地，以收军权集中在中央之效。但到了南宋时，形势大变了。国家的常备军在金兵的侵略下全部溃败，在江淮



之间产生了岳飞、韩世忠诸大将的军队，成为当时唯一的抗金力量。

秦桧之所以杀岳飞，人们都知道是因为秦桧主和，却不知当时他还有一个重大理由，是为了使军权统一。所以不仅设计杀了岳飞，而且悉罢诸将兵权。既然取消了这些唯一能战的军队，也就非向金人屈膝求和不可了。

但是千载之后，也还有人以为岳飞是军阀，而秦桧是维持大宋的国法，杀得对的！

英雄退路

美国的华莱士副总统来华时，谈到屈原说，希望在政治上失败的人不要学屈原一样自杀云云。

失败了就自杀，固然不值得仿行，但失败了以后就消极退婴，也是值得警惕的倾向。譬如清代的邱逢甲，在马关条约后，在台湾兴义兵抗日，建台湾共和国，坚持了两年之久，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兵败以后，逃亡大陆，其离台湾诗中虽然还有“卷土重来未可知”之句，然而其基本精神已经完全趋于退婴的了。

“从此中原恐陆沉，东周积弱又于今；入山冷眼观时局，荆棘铜驼感慨深。”

“英雄退步即神仙，火气消除道德编；我不神仙聊剑侠，仇头斩尽再升天。”

“乱世团圆骨肉难，弟兄离别正心酸；奉亲且作渔樵隐，到处名山可挂单。”

在这些诗句中流露着的故国沉沦，大势已去，无可奈何，超然自解的意味是非常显著的。这种情绪对于战斗的英雄，乃是可怕的



鸦片！

题诗惹祸

宋江在浔阳楼上题诗惹祸的故事，虽然是小说家的杜撰，但杜撰的故事也仍反映着真实的历史。在那没有报纸刊物的时代，人们常只能把愤懑不平借墙壁来宣泄，而官家也就明访暗察，特别注意及此了。

如在宋代韩侂胄排挤了较有威望的赵汝愚而擅权当权时，太学生敖陶孙题诗酒楼壁上说：

左手旋乾右转坤，如何群小恣流言。狼胡无地居姬旦，鱼腹终天吊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幸有史长存。九泉若遇韩忠献，休道如今有末孙。

这其实不过是读书人说说大话，发发牢骚，远不如“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那样的气魄。但是他把诗题完，回到桌上喝酒，再一回顾，题诗的木壁已经被人取走了。他知道事情不妙，赶快和酒保商议，换穿了衣服，溜出店门，这时韩侂胄手下的逻卒已经拥到门前了。

由此也可见，虽然是800年以前，但那时秘密警察网的布置已不可谓不严密了。今天遇事动辄谓“古已有之”，于此又得一个证明。

民谣的威力

据说秦始皇时，民间有“亡秦者胡”的流言，后来果然在胡亥手里，秦朝灭亡了。到了两汉时，受了谶纬术数之说的影响，民谣童歌



更被看作是很神秘的预言。如董卓将亡前，长安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下，不得生。”正是暗含着董卓死的意思。

民谣有没有预言的意义？我看也是有的。不过这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事。因为无论是秦始皇那样的暴君也好，还是董卓那样的权臣也好，他们的统治既已遭受人民的普遍愤恨，而且这种愤恨已结晶为到处流传的歌谣，其死亡绝灭的日子的确是不远的了。

读书人用壁上题诗来宣泄愤懑，不会写诗的人民就用口头的歌谣来表示抗议。题诗的人可以逮捕，但唱歌谣的人民却是杀不尽的。

贰臣之心

宋末，文天祥辗转奋斗，终归失败，被元兵囚送到北京。当时有人主张请元当局释放文天祥，让他做道士去，本是宋臣而降为元官的留梦炎坚持反对，他说：

天祥去，复号召江南，将置吾人于何地！

这轻轻的一句话把变节的贰臣的卑鄙恶毒的心理自行暴露出来了。——他们本是为个人的利益打算而降敌方，反过来，除善唯恐不尽，其面目倍加狠毒，手段也倍加残酷了。

此所以在明亡之时，许多降清的名将都踊跃做了灭明的先锋，而吴三桂一直追赶到缅甸，非把明室余裔灭尽不可。

童戏之罪

秦始皇没收民间兵器，以为永保安全，不料结果还是被揭竿而起的人民推翻了。这种教训自然很使后世帝王寒心，但他们却未能



从此学得更聪明一点，反而更愚蠢一点。

五代时的唐明宗李嗣源曾下过一道诏书说：“据巡检军使浑令儿口奏，有百姓二人以竹杆习战斗之事，朕初闻奏报，率尔传宣，令付石敬瑭处置。今日安重海复奏，方知悉是幼童为戏……致人枉法而死。”

由此可见，连人民用竹杆习战也算犯法，防范周密，已达极点。事实上只是两个小孩子用竹杆作游戏，居然有官员面奏皇帝，这皇帝居然就派大员彻查，这大员居然就借此名义杀人。——统治者的神经之脆弱昏庸，一至于此，所以其败亡也就更加快了。

最初刊载于1944年10月5日、8日、12日、15日、19日、22日、12月29日《新华日报》（重庆），署名卜公。



血不是白流的

当我提起笔来，想为双十节——这民国创立的纪念日写一点什么的时候，耳边恍惚听到了一个低微然而沉重的声音：

“又是这一套，早已听厌了。什么希望，什么追求，一年年说下去，永远只是空话！”

我相信我听到的是为数并不少的人从心头吐出来的话。这声音表现着的是疲劳、厌倦、沮丧、失望的情绪。

试把辛亥革命以后的民国史回忆一下，就知道这情绪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抗战的爆发曾使人心普遍地振奋了一下，但谁能否认，到了现在，沮丧、厌倦的情绪又在许多人心里暗暗滋长起来了？他们直觉地感到，已经空空过去的时间太久了，还未到来的前途太渺茫了，后之视今大概也是和今之视昔一样吧？

认真分析起来，这种情绪正是曾经经历过长期不变（表面上多变而实质不变）的封建社会关系的中国社会的必然产物。在这种社会中，要产生彻底的变更也就必须要求长期的斗争。人们倘禁受不住长期的磨折，就很容易趋于厌倦、沮丧、失望之中了。

但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社会中的前进者就不能不把这种情绪看做最可怕的障碍。在要求长期的斗争的地方就必须要求斗士具有最坚强的韧性精神。

在整个历史时期中，33年并不是很长的时期，何况在这期间



虽然一面是荒淫，一面是苦难绵延交织着，但是我们毕竟看到了，一个个大小暴君相继跌倒，看到了前进的斗争力量不断地更新、扩大、健壮。33年究竟并不是空空过去的。

把重压着我们心头的阴影抹去，认真地去看看客观实际，我们怎能说，今天仍只是和昨天一样，而明天又只能和今天、昨天一样呢？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民的血实在流得太多了。累积的血淤塞了人们的知觉，使人们以为一切的血都是白流。但事实上，任何一滴血都不是白流的，辛亥革命的血没有白流，33年来的血没有白流，抗战7年的血也绝不会白流。在这7年中，倒退老朽的力量是加速地走向崩溃，前进新生的力量是加速地发扬扩大。到了今天，实在是真正到了中国命运的转变关头了。

敢于认真地考察历史的人永不会厌倦，敢于正视现实的人永不会麻木，敢于大踏步前进的人永不会失望。抗战的决定时期就在眼前，太多流了的人民的血必须取得总的报偿，使辛亥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民国真正的名副其实，也就取决于我们今天的努力了！

10月10日

最初刊载于1944年10月10日《新华日报》(重庆)，署名陈桑。



人民的力量决定一切

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当选连任，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这些国家的政府在最近期内的相继改组，成为显著的对比。

在美国的国内和国外都有许多人不喜欢罗斯福，希望他所领导的政府倒台。这种不喜欢罗斯福的人中间包括德国、日本的法西斯头子和他们的喽罗走卒、近姻远亲。把这许多人的力量总和起来，实在不算很小，但是人民的力量比他们更大得多。美国的人民、全世界的人民都要求民主世界的实现，要求对法西斯的胜利，要求战后持久和平，所以他们欢迎能够执行这样的政策的罗斯福。美国的广大人民选举罗斯福，全世界的广大人民也支持罗斯福，于是罗斯福胜利了。

反过来，让我们来看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这些国家。他们的政府原来是法西斯性质的，或者是半法西斯、亲法西斯的。这些政府有国际的反动法西斯势力做后台，也有统治国内的强有力的国家机构，但是这些政府终于不能不一个个下台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很清楚的，这是因为人民不需要这种法西斯、半法西斯、亲法西斯的政府。当人民的力量抬头的时候，这种政府绝对没有容身之地。

这个对照明显地表现了一个历史的真理：人民的力量总是一切事件的最终的决定因素。



有人讨厌看历史,正是因为无论旧的历史书怎样渲染孤家寡人、王侯将相的功业,但终难以抹煞历史的真正主角其实还是人民大众。

但人们可以不读过去的历史,对于就在我们眼前展开着新鲜的历史,却没有法子闭着眼睛不看。人民的支配力量,在新的历史中是比在旧的历史中表现得加倍的鲜明直接了。只有为人民所拥护的才能够生存,为人民所憎恨的一定会垮台——每天发生着的世界新事件已经证明了这个真理,而且一定继续不断地在我们面前提供新的证明。

11月11日

最初刊载于1944年11月11日《新华日报》(重庆),署名陈桑。



民主主义是生命的活力

罗斯福总统在这一次再度当选后，发表声明说：“我们已在战争中举行大选，这是 80 年来的第一次。”他这样说，是因为恰恰在 80 年前，美国有过一次在战争中举行大选的先例。

那是在 1864 年。美国的“南北战争”已经继续了 3 年多。正在战争十分紧张的时候，举行了总统的改选。大家都知道，那次改选的结果是林肯总统再度当选。林肯在那时是美国人民的民主力量团结的核心，他所领导的战争是为保卫民主制度的战争，所以在战时的大选中，他再度受到了人民的拥戴。

这相距 80 年的前后两次大选交相辉映，其意义正如罗斯福总统所说的，“是向举世证明民主主义是生命的活力”，而这种伟大的活力是经受得起战争的考验的。

在 80 年前，美国的民主主义正在风雨飘摇之中。林肯总统在那时未尝不可以用战争的名义，凭借他政治上的既成势力来拒绝或者拖延改选，但他不这样做。他知道不该这样做，因为战争和国家是否还需要他领导应该由人民公意来决定。而且他知道他不必这样做，因为他对于民主和进步的事业的忠诚和贡献，已经为大多数人民所公认了。由不拒绝改选这一件事上，也就证明了林肯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和对民主主义的忠诚了。试设想一下，假如那时林肯竟拒绝改选，其结果会如何呢？那么他就成了民主的叛徒，纵然还



想恋栈不去，但人民是一定会远远地背离开他的了。

林肯的先例光辉地照耀着美国民主政治的历史。在 80 年后的这又一次战时大选中，不仅总统要重新选举，又不仅参众议院中都有许多议席要改选，而且在 48 个州中间有 32 个州的州长要改选。像这样的人事大更动发生在战时，似乎是非常不利的。但是因为这是有民主制度的保障，以人民的公意为基础的，所以整个改选过程是非常顺利迅速地进行着。四五千万人同时静静地写下了他们的选举票，决定把整个国事交给为他们所信赖的人。

由这样的改选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不仅没有扰乱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活，妨碍反法西斯战争的进行，而是更加巩固了美国国内的民主和团结，使战争的胜利更加有了保障——正如同 80 年前林肯的再度当选所发生的作用一样，使民主进步力量在战争中的最后胜利加速地来到了。

那些一口咬定民主制度绝不能适用于战时的先生们应该虚心看看这种事实！在这次战争中，各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议会中照常有着公开的辩论和对政府的责问，舆论上照常有着各种对于政府的人事机构政策尖锐的批评，人民照常有集会结社、选举罢免的自由，而像可以影响一个元首的那样的大选也照常举行。这一切都说明了，民主制度不仅是在战时完全可以适用，而且在战时是运用得更加灵活，范围更加扩大了。

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在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运用。他们不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摘，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宣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认定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只有忠于民主制度，坚决地依靠着民主主义这“生命的活力”的人，才能够在民主制度下继续存在。反之，害怕民主制度的人就是背离了这伟大的生命的活力，而终于会陷于死亡的绝境！

10月15日

最初刊载于1944年11月15日《新华日报》(重庆)，署名陈桑。



法西斯的末路

逃

法意各国正在严格地审讯查办叛卖人民的奸徒。许多曾经作威作福显赫一时的人，做了阶下囚，引颈待毙，这样的消息实在大快人心！

但是也有悄悄地逃走了的。像前几天报上说，法国总汇银行经理阿当，因为曾资助亲德活动而受审讯，审后他就逃得不知去向

了。虽然逃得狼狈，但是想起来，这样的人一定早有布置，在世界上不知哪一偏僻角落里是早已经安顿下财产房屋的了。

现在在德国有许多法西斯头子也在做着这种逃的准备了。据说近几日来，德国飞机不断载运金块到西班牙去，那都是德国的高官富豪的财产——法西斯暴君们到了现在，对于自己的前途，自己也失掉信心了。

他们的未雨绸缪虽然很聪明，但是事实将把他们教训得更加聪明一点；到了那一天，他们会知道，人民力量的胜利一定是全世界范围的，不论是西班牙还是南美洲都不能让这些罪犯逍遥法外做寓公！



骗

假如以为这些法西斯罪犯到了自信心动摇的时候，立刻死心塌地，承认失败，那就错了。他们纵然一面作着逃的准备，一面还是要想尽方法来挽回末运。

戈培尔向惶乱不安的德国人民说：“要知第六年乃战事的转折点，我们愈战愈强的信心，是决定战事的因素。”

日本的军部要饥饿的人民吃混着大量水的稀饭，说是这种吃法可以使人有“满腹感”。

他们是还想用这种无耻的谎话来欺骗人民，要人民忘记饥饿和灾难，不看见失败的惨祸，继续做他们的牺牲品。

本来，法西斯统治办法的拿手好戏，是压，用权力来吓唬人民，来镇压人民。压之中同时也带着骗。到了他的权力一天天衰颓，无可掩饰的时候，就更多地施用骗术了。可是在压的力量已经渐渐消失的时候，骗的空话哪里能生什么效力呢？

压不住，骗不了，逃不走——这就是一切法西斯罪犯的末路景象。

最初刊载于1944年11月28日《新华日报》(重庆)，署名李勃。



混 与 狠

近有人把官僚习气归纳为“推”、“拖”、“骗”三字，而又有总结为一个“混”字的。这是深识官场三昧之论。旧社会中的坏官僚的确是遇事可推则推，不能推则拖，拖不了则骗，以无作有，以假当真，其实是什么好事情也没有做，无非是鬼混而已。

但他们也并不是遇见任何事情都是像这样地因循敷衍的。混是消极的，但在消极的混中，也有积极的目的，这积极的目的就是他们自己的权利。在关涉到他们自己的权利时，他们却一变而为异常积极活跃了。为了保持既有的权利，为了争取更多的权利，他们是不惜想尽一切方法，用尽一切力量的。躲躲藏藏的偷也干，明目张胆的抢也干，一切损人利己，伤天害理，祸国殃民的事情都可以干，而且干得心安理得，不以为耻。

所以在“混”的一字以外，实在还应该加上一个字，就是“狠”字。因为是“混”，所以误国；因为是“狠”，所以害国。

已经死去了的李宗吾先生讲“厚黑学”。我看，旧社会的坏官僚是最合于厚黑学的，李先生本来也是以这些人为主要对象而谈的吧？要做到“推”、“拖”、“骗”、“混”，只要脸皮厚，已经够资格了，但又因为不只脸皮厚，而且心肠黑，所以才能既“混”而又“狠”。

光是“混”，也许还不是最可怕的。因为我们或者还能劝他觉悟，假如劝不醒，或者还可以用鞭子来打醒他。最可怕的是既“混”



而又“狠”了。表面上是在糊里糊涂的鬼混，实际上是有着精细狠毒的打算，表面上是什么事情也不在意，什么事也不做，实际上是不顾一切地死死抓住个人的权利不放。所以你无论怎样哀求，他也不会饶了你，甚至就在皮鞭子打着他的头时，他也还一时不会觉醒。

那么，怎么办呢？我看也只有一个字：就是：“滚”！

12月23日

最初刊载于1944年12月23日《新华日报》(重庆)，
署名卜公。



感情的麻醉剂

自己走着错路的人,还要旁人也跟着自己走。怎样才能使旁人跟着自己走呢?第一步自然要讲道理,要使人相信这条路是对的。

但道理不是随口乱讲就能讲得出来的。一定要有千真万确的事实做根据,必须是符合于事实发展的规律。无论怎样的生花妙舌,总不能把白的说成黑的,总不能把已经死的和正在死的说得又活转来。凭空乱造的道理,纵然说得像煞有介事,但一碰到事实就要粉碎,总不能使人相信。

既然道理讲不通,那就应该放弃叫别人跟从自己走的企图。但他们硬不肯放弃这企图,却想出了另一个主意,于是他们不讲道理,只讲感情,不从理智上说服,专从感情上煽动。

既然道理一遇见事实,真伪立辨,那么不讲道理,该可以没有这危险了吧?火啊,血啊,冲锋啊,眼泪啊,良心啊,这一切尽可大着嗓子喊。

希特勒、戈培尔之流欺骗人民,就是用这办法。他们虽也有所谓“国社主义”,但那道理其实是太幼稚荒谬了,并不能使人相信。所以他们所靠的法宝就只是煽动。

希特勒煽动起人民对于战争和胜利的狂热,却使他们看不到这其实是不义的侵略战争,并不能赢得胜利。希特勒煽动起人民的爱国主义的狂热,却使他们看不见这国家其实是法西斯统治者的



国家,对于人民并没有好处。……

总之,希特勒之流是要从人民中煽起盲目的狂热,使他们沉醉在这里面就好像沉醉在酒里面一样,完全看不见客观的事实,就可听凭摆布了。

不可否认,在这种宣传之下,也有上当的人。有些人,虽然不相信那把死的说成活的,把黑的说成白了的歪理,但在空洞无物的煽动下也不自觉地、迷迷糊糊地被麻醉了。

然而被麻醉的究竟只是极少数,只是一时。黑的到底还是黑的,死的终究还是死的。麻醉剂只能使有些人一时看不到事实,却绝不能改变事实。事实的教训仍将使醉人醒来。事实胜于雄辩,这却是一切法西斯宣传者无可奈何的!

12月28日

最初刊载于1944年12月28日《新华日报》(重庆),
署名陈桑。



两种读书人

读书人在古代是有特殊优越的身分地位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读了书就和普通老百姓不同，就有权利获得特殊的生活享受，就有资格做官。倘若不做官，去行医，就是“儒医”，比普通医生高一等，去带兵，就是“儒将”，比普通将官也高一等。乃至为娼为丐，倘若知书识字，身价也可以比普通的娼妓、乞丐高一点。

读书人之所以有这样高的地位，是封建帝王所有意造成的。

封建帝王虽然推崇读书人，但其实他并不愿意人民普遍地读书，又只准人读一定范围内的书。当帝王高兴时，他也可以让唱戏唱得好的，说笑话说得好的人做大官，他之推崇读书人也还是从这种态度出发。所以他所保护的读书人也只是那甘于为帝王“倡优畜之”的读书人。

这一类读书人，念熟了《圣谕广训》、《四书章句集注》，会写成篇的八股文，进学中举，便俨然以“民之父母”自居。因为得到帝王的特别维护，就无法无天起来了。“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原来他们从来没有学到什么，所做的自然只是贪赃枉法，害民肥己的事了。

古代的读书人就是现在的知识分子。即使是在封建时代，这样的读书人也并不能代表一切知识分子。在封建时代，也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读书人，也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读书人，也有“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读书人。这些可说是真正的读书人，他们只



觉得自己对社会负了更多的责任,对于自己的出处进退有更慎重的考虑,而不觉得自己有权利生活在别人的头上。

这样的真正的读书人,因为骨头太“硬”,太不“知趣”,不会“逢迎”,专说些使人“扫兴”的话,所以是封建帝王所不喜欢的。他们也就常常只能过着饥寒流离的生活。他们自己也甘于过这种生活,因为他们羞于和那些厕身于倡优之列的“读书人”为伍!

最初刊载于1945年1月7日《新华日报》(重庆),
署名陈桑。



争民主的战士永生

——纪念蔡元培先生

自蔡子民先生逝世以后，几年来，每遇蔡先生的纪念日，必可看到“人伦师表，一代儒宗”，“邦家耆宿，庠序楷模”一类的称号加在他的名字上面。以蔡先生的一生业绩，诚足以担当这些称号而无愧，然而却不是这些称号所能概括得了的。假如由此而使人觉得蔡先生只是一个“宁静”的学人，“毫无火气”的儒者，那更是对先贤的误识！

真正伟大的学者，总是把在学术思想上的真理的追求和现实的政治斗争集合于一身的，而这样的学者，也就常常难免于遭受悲惨的命运：在生前被弃于沟壑，在死后被送进文庙。送进文庙似乎是崇礼，其实都是要使他的战斗的光芒在后人的心目中永远磨灭。

蔡先生说过“读书不忘救国”这样的话，这话也曾被人曲解来抹煞读书人的救国运动。蔡先生这话的意义其实正是说，不要关着书房门读书，读书人不能不过问政治，不能不看到眼前国家的迫切问题，在应该说话的时候就要说话，在应该抗争的时候就要抗争。——这本是中国旧时代士大夫的传统精神中的好的积极的一面，所以每逢忧患丛生之时，总是有知识分子挺身而出，为民前锋。继承了这种优良的传统，更接受了新时代的民主主义思潮，蔡先生自己就是以学者的身分而参加了近40年来的中国的政治斗争和



文化斗争的。

我们不必来复述蔡先生在“五四”时代的业绩，大家都知道，在那时，蔡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保护人。军阀的压迫，复古派的攻击，集中于蔡先生之身，而他丝毫不为所动。他也明白地看出，这是一个斗争，并且看出在文化上的斗争和在政治上的斗争分不开来的。他写过一篇简短有力的文章，题目是“洪水与猛兽”，其中说：

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像。他的来势很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的人感受痛苦；仿佛水源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容纳他，就泛滥岸上，把田庐都扫荡了。……对付新思潮（像对付洪水一样），也要舍湮法用导法，让他自由发展，定是有利无害的。

至于猛兽，恰好作军阀的写照。现在军阀和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奢侈的了不得，别种好好作工的人，穷的饿死，这不是率兽杀人的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示，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野兽的派头么？

所以中国现在的状况，可说是洪水与猛兽竞争。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服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新青年》第7卷第5期，1920年4月）

由此可见，蔡先生的主张是要扑灭危害人民的旧势力，要让进步的新的事物自由发展。这正是在蔡先生一生的思想和作为中贯彻着的主张。

人们常称扬蔡先生在仕途上是“难进易退”，但假如因而把他看成是“古之逸士”是不对的。蔡先生之进于庙堂，是为了实行他的主张，所以庙堂不能容他，而他也宁可淡泊以明志，决不插足其间。到了民国21年，他又和宋庆龄先生等倡导组织“民权保障大同



盟”，可见虽在这时，蔡先生是仍旧保有着“五四”时代的斗争精神的，或者可以说是比以前更进了一步。

“民权保障大同盟”的成立，是在“九一八”以后，严重的国难激起了民主运动的高潮的时期。同盟存在的时期虽不久，但它在实际上和精神上所留下的影响是极巨大的，回想在倡导同盟的诸先生中，还有杨杏佛先生，他在当时为此而被暗杀；还有鲁迅先生和韬奋先生，他们也是在一切危难中坚持争民主的信念，到死方休。在这中间，蔡先生以老病之身，也置利害安危于度外，始终在民主运动中，隐隐然居于领袖群伦的地位，卒至最后客死于香港。他们都是中国知识分子学者中的最好的典型，他们的经历证明了中国的民主运动是何等的艰苦，是要求着何等勇敢坚韧的精神去从事。而蔡先生的人格和毅力的伟大也从这里越加光辉照人了。

假如有人想把蔡先生捧进文庙，来磨灭他的光芒，而有人只用空洞的革命的字眼来装点他，那么我们必须指出，他之所以是一个革命者，就因为他的一生贯彻着为民主而斗争的精神。他以“无所不包”的民主作风，扶助着进步的文化运动，他以“有所不为”的操守对抗着一切反民主的势力，他以学者的胸襟而成为民主斗争中的一个战士。

这种光辉是谁也无法掩盖的。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蔡先生的事业的实际影响更是谁都抹煞不了的。蔡先生在北大的时期所建立的民主主义的学风，是中国新教育的真正的创始，至今人们都看得出来，什么学校能较多保留着蔡先生的学风，什么学校就最有生气，在教育上最有成绩。蔡先生晚年主持中央研究院，学术研究机关虽然照例只能得到微薄的经费，而中央研究院仍能集合了一些认真做学问的人，在学术研究上，作出了许多可贵的贡献，也不能不归功于蔡先生。至于蔡先生一生主持正义，奖掖后进，这一代的



人所受赐于蔡先生的直接间接的影响的,更是不可以计量。

民主主义是生命的活力,这话的确是无论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学校,或是一个人,都是正确的。正因为坚持着民主主义的精神,蔡先生虽然死了,但是,仍然活在继续斗争的人的心里。蔡先生生前不见容于庙堂,死后也一定不愿在文庙里被供奉,他宁愿接受千千万万人民在争民主的斗争中从心坎里发出来的崇敬的吧。在千万人民的心上,争民主的战士是永生的!

最初刊载于 1945 年 1 月 11 日《新华日报》(重庆)。



言 语 和 武 器

话是人人都会讲的,但是向公众讲话的时候,尤其在记录成文字的时候,言语可以成为武器。

武器也是言语。当人们遇见暴力侵袭人的时候,就必须用武器来发言了。

言语和武器这二者,在专制主义时代,是都不属于老百姓所有的。拿秦始皇统治的时代来看,就是最明显不过的了。秦始皇既禁止人民私藏书籍,又禁止人民私藏武器。人民倘藏有书籍或武器,都必须交出来,送到咸阳城里,烧掉,销毁掉。只有皇帝、官家有书,有武器,也就是说,只有少数统治者有权向公众发言,而在这言语的后面,是有武器做后盾的。

现在大家都在谈民主,但怎样才算是民主呢?民主自然就是人民做主,人民当权的意思。那么要判别是否民主,有一个最简单不过的标准,就是看言语和武器这二者,人民是不是有权利自由地运用。

近来我读到不少介绍敌后解放区的民兵和介绍边区的文化运动成就的文章。

也许有人以为这些所介绍的内容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所谓民兵,无非是在敌寇侵占的威胁之下,老百姓运用了所可能得到的武器(地雷、手榴弹、步枪),一面生产,一面斗争。而所谓文化运动,像



乡村中手写的“黑板报”也不过是在很简陋的形式下，让人民尽可能向公众说出自己所要说的话。

是的，这也许可说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但是谁要是想知道怎样叫做民主，岂不就可以从这里看到民主的最具体的表现么？

为什么在那里不害怕人民运用武器——不但不害怕，而且还尽量鼓励人民运用武器，尽可能使人民能够自己制造武器，使用武器呢？

为什么在那里不害怕人民有说话的自由——不但不害怕，而且尽量鼓励人民说话，尽可能使人民能够得到自由说话的讲坛呢？

为什么在那里，并不因为人民掌握了言语和武器而形成社会秩序混乱的结果呢？——有人以为，要得到社会秩序的安定，就必须使武器和人民分离，并且把人民的嘴巴封闭起来。

这难道不正是表现了民主的效果么？只有在真正的民主政治下，武器才能够和人民结合，人民才能够自由地大声说话。既然是容许人民有权利拿言语做武器，用武器来发言，那么就铁一样地证明了这是真正的民主。

2月5日

最初刊载于1945年2月5日《新华日报》(重庆)，署名陈桑。



怎样做“读书笔记”

一般人都说，做笔记是对读书极有好处的一件事。

但事实上，并不见得凡做过读书笔记的人都能由此得到很多好处。在这里，所用的方法的是否恰当是件很重要的事；但怎样的方法才算恰当，又要由所企图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而决定。

有些朋友只是听说做笔记很有好处，所以就做笔记；他们并不能明确地说出自己做笔记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因此他们也就不能为自己找到最适当的方法，只是听人家说什么方法好，就采用什么方法，结果也就并不能从做读书笔记中得到任何好处，往往做了一个时期笔记，只觉得废时废力，劳而无功，便不知不觉地半途而废了。

我想，先把目的确定是一件最重要不过的事。要确定在每一时期，对于每一本书，做笔记的具体目的是什么。目的确定，方法也才能确定。假如我们在读书的不同时期，读不同的书时，都能获得最适当的笔记方法，那么做笔记的兴趣也就可以提高，因为从这里才可以得到很多好处。

其实不仅做笔记，做任何事也都是是一样的。所谓有没有益处就在于是否能达到预定的目的，假如本来并没有确定的目的，那就谈不到什么益处的有没有了。

所以做笔记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假如死守着一种方法，反



而是毫无好处的事。以下所谈只是笔者个人的一些经验。

旧时候，人们很重视一种读书方法，就是抄书。把自己觉得好的文章和书，成篇的，成段的或甚至成本的照抄下来。至今恐怕有人做笔记还是采取这方法，以为这可以“帮助记忆”。

是的，在有些时候，在读有些书时候，我们是需要用笔记来帮助记忆书的内容的。但问题是我们要记忆书中的什么东西，——是记得书中的文句呢，还是记得藏在这些文句之内的精神实质呢？很显然的，假如只记得文句，而忽略了书中的精神实质，是没有意义的事。因此，为了“帮助记忆”而做笔记，也不应该采取这种死板的抄书方法。

旧的读书人的目的本是要把他们所尊敬的书逐字逐句地背诵下来，因此抄书就是能够完成他们的目的的一种方法。但我们的目的不是如此，我们正要力求不囫圇吞枣地读书，因此也就必须避免囫圇吞枣地做笔记。

一般地说，当我们在各个科学部门内读一些基础知识的书时，做笔记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透过书中的文句而领会和记忆书中的内容，那么笔记方法就应该能适合这个目的。常有人告诉我们一种笔记方法，那是：把所读的书用分段落的方法来记出其要点来。读了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中的文章一节之后，我们可以想一下，在这一篇、一章或一节中按照其内容的层次结构可以分成几个段落，每一段落中或又可分成几个小段落，每一小段落中或又可分成几个更小的段落，于是我们就在笔记本上把每个大段落、小段落、更小的段落的基本内容用最简单的文字，按次排列记下来。在这记录中最好完全不用原书的文字，尽可能根据自己的了解，用自己的文字。



笔者在中学校时，曾用这个方法对付所读的许多书，自觉得益很大。我以为，这种笔记方法的作用并不是在于把所读的书，从其整体上来分析成许多片段，以便于记忆，而在于弄清楚，这些片段怎样由于它们的内部的逻辑系统而构成一个整体。把握住一本书的叙述内容上的逻辑系统，我以为，就是理解一本书的可靠的出发点（虽然也还不能说，已经完全理解）。

我们大概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在读一本对于我们内容比较艰深的书时，一路读下去，只读到零零碎碎的字句、片段段的意思，不能捉到这些字句与片段意思之间的关联，这时就不能不感到十分苦恼。但，终于看到有几句句子或有一段话似乎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在这里所要说的中心意思，所要达到的最后的结论，于是，如释重负，“好，这下子被我捉住了”！就拿起笔来，把这几句、这一段照抄下来，以为这样就算是把握到书中的精华，书中的灵魂了。

但是很显然的，这样做法很不对。也许是我们根本弄错了，这抄下来的话并不是什么最重要的结论。纵然并没有弄错，这整本书所要说明的确实就是这一个可以用几句话包括尽了的结论，但是假如我们以为只要知道这一个结论，其余的话就都可以不管，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其余的话中一定是包含着对于这个结论的必要的前提，达到这个结论的种种论证，对于这个结论的某种条件的限制和应有的补充等等。脱离了这一切，我们就不能算是理解了这个结论；纵然我们已把这结论抄在纸上，记在心头，也还是空的。一本书的灵魂并不只在它所最后达到的某一个结论，而是在如何达到这个结论的全部过程中。因此我们必须改变那种只注意书中的结论是什么的习惯，而要由把握书中的逻辑系统来真正地把书读通。因



此我们也不能在那种帮助了解与记忆的读书笔记中，只抄一个个的结论，而要注意整个书中的逻辑系统。换句话说，就是不仅注意结论是什么，而要注意这结论是怎样产生的；再换句话说，就是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

把这一点弄清楚，于是我们来用如上所举的方法做笔记才有意义，我们是把一本书的全部内容进行分析，在我们的笔记上使这书的全部内容，按照其本来的逻辑系统约缩为一个简单的纪录。自然，按照原书的叙述方式的不同，笔记的形式也可以有种种不同。有时还可以采取图表来做补助，使逻辑的过程更加简单明了。

用这种方法做笔记可以使我们在读书的同时发展思考，帮助我们领会原书，接触书中的灵魂；可以帮助我们渐渐养成在读书时不是背诵文字，而是注意其内容，不是片段地了解，而是整体地了解的习惯；也可以帮助我们在独立地进行思考与写作时更能够有条有理。

我并不以为，在任何时候，读任何书时，都该用这种笔记方法。我自己也只是在有一个时期中采用这方法。后来在读譬如《资本论》那样的书的时候，对于其中内容特别繁复，分析得格外精微的部分，我还觉得，有用那种笔记方法来整理读时所得到的印象的必要。

对于有些书，当我读的过程中，已能对其全部内容一目了然，并无记下来留供参考的必要，所值得特别注意的不过是其中个别的部分，那么，自然就不必再做上述那种笔记。我们就应该按照需要与目的不同而创造出种种不同的笔记形式来。

我以为，做笔记固然是一件不偷懒的人才能做的事，因为一面读书，一面做笔记总要多花点精力；但同时，做笔记时也必须知道



如何偷懒,就是如何节省精力。笔者自己就曾浪费许多精力做了些并没有什么用处的笔记,结果反而使读书和做笔记的兴趣都受了损害。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过这样的经验的。——所以,我要再重复说一句,一定要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做笔记。

假如是为了便于以后查考书中的某些话、某些说法,那么有时只在书上画线就可以的。但我常见有人在书上画线,结果几乎把所有的句子下都画上了线,那岂不是除了表示他在读书时还有支铅笔在手里以外,别无其他意义。我想,我们应该更郑重地画线,最好自己规定不同的符号来表明出各种不同性质的重要地方。

假如为以后容易翻检到原书,那么在笔记本上记上“关于某某问题,见某书某某页”或再加上几句简单的提要也就够了。

假如以后翻检原书不方便,那么笔记自然就可记得较详细一点。

假如在读书时自己有所触发,或者把书中的话和事实印证有所新的了解,或者为了注意某一问题曾翻检过好些书,并且自己好好地想过一下,那自然就可以记得更详细一点,因为事后也许忘记,再要想起和查考出来不容易。

总之,我的意思是,不要给自己太多的不必要的麻烦。反过来说,也就是要做笔记,总要求其有用处,有意义。

我们固然应该眼光远大,但我以为,我们在做笔记时却宁可以当前的需要为范围。假如为了也许将来对自己有用处,所以现在随时随地一看到什么似乎很有意思、很有趣味的的话和知识,都一一记录下来,使我们的笔记本成为一本杂乱的大堆栈,那么做笔记的真正功效反而失掉了。一个为供给公共需用的资料室应尽可能搜集各方面的材料,但个人的笔记本却总是为个人的需要而作。我们做笔记的内容不能没有范围,或者是和自己目前的工作



有关的范围，或者是目前自己所注意的问题的范围，或者是目前自己的研究范围。

为公共需用而设的资料编集方法自然和个人的读书笔记方法不同，一个有若干人力的研究室的整理资料的方法自然也和个人的读书笔记方法不同，甚至一个专门家的笔记方法也和我们普通的读书人的笔记方法不尽相同。所以接受旁人的经验固然是应该的，但是随便移用旁人所用的方法却常常会失败。

以卡片与笔记本二者的优劣比较来说罢，常常听见很多人说，用卡片是最方便不过的事。于是我也尝试一下，然而我失败了。我发现，既然并不准备较大规模地搜集许多材料来从事某一方面问题的专门研究，那么做卡片实在是反而增加麻烦的事。

于是我仍旧用笔记本。我在横写的每一页的右边留下一点空白，用根线画开，使得我记下的每一段笔记在它的右边可以有一个题目。这样，检查起来也很方便。在写完一本后，把全部笔记的题目做一个索引表，那就更方便了。后来我又改用活页的本子。

自然，我并不是一般地反对做卡片，而是说，在有些情形下，用卡片或者反而不如用本子。这也就是说，在用卡片还是用本子这个问题上，也要看具体情形而定，未可一概而论。

最后我还要说，虽然做笔记可以是一种好的读书方法，但究竟只是一种辅助的方法。读书方法的根本要点还是在多多思考，从书中所说的全部内容上来思考，从这本书中所说和那本书中所说的相互对照着来思考，尤其重要是把书中所说的和实际相对照来思考。用笔并不能代替用脑子，假如因为一味用笔写笔记，反而妨碍打开脑子多思考，那么还是不做笔记的好。用任何形式记的笔记都应该是经过思考以后的结果才有意义。与其多记而少想或不想，宁



可不记或少记而多想。从做读书笔记中固然可能得到好处,但也并不必太迷信这一种方法。

最初刊载于1945年2月10日《群众》(重庆),
第10卷第2期。



是不是代用品呢

朝鲜义勇军的宣传员用电话向敌人堡垒里做政治宣传，指出日本国内的贫穷的时候，敌兵很神气地说：他身上穿着的正是前天刚发下的新军衣。义勇军同志马上不客气地追问：“那么细细看是不是代用品呢？”这一问就把敌兵问得哑口无言。

这的确是非常厉害的追问，这样的问题在别的场合，在别的事情上，也是值得提出的。

因为在这世界上确有很多骗子在活动，所以我们必需这样一步紧一步地追问。光是口头说说空话，我们不能相信。必需追问：事实到底如何呢？纵然俨乎其然地拿出事实来，我们也还不能马上相信，必需再追问一下，是不是“代用品”呢？——这样追问下去，才能揭破骗子的勾当，才能达到货真价实的目的。

假如你遇见假充风雅的市侩，拿出周鼎汉器、唐宋真迹来给你鉴赏，而你存心要他扫兴的话，那么你不妨追问：“这些是不是代用品呢？”但市侩把假货认成了真的往往不过是受骗上当的人，这些假货是从古董商手里买来的。那些古董商今天躲在房间里偷偷摸摸地伪装假造，明天就拿出来炫示给人，说这是如何名贵的古物。对于这种骗子，我们应该严词斥责：不要拿代用品来骗人！

但假造古货，不过是骗术中之小焉者而已。一切骗子中的最大的骗子是法西斯。要知道法西斯，不仅是善于说空话来骗人，而且



是善于制造“代用品”来骗人的！

法西斯国家中也有新衣服，但新衣服是用木屑树皮做的——是代用品！法西斯国家中也有国会，有舆论，但国会和舆论都在法西斯的统治包办之下——是代用品！

2月11日

最初刊载于1945年2月11日《新华日报》(重庆)，署名友谷。



正视农村中的黑暗

自古以来,有许多“田园诗人”,把农民描写得十分安静、和平、甜美,把农村生活描写得十分自由幸福。——这其实都是说谎。农村和农民的生活从来都不是这样的。这些田园诗人自己并不是农民,而是寄生在农民的劳力上面的人,所以从他们的眼睛中所看到的农村,自然和实际的农村完全不同。

当我们走入真实的农村的时候,就不能不看到和“田园诗”相反的景象。沉重的苦难压在农民头上,黑暗的阴影笼罩在农村上面。

曾经在两三千年中,农村一直封锁在封建社会关系中。农民担负着整个社会的生产任务,而被迫着以自己的血汗和生命供养一代代的专制统治王朝,养活一切独夫贵族官僚地主。千百万无名无姓的农民是封建时代的社会文化的创造者,但他们过的却是被压迫、被剥削的黑暗的生活。

纯粹的封建时代是已经过去了,但是历史残留的阴影仍旧继续盘据在广大的农村中。固然至今在广大的敌后解放区中,农村已经开始呼吸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自由的空气,但是黑暗势力在大部分地区中还是拖着农村的脚步,使它迟迟落后。一切落后的社会政治势力都是尽力保持着农村的落后,建基于这落后的农村之上的;都是尽力榨取农民的血汗,以农民的血汗来养活自己的。



正因为农村里充满着黑暗,就使得有许多人对于农村发生了恐惧,望而却步,不敢去接近——但谁假如因为害怕农村中的黑暗而到城市中去找寻光明,那就大错了。中国社会的基础是农村,当农村停留在黑暗中时,城市决不会展开光明!

一个真正有勇气、有决心去从事改造中国社会的事业的人,就必须有勇气、有决心去面对农村中的苦难和黑暗。

从田园诗人的朦胧的眼睛中,我们永远不能认识真正的农村、真实的中国;假如我们不敢去面对那束缚着、妨害着农村的黑暗势力,那么改进中国社会,建立现代化的中国也就只是空谈。

我们要到农村去,并不是因为它像牧歌一样地美丽,恰恰是因为它充满着这样根深蒂固的黑暗势力和这样沉重的苦难。我们要走到农村中去面对种种苦难和黑暗,更亲切地认识它,并且从这苦难和黑暗中,认识那具有伟大潜力的农民的力量。

3月21日

最初刊载于1945年3月21日《新华日报》(重庆),
署名陈桑。



谈 破 落 户

破落户在中国的讽刺小说中常常是一个动人的角色，能够吸引读者浓厚的兴趣。

这种人本来由于祖上的遗泽，确曾有过良田、大厦、声望、威势，但是由于自己不争气，产业一点一点都在自己手里卖掉了，威势也都已像破庙佛像的金身一样，完全剥落掉了。然而他的架子一时还不倒，还是住在那已经黯然无光的大宅子里，也就还可以装模作样，摆摆威风：

“混帐王八蛋，好大胆子，敢到这儿来撒野！……什么？我欠了你们的钱？我×老爷会欠你们的钱？……滚出去！放明白些，多少还赏你们一点。要是敢胡说八道的话……来人，拿我的片子，把这些不懂王法的东西送到衙门里去！……”

假如是不明底细的人，是不免被这一片吆喝所唬倒的。

研究一下这种破落户的心情，是很有趣的。他也明知道已经没有人害怕自己，更谈不到尊重了；他也明知道一个个债户迫紧来，是连最后这座空宅子也保持不住的了；他也明知道，真拿自己的“片子”出去，是一点效力也没有的了——但他还是要说大话，逞威风。

这与其说是习惯使然——一向用这样声气说话，使惯威风——毋宁说是为了掩护自己破落的事实，更非在场面上摆得威风



一些不可。

但破落户对于自己的命运,究竟是不能深切地认识的。他不相信自己真是一败涂地了,所以虽然在实质上已经面临绝境,但还是努力使自己相信,旧的威风仍旧留在自己身上,以为人们还不得不敬而畏之。当他站在他的破花厅上呼喝的时候,他的确觉得他的历代做过大官的祖先的亡魂和一切他所已失去的财产、权势之幽灵,都还附在自己的身上,所以他还以为,自己还有充分权利把自己看做是站在面前的这一切人之上的。

对于这样的破落户,不要以为只是可怜、可笑啊。要知道,他不仅是在小说中的丑角,而且还是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蠢虫。当他遇到唬得住人的时候,就要唬,遇到骗得了人的时候,还要骗,当他还能为非作歹的时候,就还是要为非作歹的!

3月24日

最初刊载于1945年3月24日《新华日报》(重庆),署名友谷。



梦的制造者

桃花源,乌托邦,这是人在幻想中所创造出来的境界。在受苦受难中,有些人企望着自由幸福的新生活,但看不到如何在现实中造成新生活的道路,便制造出这种梦来寄托自己的幸福。

然而受难的人民的希望决不只停留在梦中。打开任何一个民族的任何一时代的历史,几乎都可看到,人民大众用血和肉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博取自由和幸福而作着现实的斗争,这种斗争自然要遭受人民的敌人的迫害和压制。人民的敌人说:你们老百姓生来应该吃苦,不该得到幸福;你们的天责就是服从,不该得到自由!他们就以这种“理论依据”来企图阻断人民走向自由幸福去的道路。

但是人民的前进的道路是阻断不了的。于是在人民的斗争排除了一切障碍而高涨起来的时候,有些“聪明”的统治者就想出另一套办法。他们向人民藏起了恶狠狠的模样,另换一副面目说:“亲爱的人民啊,你们不是要自由幸福么?真的,你们的生活实在是太苦了,应该改好一点。来吧,到我这里来,在我这里就有自由幸福的将来。”——他们布置了一个梦,让人民离开现实的斗争而钻进这空虚的梦里去。

德国的纳粹统治者就曾经用一个好梦来麻醉了他们的人民。他们使人民相信,当犹太人杀尽,布尔什维克被铲除,民主主义的势力消灭的时候,就是德国人民最好的日子到来了。



但现在怎样了呢？德国人民应该能开始从法西斯魔王所造出来的梦中渐渐醒过来了吧？

相反的，欧洲各民族的反法西斯人民大众，通过了艰难辛苦的斗争，今天终于在那把法西斯统治推翻的干净大地上面，获得了过民主生活的权利，在这民主的基础上展开了自由幸福的前途。——这不是一个梦，而是一个实际。

很显然的，梦和实际的差别正和白天和黑夜之差别一样。人民从来不是、今天更不是愚蠢到这样的程度，连白昼和黑夜都分别不出来。民主自由和幸福都不会由恩赐而得来。御赐钦定的梦，纵然被描画得多么美丽，是决不能叫人上圈套的。

而且本来不过是梦，因此无论怎样点缀，也还是那么空虚、黯淡，而且只要稍稍揭破一点，人们就不难看到，作为这种梦的背景的还是魔鬼的毒爪和血盆大口。

造梦者骗不了人民，反倒只是毁了自己。人民勇敢踏实地走向民主、自由、幸福的道路，而希特勒、墨索里尼之辈却正是被自己所造的梦毁灭了自己！

5月15日

最初刊载于1945年5月15日《新华日报》(重庆)，署名友谷。



一种文章的读法

暇来随便翻翻杂志，常可以得到些有趣味的见闻。今天就从一本杂志上看到一段标明为《革命逸闻》的小文章。这篇文章的一开头就说：“讖纬术数之说，儒者不言，革命党人素来破除迷信，更不应有类于讖纬之见解。”接着就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先烈”在被逮后，所书供词中有“异人归楚，吾说自验”二语，“似乎隐有先知之术”。“未反正之前，此谜无人能解，及武汉起义，即古之楚地，革命由此成功，则烈士所谓‘异人归楚，吾说自验’者似有多少应验。然则讖纬之说，固不可信而可信者也”。再接下去，这篇短文又解释了烧饼歌中“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方罢手”二语，结论道：“作此讖语者，殆先知汉族反正后用西洋剪刀除剪辫子，故曰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方罢手也。此说虽或是附会之词，但亦言之成理。故笔者亦妄言之。”

这本来不过是一段杂志补白，似不值得深论，但是从一粒粟中可见世界，从一瓢水中可见大海，从这一段小小文字中，也可以使我们懂得泛滥在市场上的那种廉价的言论的奥妙。因此我觉得不妨提出这篇短文来谈谈。

这篇短文的作者显然是自命为“儒者”而又是“革命党人”的，所以文章的开头就说了那么几句话。从那几句话中看去，似乎接下去应该有一篇驳讖纬的迷信的文章了，然后不料所说的却是“先



烈”具有“先知之术”，而革命的事实早已隐伏在烧饼歌中。虽是“不可信”，却又是“可信”的，虽说是“附会之词”，却又是“言之成理”。所谓“革命逸话”，却成了宣传迷信的文章，短短一篇小文，就有了如许矛盾，岂不可怪！

自相矛盾正是这类人的议论的特质。不懂得这点，你就不配读他们的文章。

试分析一下，这位作者的思想意识的真象究竟是怎样？完全可以肯定，他其实是相信“谶纬术数之说”的。既然相信，为什么又要说什么“儒者不言”，而“革命党人……更不应有”呢？原来他们知道公然宣传迷信是不行的，必须标明自己反对谶纬术数，才能证明自己是“革命党人”。“革命党人素来破除迷信”，这话对于他们不过是一句空洞的标榜，和他们的真心真意是毫无关系的。

到了别的场合，在需要时，他们自然也会写一大篇讲破除迷信的文章，骂老百姓如何如何愚蠢，居然相信烧饼歌，说自己是如何彻底的革命党人，一定要扫除迷信思想。——假如在读到这种文章时，你竟相信，那就上了当了。原来他们的真心是“不可信而可信”，“虽或是附会之词，但亦言之成理”，并没有写出来。现在他们不过是写一段以供杂志补白的短文章，无须作古正经，所以把自己的真面目露出来了。但纵然是在写这样的小文章时，一面宣传先烈的先知之术和烧饼歌的预言能力，也还不要忘记先交代一下破除迷信，而且把这文章叫做革命逸话，不叫做谶纬逸话，其习惯于作伪，是到了何等的程度啊。

假如有人仍以为这不过是段小文章，不值得深论，那么请看吧，和这种说法相类似的文章，实在是很多很多的。

譬如一篇文章可以先是说，革命党人一向反对专制，更应该反对法西斯。但结论却是，法西斯学说虽然不可信，其实还是可信的；



虽然大家反对，却还是言之成理的。

譬如一篇文章可以说，革命党人一向爱护民众，自然应该维护民权。但结论却是，人民的力量虽然应该信赖，其实还是很可怕的；民主的道理虽然似乎言之成理，其实是不能遵行的。

但还有更多文章是只说了前段的话，而把那表明自己的真意的结论不明白说出的，因此善读书者就必须从他们的文章中前后矛盾之处和他们的没有说出的结论中读出他们心中的真意。至于挂着“民主”什么的招牌的杂志，所宣传的其实是相反的理论，这也和在《革命逸闻》的标题下宣扬讖纬术数之说一样，是很不少的。

世界上既有这样的文章，所以我们就必须学会对这种文章的读法。

5月30日

最初刊载于1945年5月30日《新华日报》(重庆)，
署名陈桑。



隔膜

向饥民说“何不食肉糜”的皇帝在历史上传为笑柄，其实这皇帝是老实地说出他自己的“忠告”，这“忠告”之所以不切实际，只是因为皇帝和饥民生活相去过远，就不免有点隔膜了。

这样的隔膜是常可见得到的。譬如一个大学生写信给一个报纸的编者说，“近来我感觉非常烦闷，我不满意现实，不满意学校，不满意一切的一切，甚至连我以前的最好的朋友”。编者回答道：“你无端自寻烦恼，一定得了神经衰弱症，否则就是失了恋”。答复是这样地肯定，足见在这位编者心目中，除非是因为找老婆找不到，或者不幸有神经病，一个人是决不会有什么烦恼的。但是假如这位大学生未有所恋，而到校医那里去检查一下，除了一般学生共有的营养不良症而外，也并没有什么神经病，那又怎样呢？

其实这位大学生在问题中已经说出了他的烦恼的原因：眼前的现实使他不满意。但是他不能明白分析何以现实使他不满意，因此也就被卷在烦恼里不知所措，于是他就提出了问题。不料问题恰恰提到了一个对现实十分满意的人的面前，那么他除了挨一顿臭骂以外还能得到什么？

从来没有饥民向皇帝说：近来我感觉非常饥饿。假如说了，答复一定是：你为什么无端自寻饥饿？你为什么不吃肉圆子？因此这位大学生向这样一种人去提出问题，所能得到的答复自然是：你为



什么发神经病？你为什么不去打野鸡？你为什么不走升官发财的捷径？

6月21日

最初刊载于1945年6月21日《新华日报》(重庆)，署名陈桑。



红 十 字

前几时，天久不雨，报纸上就有人应景谈旱灾。据说，曾有某地，久旱不雨，农民蜂拥进城，要求衙门里的官儿给人民雨水。——跟着这故事的叙述，便来了一番慨叹，说是人民的无知由此可见，要实行民主实在不容易云云。

现在，雨是下过了，但又来了霍乱的威胁。马路上时时可以看见抬过站着一只雄鸡的棺材，或者是晃晃荡荡的所谓“软抬”。大街小巷上家家户户门前贴着一个红“十”字，还有在红十字间加上一张钞票的，说是这就可以辟疫。看到红“十”字和“软抬”的对照，不能不使人心悸，也使人苦痛。

永远不放过一个可以嘲笑人民愚蠢的机会的人，在这里，又得到了一个好机会。在天旱的时候向官老爷要雨，在瘟疫的时候向冥冥中不知在哪里的鬼神求庇护，似乎人民真是不可救药地“愚蠢”。

但是喜欢嘲笑人民的人，其实真应该从这些事反省一下。假如我是一个对城市卫生应该负责的人，我将视这些红十字为对我的绝大讽刺。假如我是一个对于国民教育应该负责的人，我更要羞于看见这些红十字。在现代科学条件下，瘟疫的消灭本可有速效，但为什么竟让人民走向“求天”的绝路？国民教育办了这许多年，为什么竟让人民的头脑还是沉浸在迷信中间？

满街的红十字正是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反映着人民一向在物



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被迫处于何等可悲的境地。他们从来没有自己做主人的权利，他们的命运被握在不负责任的人的手里。但是当
他们面临死亡的边缘，做着无望的挣扎时，他们却成了嘲笑的对象！

在旱灾中的农民，第一步本也是求天求神；到蜂拥向官府去索雨时，是已经发觉天意的虚妄了。以为官能使上天降雨固然还是种
误见，但是旱而成灾，难道衙门真是可以不负责任么？

假如嘲笑应该加在“愚昧”的人民的
身上，那么愤怒应该放到那造成人民的愚昧，反而恶意地嘲笑人民的人的身上。

6月30日

最初刊载于1945年6月30日《新华日报》(重庆)，
署名陈桑。



人民的胜利

8年前，中国人民以兴奋的、坚决的心情走向了战争。大家都明白，这将是一场长久而艰苦的搏斗，也都坚信着，从这次搏斗中一定能获得胜利。

战争一年年过去，由于经历到许多最初没有预料到的顿挫、波折、拖延、磨难，不可讳言的，在不少人的心里渐渐笼上了一层消沉忧郁的阴影。但是这层阴影并没有把人拖向绝望的深渊，相反的，倒使大多数人更能沉着而清醒了。在广大人民中，苦难锻炼出了更强的力量，不灭的胜利的信心依然引导着向前搏斗。终于，经受了无数困难，通过了重重障碍，我们已经走入抗战的第九年了。到了现在，虽然还有艰苦的斗争在面前，但是放眼国际国内的形势，我们可以说，胜利已经确定不移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了。

曾经有人以抗战必败论来威吓人民，也有人以廉价的胜利来欺骗人民。早在抗战开始的一两年中，已有人向人民说：胜利是无望的，抗战只是徒然的牺牲，中国将徒然成为焦土，人民的血是白流的。近年来，又有人向人民说：胜利就在面前，俯拾即是，留给人民的事似乎只是买船票下长江了。人民既没有上前一种说法的当，也不会受后一种说法的骗。人民知道，不经过艰苦的斗争，是不能得到真正的胜利的，而在斗争中，人民一定能得到胜利。

用廉价的胜利来欺骗人民的真实用意，充分地表现在“确保胜



利的果实”这样的说法中间。原来那是想不依靠人民的力量来获得一种侥幸的“胜利”，于是使胜利的果实不为多数人民所有，而为少数的特权者所独占。但这其实是梦想！八年抗战，能够支持到今日，所依靠的就是人民的力量，想不要人民而得到胜利，那是决不可能的。人民忍受了山一样重的苦难，流了海一样深的血，却只是栽培了给别人享受的果实，那更是不可能想象的。

到了现在，人民是有充分把握来为即将到来的胜利而欢呼了。也只有已经为抗战吃过苦，流过血的人民才有资格为胜利欢呼。因为走向胜利的最后一程路还要人民的力量去完成。“消灭日本侵略者是中国人民的神圣权利”。——想限制或剥夺中国人民的这种神圣权利的企图必然失败。人民要求民主，也就是要求能够充分地执行这种神圣权利。大势所趋，这个要求是一定能够实现的。——抗战一定能够胜利，胜利一定属于人民所有，中国人民一定能得到独立解放和幸福的前途，这些都已是不可动摇的趋势了。

7月7日

最初刊载于1945年7月7日《新华日报》(重庆)，署名陈桑。



为中国民族的 新时代的开始而欢呼

8年来，我们等待着的不就是这个日子么？

一个强大的野蛮的敌人在我们面前倒下去了。

一串和平的自由的的日子在我们面前迎接着我们。

从此我们再不必担心会有一颗炸弹落到我们的头上，从此我们再不会担心会因为敌人的追逐从一个城市逃难到另一个城市了。什么三角球，什么紧急警报，这些怪东西，滚你的吧！

但更重要的是从此我们就要从奴隶的命运中解放出来，摆脱那多少年来重压着中国人民的苦难，从此我们要真正做自己的主人，为增进自己的幸福而努力了。

难道我们不应该高声欢呼，大声叫喊么？

我们要更高声地为抗战胜利而欢呼！我们要更大声地为人民的胜利而欢呼！

有些人擦擦自己的眼睛说：难道这是真的么？这来得是多么突然啊！

不，胜利并不是突然而来的。这胜利来得不是突然，更不是侥幸。8年来，中国人民都曾经能出多少力，就出多少力，该受多少苦，就受多少苦。8年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抗战胜利而流的血，难道还少么？没有你的 我的、他的努力，哪里会有这胜利？



我们无愧于我们所得到的胜利。这胜利真是我们，中国人民所争取得来的。

回想在抗战开始之时，很多人怀疑我们的能力能否打败敌人，更少人相信我们竟能支持抗战到8年之久。

终于凭着人民的力量竟把抗战支持了8年之久，而走向了胜利。已经表现了有这样的伟大力量的中国人民，对于能够开辟自己的幸福的前途，还会有什么怀疑么？

假如有人以为，战时生活将为平时生活所代替，这就是说：在战前的那种生活，为战事所中断，现在是又将继续下来了。那么我们说，这是完全不对的。

抗战8年造成了太大的变化，使一个幼儿变成了青年，使一个青年走向了壮年，但更大的变化是整个时代变了。旧的时代不能再恢复，正如青年不能倒退为幼年一样。

曾经是大亨的难道还会该继续是大亨么？曾经是奴隶的还该继续是奴隶么？

难道我们吃苦受难，只是为了我们可以继续安稳地做奴隶么？

不，世界变了，中国也变了。在新的世界，新的中国，人民是主人翁，要有权力决定自己的命运，创造自己的幸福的生活，那是谁也阻止不了的了。

为什么我们不更高声地欢呼，更大声地喊叫呢？

让我们更高声地为抗战胜利结束而欢呼！让我们更大声地为中国民族的新时代的开始而欢呼！

8月12日

最初刊载于1945年8月12日《新华日报》(重庆)，署名陈桑。



快活的人和不快活的人

抗战的胜利，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引起了情绪的大波动。由这几天的狂欢中，我回想到在8年前，那时抗战的爆发也曾在我们的心里引起情绪的波动。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在这两次情绪波动中同样都是带着欢喜、信心和快意的。

我们曾为抗战的开始而欢喜，因为那时大家知道，和日本决一死战是中华民族自救的唯一办法。实行抗战是人民馨香祝祷了多少年的事，一旦竟能实现，我们是何等快活。那时，我们对于能够抗战到底，取得胜利，有着充分的信心；我们抱着不惜一切牺牲，不怕一切困难的战斗决意而走进战争。

现在，消灭敌寇已经有了充分把握，我们的快活是不待说的。抗战由于人民的力量而胜利，人民的力量必能按照人民的意志与利益而结束战争，推动战后中国的进步，对于这，我们也有最强的信心。但自然这也并不是一条完全平坦的道路，必须用极大的努力才能达到这种进步的实现。

8年过去了。今日的快活高过于当年的快活何止千百倍，今日的信心和决意比当年的信心和决意也更强了何止千百倍。站在人民的立场，认清了当前的局势，我们可以有最大的欢快，我们可以有充分的信心，并且抱着最大的决意循着人民的方向前进。

但是在人民欢快的时候，有没有不快活的人呢？说来虽然似乎



奇怪,但事实上,不快活的人的确是有的。当初人民因为抗战的实现而快活,有人就因为抗战的实现而不快活;现在人民因为抗战的胜利而快活,有人也就因为抗战的胜利而不快活了。讨厌人民的战争的人也就讨厌人民的胜利,反人民的人有着和人民相反的情绪,那岂不是很自然的事么?

抗战本来是人民的事业,但对于有些人,却成为进行别种活动的一种借口。保持国防机密成为钳制言论的借口,战时动员成为取消人民自由的借口,战时经济成为束缚私人资本的借口,战时组织成为限制集会结社的借口。

当这一切借口都失掉了存在的根据的时候,他们的不快活是可想而见的。

找寻新的借口来保持这种所谓战时组织、战时经济、战时动员,那是费了心机的!诚然在战争的结束过程中还要有艰苦的斗争,战后的建设更是浩大的事业。但是战争的胜利并不是依靠这种所谓战时组织什么的。在战争的结束过程和战后的建国事业中,毫无疑问的,人民用不着这些实质上只是镣铐的东西。

让这些不快活的人更加不快活吧。胜利的快活的人民,自己知道应该做什么。

最初刊载于1945年8月15日《新华日报》(重庆),
署名陈桑。



“秘密”电台

8月18日有几家重庆报纸刊出了一则关于北平、上海的消息。全文读者不难复按，兹节录特别可注意的文句如下：

（中央社讯）关系方面昨晚收得上海地下军秘密电台之报告……现市内情况尚称安谧……又17日晨8时，上海广播电台XGOG报告……地方治安现仍由日军维持，对市民之欢乐行动，未加干涉，情形尚为安定云。又中央宣传部收音站昨日收录北平广播电台之广播……将中国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部昨日在北平市内散发之告市民书广播，其原文如下：“亲爱的同胞们，我们是胜利了……我们应如何痛定思痛，感慨万分。……今者国家光复，吾人在兴奋之余，实应各自警惕，各安其业，倘有自甘暴弃，或有捣乱之行为发生，不独为国家法律所不容，亦为国人公愤所不许。……”

在这消息中，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假如是真正的“地下军”，顾名思义，在这上海还在敌人汉奸统治下的时候，他们的任务应该是战斗。而这个地下军所报告的却不是他们如何战斗，却是市上情况的“安谧”。日军（当他们拿着武器时还是敌军啊！）居然还在维持治安，这所维持的治安是敌人汉奸统治下的治安，是不待说的。由这个消息中，我们可以很明白地看出，这个所谓“地下军”是赞同“日军”所“维持”的“治安”的，



而“日军”对于这个“地下军”的行动也未加干涉。

第二，这个新闻中所引北平广播没有讲到北平市内情况，但截至16、17日，还没有任何抗日军队进入北平市内，是可以断定的。在这时候，北平有一个所谓特别市党部者散发告市民书本不足为奇。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南京城内，6年来，一向挂着中国国民党中央的招牌。但要人民在敌人汉奸统治尚未推倒之时“各安其业”，不要“捣乱”，这是个什么市党部，可以不言而喻。这个党部也高喊“我们是胜利了”，那更是不足为奇的。

附带说一下，《中央日报》刊出这个中央社讯不如别的几家报纸那样完全，未刊那个北平特别市党部的告市民书全文，莫非是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么？但《中央日报》上另有一精彩的“本报讯”，说是“昨晚9时北平伪广播电台，开始向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呼唤，至10时开始取得联络，10时半双方正式呼应后，伪北平电台请求指示”云云。

最初刊载于1945年8月21日《新华日报》(重庆)，
署名陈桑。



关于出版物的审查制度

取消出版物审查的问题近来已受到各方的注意,这的确不只是与出版家、著作人有关的事。

说到图书杂志审查,在中国的历史,远的且不谈,较近的是在民国二十三、二十四年曾实行过一次。那时,大家知道正是日本侵略中国最积极的时候,而中国方面,在汪精卫的投降政策之下对敌人侵略全采不抵抗的办法。对外既是步步妥协,对内便反而加强了言论思想的统制。图书杂志审查就是在这时候举行。其实行的情形,在鲁迅先生当时的几本杂文集中有一些记录,那只是造成了国内人心惶乱、民意禁锢的结果。当局在实行审查中,也感到很多困难,终于不得不自行撤销。

到了抗战开始后的第一年内,对于图书杂志并没有审查。大家都记得那时确实是民意发扬、民心振作的时候。但到了二十七年7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通过了《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及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决定要立付施行。大家回想一下二十七年7月是什么时候?那正是敌人沿长江而西,加紧进攻武汉,全国人民正一心一意地注视着战局的严重发展,全力参加抗战工作的时候。正在这时候,忽然来了这一套束缚人民自由的法令,岂不令人大惊。所以一开始,就引起了出版界的严重抗议。在二十七年8月初,全国出版业商务、中华、开明等20余家即已联合



具文，吁请当局撤销审查办法，指出实行这办法只“足以阻遏民气发扬，妨碍出版自由”而不会有别的任何好结果。此外，在文化界中也纷纷提出抗议。但当局一概置之不理，就在武汉撤守，政府西迁的匆忙之中成立起中央和地方的审查机关开始执行了。

战时图书杂志审查已有了7年的历史。在这7年中，对于出版业，对于中国文化事业所造的罪孽不可胜计，那已是人所共知，不必在此细述。在这7年中，从出版界、著作界和广大人民中也不知发出多少次的反对审查制度、要求撤销的呼声。由于拗不过人民的要求，审查办法也曾有过改变。但我们必须指出，表面的办法虽有所变更，但其“阻遏民气发扬，妨碍出版自由”的精神和实质并没有任何变更。

好了，现在战事已经结束，这种不合理的战时审查制度自无存在的借口，而战后的中国决不能退回到民国二十三、二十四年去，也是不待说得的事。前日报载，重庆出版业已决定，从此以后不再把书籍杂志送审，这是很好的事。政府此时，自应有勇气立即宣布废除对于图书杂志以及报纸的审查制度。假如要人民协助政府，则自动停止送检，就正是协助政府的一端也。

最初刊载于1945年9月10日《新华日报》(重庆)，署名陈桑。



勿给日本强盗当宣传员

日本同盟社在9月14日起停业。这个专以造谣欺骗为能事的侵略者宣传机构，早就应该封起它的嘴巴了。德国的戈培尔早已死在他的广播器前。假如还让日本的戈培尔们仍能继续借空中的电波散播其毒性的宣传，那实在是对于一切在东方的反日战争中的死难者的英灵的侮辱。

同盟社在停业前的最后一次广播中，居然还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口吻，表示他们对于世界和平的关心，好像他们从来就不是侵略者的扬声筒，而是和平的传道者似的。——这些狡猾的阴谋家连最后一次机会都不放弃进行对世人的麻醉欺骗，实在是值得人深深警惕的。假如不加严重评论而竟照样在我们的报纸上传播这类日本人的宣传，那显然正是日本人所求之不得的事。

其实不仅同盟社的末次广播作如此腔调，几乎一切日本的过去主持侵略行动的军政要人和他们手下的宣传员都已改变成这种腔调了。他们的手上还沾满着血迹，他们的心里还存着复兴的阴谋，而他们在口头却已尽力表现出他们实在是不幸的无辜受累的人，是安心于别人安排给他们的恶运的可怜虫。他们企望用这方法来博取世人的同情，使世人忘记他们的滔天大罪，使世人不注意他们的新的阴谋。

举一个例，像在不久前，我们从各报上可以读到一篇中央社南



京记者访问日本军官今井的电讯。这个今井是屠杀中国人民的日本匪军的高级指挥官之一，那是怎样也赖不掉的。但他居然向着中国记者装腔作势，说了一大套感激涕零，忠实诚意的废话。

今井如此说话，自然是不足奇的。但奇怪的是，中央社电讯不但不加一字评论而照实记录下今井的花言巧语报告给国人，并且还在电讯中大加渲染，既说“日本的数校官及警卫均行敬礼，含笑迎接”，又说“今井语中充分溢露深切感激之情”，“今井倍现悲哀之状”，“今井愈悲怆”等等——中央社记者专程拜访今井，发出专电，又如此着力地描写，难道是为了要引起中国人民对于这批杀人刽子手的同情么？

因此，我们以为有必要提出这样的警告，中国和盟国的新闻记者，都应该当心，不要上了奸诈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和他们的宣传员的当。他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受到应得的惩戒，更没有死心塌地放弃侵略野心，假如无保留地传播他们的“痛心话”、“忏悔词”，那就是给他们当了义务宣传员！

最初刊载于1945年9月17日《新华日报》(重庆)，
署名陈桑。



反 共 新 术

有一位属于“飞来飞去人物”中的人，从上海飞到重庆后，发表谈话说：“东沪区内共党军队亦常假借名义，改用我地下军之服装番号，四出征用民间粮食、油盐、蔬菜……”这种谎话编得实在太低能了。但也不妨研究一下，为什么造这样的谣言呢？其用意自然不是为了表明所谓“地下军”也者，向来就在民间横行霸道，所以“共党军队”要干坏事时，也要冒充“地下军”的招牌。他的用意显然是想使人相信，所谓“地下军”向来是非常清白的，其有在民间干坏事的，都是“共党军队”所冒充的。原来所谓“地下军”的名誉太坏了，不仅当地知道，而且连大后方的报纸也透露出了他们的种种劣迹。现在想出这一个共党假冒的说法，既可为“地下军”洗刷，又诬蔑了解放区人民军队，一举两得，造谣者一定自以为非常聪明吧？

可惜，造谣者不免遇到一个困难。原来他们之所谓“地下军”，都是由汉奸伪军所改编或集合流氓地痞而成，糟蹋民间，劣迹昭著，绝不例外。假如说凡干坏事的“地下军”都是“共党军队”所化妆，那么人们不免得到一个结论说：凡是所谓“地下军”其实都是“共党军队”，他们的“地下军”倒是一个也没有了。而且造谣者说话不小心，又露了一个马脚，为什么要说“共党军队亦常假借名义”呢？原来“假借名义”是他们自己做惯的事，现在把自己的罪名加到别人头上，不留意间，就用了“亦常”这两个字，倒把自己的罪名坐



实了。真是其愚不可及也。

但是无论如何,这一种说法究竟是反共宣传中的一个新发明。现在反共专家们似乎都对于这一新发明很感兴趣,纷纷加以采用。因为这方法最简单不过。你说我的“地下军”做坏事么?我就说做坏事的“地下军”都是“共党军队”所化妆;你说我派人去和敌人勾结么?我就说,去和敌人勾结的人其实是共党的人假冒……以此推去,还可以把一切贪污的官吏、卖国的汉奸,以至做任何坏事的人,都说成是共党派出的人化妆假冒的,于是一切坏事都可交给共党负担,而一切罪名都可加到共党头上去了。

最初刊载于1945年11月3日《新华日报》(重庆),
署名陈桑。



忠臣和好人

江西田粮处长程懋型自杀，很引起社会上的注意。这是热心内战的一党专政政治下的一个悲剧。

为了打内战，当局到后方各省拼命刮搜粮食。江西被派定 200 万石（后减为 50 万石）。名为收购余粮，实际上是抢夺民食。

江西一省快要饿死的灾民已达 200 万人以上，正如一个新闻记者所说：“农民贫穷到已无隔宿之粮，食草根树皮的惨剧各处均有发生，哪里还有余粮可以采购呢？”既然征购不齐，负所谓“粮政”责任的程懋型受了上面的严责，无以应付，进退维谷，便只好一死了之，投江自尽了。

细读程懋型的遗书，我们可以说：他实在至死还是现在的统治制度的一个“忠臣”，他的确对于统治制度忠心耿耿。对于这个制度的根本罪恶，他没有敢进一步给以怀疑。因此他才使自己陷入了非死不可的绝境。

他忠于这个制度，于是这个制度逼得他死。他不敢叛变这个制度，于是他就非死不可。——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悲剧。

程氏的遗书中说：“军俘粮、屯粮、济江浙湘粤之粮，需要既巨且急，如何运交得了！误国家，困人民，负长官，饥军俘，罪浮于天，百死莫赎！”但是为什么有这“既巨且急”的需要？自然是打内战的原故。——尤其是在东北大规模地发动内战的原故。粮食部长给



程氏的一个电报中说：“东北大军云集，需粮急于军火，如不依限如数运济，罪陷党国。”假如立刻停止内战，立刻进行整编军队，江西的人民自然不必负担这许多粮食。

就是仅仅为了不胜粮食负担之苦的后方农民，内战也不应再打下去了！再没有理由要“家无隔宿之粮”的人民为内战而继续受苦了！——假如程氏想到这里，他就不必觉得自己有罪。但是程氏不能或不敢这样想，他只想能够完成他的催粮的任务，而又不致使人民太受困苦，这样就可以一面对“国家”、对“长官”，一面对“人民”，两面都交代得了。于是他就钻进了一个不可能解决的矛盾，而只能以身殉了。

程氏以为他有罪，但我们必须大声为他辩白：他实在没有罪！有罪的是那打着国家之名，进行一党专政，武力统一的统治集团。按照这个集团的利益来说，国家是和人民根本对立的。他们只顾进行内战，不管人民死活；只顾军队吃饱，不管老百姓饿死！在这个统治制度下的程懋型一面想满足统治集团的需要，不至“误国家，负长官”，一面又想能做得不至于“困人民”，那自然办不到的！

假如他真要站在人民的利益上，他就不能不根本反对内战，反对这种害民的粮政。假如他真要在这个统治制度下做个为长官器重的“好官”，他就必须忍心再在江西加添几百万的饥民！

程氏的确不仅是“忠臣”，而且是“好人”。因为他还肯顾到民生疾苦。在今天，当我们说到一个“好人”的时候，其意义应该是：这个人能够和人民站在一起。因为程氏做了官还不忘记人民，所以人民哀悼他的死，还有不少人愿意捐款救济他的家属。但是因为他既想做好人，又不放弃做“忠臣”，于是这个“好人”就被这个统治制度所杀死了。这使我们不能不深深叹息，而更加痛恨这个统治制度的罪恶。



在一个压迫人民的统治制度下，做统治者的忠臣和做人民中的好人，两件事是不能两全的。越到这统治制度腐烂将亡的时候，这种矛盾愈加尖锐。在历史上我们也常看到耿耿忠臣被统治者杀死的事，只因为这种忠臣多少还想做一点对人民有利的事。这种忠臣也赢得人民的悼惜，但却无助于统治制度的命运。人们是能从这“忠臣”不能不死的悲剧中看出，这个统治集团中已不能容纳任何稍为沾点“好人”气味的人，而只能容纳最腐败的官僚、最狠毒的刽子手，从而看出这个统治制度的确已经到了垂死的时候了。

最初刊载于1946年6月3日《群众》(重庆)
第11卷第5期，署名陈桑。



“理未易明”么

胡适之向他的学生说：“理未易明，善未易察”。

回想“五四”当年，胡适之和他的朋友喊出白话文学、文学革命的口号，那时何等虎虎有生气。在那时，胡适之一定以为“理”是已经明明白白的了，白话文学一定代旧的文学而兴起。“善”也是显然可察的了，属于过去时代的一切旧文学、旧道德决不是善的。

不到 20 年，胡适之已经觉得理不易明，善不易察了。

我说，其实不仅是“理未易明，善未易察”，而且对于不站在人民大众的进步的立场上的人说来，简直是不可能“明理”、“察善”的。

举目前正为大家所最关心的问题来说吧。

首先说国民大会及其宪法。背离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片面地召开了国民大会，参加的人除了自己的喽罗而外，只有一些甘愿来当捧场者的人。一面开着会，一面打着仗。在会里经过吵吵嚷嚷，写成了一部宪法，形式上借用一些政协决议的宪草修改原则中的词句，内容上却还是“五五宪草”的实质。

在这一件事中要明其理、察其善，是难是易呢？

道理很明白：这样的国民大会决不能代表全国人民，这样的国民大会开过后，并不能对国内的局势有任何的改善；由这国民大会产生的宪法没有任何价值，决不会有助于中国的民主化，恰恰只是



以使分裂加深,是中国的民主道路的障碍。因此,不承认这宪法,取消这个宪法,那是最善不过的了。

但这样的道理一定不是荣任国大主席,亲手从国府主席那里接受宪草的胡适之先生所愿承认的。听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不承认宪法的呼声,也许他又要摇头说:“真的是理未易明,善未易察啊”!

再说美军驻华问题。美军的继续驻华是有理还是无理呢?事事依靠美国,不顾国权民脉,是有理还是无理呢?要求美军撤退是善还是恶呢?挽留美军继续留华是善还是恶呢?——这些问题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已经清清楚楚了。

这一切事实还不够明显么?在“接收”时期,美军在华是如何缜密地为开辟内战战场而布置。在一年来的内战过程中,美国是如何积极地援助军火物资以加强反人民的内战,又如何巧妙地用调停和暂时休战的办法来解除反人民集团的困难。中美商约的内容是如何凶恶,比日本在民国四年所提二十一条更加厉害。在华美军是抱着如何的帝国主义心理对待中国人民,抢劫,殴打,甚至强奸。看了这一切事实,中国人民已经认清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也认清了挽留美军在华的卖国媚外心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北大的女同学沈崇被美军侮辱的事件,才激起了全国青年、全国人民的无比的愤慨,一致喊出了“要求美军撤退”的口号。——这是最崇高的爱国心的表现。爱国是善,卖国是恶。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中国的国格。这是真理,一切诡辩和曲解都是见不得人的伪理。

假如对着这样是非显著、善恶昭彰的事,还要说“理未易明,善未易察”,那就简直不知是何心肝了。

所以“理未易明,善未易察”其实是句假话,实在是不愿承认人



民大众所已经认清的理，所已经判明的善。

在不敢拿卖国的理来对抗爱国的理时，便只好说：理未易明；在不敢拿反人民的善来对抗人民的善时，便只得说：善未易察。

当反动势力方盛时，还自觉理直气壮，抬起自己的反动的“理”和反人民的“善”，以为天下的理都得跟我，违背我的就是恶。到反动势力只好躲闪在“理未易明，善未易察”的饰词中时，就表示他的确连自己也有点心怯，不能理直气壮了。

请看，在半年前，人民提出要求美军撤退的口号，就有人提出挽留美军在华的运动为对抗。到现在反对美军在华暴行的运动震动了全中国，那些挽留美军的声言已不敢公开喊出来了。——这证明什么？这证明：理不但不是不易明的，而且是一天天更加明白了。善恶的区分不但不是不易判别，而且一天天更加彰明昭著了。

最初刊载于1947年1月15日《读书与出版》(上海)
第2年第1期。



“新”从何处来

“喜新厌旧”是一般的心理。文化要新的，不要旧的；思想要新的，不要旧的；文学要新的，不要旧的，这也可说是公认的了。但究竟怎样才叫做新，怎样才叫做旧呢？有一些人利用“喜新厌旧”的一般心理而把其实不配叫做新的，不值得欢迎的事物贴上“新”的招牌来招徕。因此明辨新旧更为重要。要明辨新旧，就该先来研究一个问题：“新”从何处来？——新事物、新思想、新文化当然不是凭空跳出来的。真正值得欢迎的“新”应该从什么基础上产生出来呢？

对于这个问题，有种种不同的答案。有人以为，“新”是天才的创造；有人以为，“新”其实就是复古；也有人以为，舶来品就是“新”。——对这种种看法，我们都不能同意。

在一种新事物的产生过程中，个别人物的智慧、勇气及其创造能力所起的作用，那是不能否认的。谁也不否认，对于中国近代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思想的产生，孙中山先生是一个伟大的天才。也没有人否认，“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之、钱玄同、吴虞等人都有其功勋。但假如把新思想、新文化之所以产生，完全归功于某一个或几个人的智慧能力，那就不合于事实。事实上，有这样一种自命为天才的人靠他的幻想与“直观”，自以为能创造出什么新的东西；所想出的东西尽管很新奇，却并不能对社会起作用，为社会所欢迎。倘若真是能在社会上起作用，受欢迎的新



事物，决不是少数“天才”闭门家中坐，玄想冥想出来的东西。像胡适之那样把“五四”以后的新文学、新思潮的产生完全归在自己的帐上，那实在是狂妄无知的想法。

在传统的权威未被打破的老中国，凡是比较新的东西的产生常要托名为复古。唐代，从骈文解放的新文体运动，却称为“古文”。清代，解脱宋儒理学的拘束的新学术运动，却称为“汉学”。王安石提出了一套新的社会经济的要求，也托名为复古。以复古之名而革新，这固然是因传统的约束而不得不然，但也表现着这种革新极有限度，并不敢冲破旧传统的藩篱。到了封建旧传统的权威已经堕落时，却又有人以创新之名而求复古。照他们说起来，新的事物既然不能无因而至，那么把已经失势的旧传统恢复起来，那就是新了。于是，分明其目的是要再建封建的统治秩序，却自命为“新生活”；于是，冯友兰所写的每一本书都加上“新”的商标，《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等等，而其内容不过是摭拾了些宋代理学家的牙慧，加上些道家思想的糟粕，成为杂凑的复古主义的思想。复古决不能产生新，假如新就是倒退与落后，又何贵乎新呢？

把“新”解释为“舶来品”，这是半殖民地性格的表现。所谓“摩登”女人的衣饰要学外国电影明星的打扮，步武巴黎的、纽约的风气，因为那就被认是最“新式”的。在文化思想上，有人也和所谓“摩登”女人的想法一样。在他们看来，什么叫做新文化？那就是“全盘西化”。科学是西洋来的，所以值得学，是新的。基督教精神也是西洋来的，所以也是“新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法西斯主义也是西洋来的，自然也非承认其为值得提倡的“新思想”不可了。照这样说起来，连埃及的木乃伊搬来中国，也该承认其为“新”了。中国的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固然有很多的外国的影响，但显然并不是凡“舶来”者均能在中国作为新事物而普及、流传。胡适之曾竭尽心



力地宣扬美国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认为这种“新思想”应该支配中国的新文化。也曾有些英雄好汉摩拳擦掌地宣传意大利“褐衫首相”的“新”理论，以为拿这再加上复古的思想还怕不能风靡一时。但结果如何呢？原来舶来的东西在中国，纵然是向所未有，十分新奇，但假如不适合人民的需要，那是并不能成为被欢迎接受的“新”的。

如上所举的这三种看法的错误是不难看出的。而这三种看法有时固然互相结合，却也常互相攻讦。第一种看法被斥为“自我作古”，“离经叛道”。第二种看法被斥为“食古不化”，“知古而不知今”。第三种看法自然不免被骂做洋奴，讥为“月亮也是外国的圆”。

但仅仅看出这种种说法的错误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正确的看法，究竟“新”是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

我们认为，人民大众在实际生活中的斗争才是新事物产生的基本源泉。凡貌为新奇的东西，只要拿到人民大众的生活斗争中去试练一下，就能判别出其真价值。通过人民大众的生活斗争而产生，而发扬光大的思想文化，那才是值得赞美的有价值的思想、新文学、新文化。

我们说，“新”从人民中来，这里可以包含两层意思：

第一，人民大众的生活实践和生活斗争是不断向前进步的。反人民者以为人民总是落后的，是故步自封的。但其实是统治者束缚人民，陷人民于落后状态，并以愚民政策来阻挠人民的自觉与进步；而人民大众则总是打破这种束缚与阻挠，并在实际生活中不断地提出新的要求，实行新的斗争。从古到今，人民大众的实际生活的斗争总是起着进步作用的。所以凡与人民大众的要求，与他们所进行的斗争相一致、相配合的东西，就是新的东西。人民大众不会有成见，他们能够勇敢地接受新的东西，只要这新东西确能有助于



他们的生活斗争(古来中国的农民起义曾经接受过各种违反传统的新生的或外来的宗教)。同时,人民大众也不会震于新奇而盲目地接受,像女人之选择新装,或知识分子之标新立异那样;因为人民大众是天然严肃地站在实际生活中的要求和实际生活斗争的立场上的。

第二,我们还该看出,创造文化的最高力量就蕴藏在人民大众中间。人民大众并不如有些人所想的只是有可塑性,而无创造力,是只能由别人灌输一些东西进去,而不能自行创造出什么来的。事实上,人民大众不仅是物质生产力的源泉,而且也是文化创造力的源泉。我们说,中国文学的最早一部集子是《诗经》,但《诗经》就是当时民歌的结集,那难道只是某些“圣人”的创作而不是当时人民大众在实际生活中的文艺创造力的结晶么?后代的诗、词、曲、小说,每一种新文体的产生也无不是先在人民大众中已经结了胎的。在封建专制主义的高压下,人民的物质生产力受到摧折,人民的文化创造力更受到阻遏。那么,越到人民大众在实际生活中一天天接近解放的时候,人民大众的文化创造力也就逐渐地更能充分发挥。人民大众用自己的力量争取得解放,也一定能用解放了的智慧来创造一切新思想、新文学、新文化。

自然,从人民大众中产生出来的新的东西仍需要有人来加以总结,施以提炼,那就是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工作了。所以说,人民大众是新文化的创造者,并不否定个别的知识分子的作用。

同时,从人民大众中产生新的文化,也并不是说完全不顾过去文化的历史和外来文化的影响。历史的遗传和“舶来品”通过人民大众的实际生活斗争,才能判别出何者是有价值的,何者是没有价值的,何者是适合于今日中国的土壤的事物,何者并不是。

所以,我们建立了“新”从人民中来的基本看法,我们就能批判



上举种种错误的看法而不至流于偏向。

眼前是中国人民大解放的时期。人民大众正在从斗争中来争取做自由的历史的主人和自由的文化的主人。中国今后的新思想、新文学、新文化，一定只能从人民大众中源源涌出，而决不可能从任何别的地方产生。知识分子要为新思想、新文学、新文化服务，就要和人民大众结合起来，向人民大众学习。假如站在人民的斗争以外，自己玩弄一套“新”的东西，那就只是新其所新，而不是人民大众所承认的新。这种自命为“新”的东西一定是为社会所不承认，也将为历史所不承认的。

最初刊载于1947年3月8日《文汇报》(上海)。



帮忙与帮闲

听说民主社会党在上海成立时，吴铁城向张君勱道贺说：贵党虽然初成立，但先天甚厚云云。这意思自然是指，民社党不仅是国社党之化身，而且其历史可以远溯到民初的进步党以至清末的保皇党。

又听说张君勱在去年11月初向人表示说：“我们决不单独参加国大。当年进步党坐视袁世凯压迫国民党，而其结果，进步党与国民党一样，同归失败。”——由这段话，可知张君勱那时还能冷静地记忆到他们这一集团过去的历史，取为殷鉴，作出聪明的决定。但曾几何时，已经忘记了一切，和青年党成为一丘之貉，争着在国民党政府中分取一官半职，扭捏作态，卖俏出丑。——“利令智昏”，真有这样大的作用么？

当年进步党和袁世凯的关系，的确可以取来和今日民社党、青年党的行径先后映照。

袁世凯于民国二年，借临时大总统的地位，取得五国银行团的巨额贷款后，就和国民党翻脸，以兵力压倒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二次革命。在内战进行中，进步党乘机向袁世凯讨好，取得国会中的优势地位。袁世凯这时也想利用这班名流来“收揽輿情”。内阁本来是以袁家的鹰犬赵秉钧为阁揆，这时便决意实行“改组”——自然，在当时还想不出“还政于民”这样的漂亮话——另请了熊希龄



来当内阁总理，以便拉拢进步党人。于是梁启超、汪大燮、张謇等进步党的名流便联翩入阁了。这时进步党人好不兴头，自称这是第一流人才内阁，虽然内阁中陆海军、内务、外交等主要位置都还是袁家私人所占着，进步党人分得的不过是教育、司法、农商等闲曹，但他们自以为从今后，只要好好地吧袁世凯巴结住，这天下就是进步党的天下了。不料袁世凯不过是暂时利用他们，等到进步党占多数的国会选举了袁世凯做正式大总统后，袁已经开始阴谋进一步要当皇帝了。过河拆桥，他再不要什么进步党，什么国会了。二年年底，国会与国会的宪法会议均为强制手段所停止。这时进步党人才倒抽一口冷气，知道一切希望都已落空。熊内阁从二年9月成立，到了三年2月就倒掉了。——这就是当年进步党给独裁者当帮闲的收场。

今日的民社党、青年党的参加政府，最好的结果大概就是当年进步党参加政府的结果。

为什么说这还是最好的结果？因为情形可能更糟。历史教训本可以从不同方面去接受。张君勱在表示不参加国大时是从正面接受进步党的教训，但也许现在已从反面去接受了：当年进步党人之所以终于失宠，因为他们到底还不甘心捧袁世凯当皇帝，假如连这也肯干了，岂非就可长保富贵了么？——你要当大总统，我就写选举票；你要当皇帝，我就上劝进表；你要打内战，我就起草讨伐令；你要卖国，我就到外国去先容……但不知曾否想到，一旦独裁者上煤山吊死时，捧场诸君子又将如何？

我又记起在熊内阁组织时曾邀请某人任教育，其人却觊觎交通，说是我只帮忙，不帮闲，拂袖而去。后来此人为“六君子”之一领导筹安会。为袁氏帝制效犬马之劳，那自然是实实在在的帮忙了。现在两个小党在参加国大时是帮闲，如今是要参加政府帮忙了，还



在争中央的部，争地方的权，其意大概正是说：“我们是来帮忙的，怎么以帮闲待我们呢？”而今日的当权者自然要比老袁更来得精明，不肯轻易付价钱：“你们既要我出十分价钱，就得先给我十分货色的保障。”此所以这笔生意还在谈来谈去，但也就快要谈定了。

看来今日的民社、青年二党已经决心既可做帮闲，更愿积极帮忙，既做进步党，又做“六君子”。——试看尚未入阁，只收到点定洋，已经丢开一向高喊的反内战的口号，对于正在进行的内战表示赞助了，则一旦入阁还有什么干不出来的？自以为奔走一生，现在已经找到了识货的买主，难道不知道这个主人自己已经是朝不保暮，奄奄一息了？——其下流和愚蠢，恐怕连“君励先生”的前辈梁任公在九泉之下也不能不为之摇头叹息了。

最初刊载于1947年4月《自由丛刊》(香港)第1辑，署名陈桑。



读秋白遗文

鲁迅先生编的《海上述林》只包含瞿秋白先生在文艺方面的译品。此外还有散文集《乱弹》也曾经刊行过。现在《海上述林》与《乱弹》已成为不易觅得的珍本，而秋白先生一生的其他译著却还没有被好好地整理编刊。虽然最近听说有人正在从事秋白全集的编辑，但处此时际，纵然编成，恐怕也还一时不能刊行吧。偶从旧杂志上读到几篇秋白先生的政治论文，已是 20 余年前的老文章了，但从其透辟的见解和锐利的远见中至今是依然散发着光辉的。

— “知识阶级”

《政治运动与知识阶级》一文发表在《向导》第 18 期（1923 年 1 月 30 日）。这时是在“五四”运动后 4 年，也可说是在“五卅”大运动的酝酿期间。这篇文章把“知识阶级”（其实应该说是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说得很清楚。

这篇文章中分析中国的“知识阶级”中有两种分子，一方面有“旧的知识阶级”，那就是继承着“宗法社会的士绅阶级”，“以政客为职业，以议员为职业”的“高等流氓”。另一方面有“新的知识阶级”，其中，“学生界尤其占最重要的地位”。“旧知识阶级”中以“官僚”为主体，他们是“专制派的镖师”。“新知识阶级”中以“学生界”为主体，



他们是“民治派”(民主派)的健将”。

由此,本文更进一步分析这两种“知识阶级”的背景。“知识阶级始终只是社会的喉舌,无论如何做不到主体”。主体是什么呢?“政客不过是军阀财阀的机械,代行帝国主义侵略诈骗的野心,学生不过是劳动平民的利器,表现中国经济要求独立的意识”。“一方是军阀的兵匪,一方是平民群众,政客与学生不过是双方之‘辅助的工具’,此等辅助工具往往先行试用,不中用时,主力军就非亲自出马不可”。——这个分析相当明白地反映了“五四”运动以后的发展。“五四”运动中学生群众的直接行动是“打倒曹章陆”,向卖国的官僚政客挑战,这个短兵相接的斗争势必渐渐化为广大人民群众与军阀专制统治的全面战斗。

但是在1923年初时,“劳动平民”的“主力军”的出动是还未成事实的。这就表现了本文作者的远见。文章的结论说:“双方的主力军的训练组织,因历史的社会的条件,大相悬殊。——一面是现成的,一面是散漫的,同时因世界经济进化的环境,又会一面是日落的,渐死的,一面是日升的,新生的。所以政客当军阀的机械是很老辣的,因为他身后辎重队——大本营“完备”得很,丝毫用不着自慙。而学生当平民的先锋却往往畏缩,因为他身后的主力军刚刚有些具体而微的模型,不肯自信,不敢自信。然而军阀的昏淫末日快到,平民觉悟自己的实力也就不容迟了。”

当知识分子在黑暗的统治下首先举起反叛的旗子时,往往自以为是苦斗的孤军,看不见在自己背后广大的“劳动平民”的力量将源源不绝地涌出来;或者虽已看到,但还缺乏对人民力量的充分信心。秋白先生当那时候,已经能够明白指出,“劳动平民”的力量目前虽然是“散漫的,具体而微的”,但它是“日升的,新生的”;反之,军阀专制势力虽然是“现成的,完备的”,然而却是“日落的,渐死



的”。他鼓励知识分子要信任他背后的广大的主力军。20多年来的历史证明这是勇敢的远见。

或者是当“专制派的镖师”，或者是当“民治派的健将”，这是每个知识分子最后必须严格选择的两条道路。20多年来，有多少知识分子，自以为独立高超，一离开人民的路，终于堕落为“专制派的镖师”，眼前我们就看见胡适之、张君勱等人（更不用说曾琦、左舜生等人）露出了可卑可怜的原形。——“两军交战了，容不得犹豫怀疑”！25年前秋白先生向知识分子提出的一声棒喝，至今似乎犹在空际回荡着。

二 宪法与国会

民国初年的政治上一直不断地闹着约法啊、宪法啊的问题。北洋军阀专制政府一个个也都拿制宪、行宪来做装潢。直到1926年春天，北洋军阀势力已经到了垂死的挣扎时期。直系与奉系军阀联合统治北京，还在嚷着护宪、护法，直系主张恢复民国十二年的国会，即曹锟的贿选国会，奉系主张根据约法成立新国会。秋白先生于《最近中国之中央政府问题》（《向导》第153期，1926年4月）一文中尖锐地揭破说：

“中国的国会，在这种形势之下，完全处于军阀支配之下，不论是贿选国会或是约法的新国会，现在甚至于连粉饰共和招牌的假面具作用都完全没有了。这种国会对于一般民众没有丝毫意义，只是多一种卖国殃民的机关罢了。……他们（军阀支配下的国会议员们）只能勾结军阀帝国主义，帮助压迫民众以取媚于他们的主人，而求保持自己对于一般农民的残酷剥削及严厉压迫的地位和声势，巩固自己对于一般商民的把持政治舆论等机关的势力和权



位”。“军阀之下的国会，除此以外，不能有丝毫别的意思，决谈不到民主立宪等等。”

这篇文章中更说：“护宪护法的军阀，所注意的只是在这种名义之下多争些政权，并不是宪法或约法所规定的人民自由和主权。这样胆大无耻的政治态度已经是国人公认的公开秘密。……甚至于3年前拥护曹锟宪法的保皇党张君勱等，那时还假意说这一曹宪怎么样的好，还提议要江苏公民投票表决，还说‘看大家要不要这一宪法所规定的自由和民生计划等’——如今甚至于连这种无耻至于极点的劣绅政客都不敢再在这一点上表示赞成护宪。为什么？——因为吴佩孚等以护宪为标榜的军阀，天天在那里残杀压迫民众，摧残一切所谓宪法上的自由或权利，铁一样的事实摆在国人的面前。”

这里提到了张君勱。原来在民国十二年时对于大军阀曹锟通过其猪仔国会，贿选议员们而制成的宪法，张君勱也曾表示过竭诚拥护。但是军阀的行动和宪法的文字相距实在太远了，所以到了3年后，张君勱也不敢再表示赞成护宪了。现在，张君勱又在表示赞助另一套的同类的宪法，试看，再过3年，他还敢不敢拥护民国三十五年11月制成的宪法？——历史的教训对于这种聪明的“学者”竟连一点作用也没有，其性格和命运是已被秋白先生在20多年前就已说定的。

三 义 和 团

在中国近百年史上，义和团事件可算是最受到不正确的解释的一件事。

秋白先生在辛丑条约24周年时(1925年9月7日)发表过一



篇文章，讨论到义和团。也许可说是正确地评论这一历史事件的第一篇文章，而且甚至至今还没有超过这一篇文章的。

“普通谈起庚子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往往有许多人以为这是‘拳匪’，这是野蛮的排外主义；——假使这班匪徒不这样胡闹，八国联军也不会来，辛丑条约也不会订了。这种人固然反对辛丑条约，反对庚子赔款，可是他们的论点是：义和团是少数无知愚民做的事，外国人不应当将这种责任和罪名归到全国人身上，使全国人负担这样巨大的赔款。”——对于这种看法，秋白先生是完全不同意的。他指出，义和团运动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是“中国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失业的劳动民众”的反帝运动的表现。所以真正应该负责的还是施行侵略的帝国主义者。而同时，秋白先生文中也对义和团运动给了严正的批评，这种批评和那种诬蔑与抹煞的论调是根本不相同的。

“因为义和团被狭义的民族主义及国家主义思想所蒙蔽，他们竟为贵族阶级所利用，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反对一切进步的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他们只知道一切中国人都要团结来反对一切外国人，他们以为这样，外国的侵略便可以防止，中国的国家和文化便可以保存，他们的权利便可以有保证，生活便可以安定。殊不知，当时的一切平民应当同时反抗满清，自己握得政权，才能抵御帝国主义的进攻。……他们一切迷信反动的思想和策略，完全根据于这狭义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国民文化主义而发生的。他们事实上争自己经济地位的改善，可是不能明白提出自己阶级的经济要求。……可见他们失败的原因完全在于不能以自己的阶级斗争引导一般的普通农民的广大群众，更不能以这种阶级斗争来领导各阶级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他们于‘扶清灭洋’的狭义国家主义的口号以外，什么阶级的要求都没有。他们自身虽是农民，却



甘心做反动贵族(所谓‘国家’或‘民族’)的工具”。提出这样的批评之后,秋白先生更指明,“这也是无怪其然的啊”,因为这是“游民的或纯粹小农的落后阶级”的反帝运动,在当时历史阶段中不可避免的

错误。

根据秋白先生的这一正确的分析,我们实在还应当更进一步指出,所谓“狭义的国家主义思想”(离开和消失了农民的阶级意识)并不是从农民群众中自发地产生,而是清统治者灌输到农民中去的。当义和团运动一开始时,清统治集团中有两种不同主张,主剿的是荣禄、袁世凯等,主抚的是端王载漪、裕禄、刚毅等。主剿的是因为害怕义和团,怕它结果会和太平天国一样地反清;主抚其实也是因为害怕,所以企图拿狭义的国家主义思想灌输到农民运动中去,以求不致危害于清王朝。德菱公主作《在禁城中的两年》一书中记慈禧太后的话颇能表现这种情形。“荣禄认为义和团不过是班造反的乱民,他们要老百姓一起去杀洋人,但他(荣禄)很担心其结果是反对政府。……他(荣禄)建议我(慈禧自称)下诏宣布义和团为逆党,不准人相信他们,并令九门提督把拳民立即驱逐出城。端王听到了,大怒,向荣禄说,如果下了这诏令,拳民就会进宫把所有人都杀掉。”慈禧又自称:“我知道许多人都相信当时政府和拳民相勾结,但这并不是事实。我一发觉麻烦时,就立刻下了几道诏令,叫军队撵出他们,但他们已经走得太远了。”——慈禧的这两段话是相当可信的。这说明,清统治者之利用义和团,不过是由于害怕农民叛乱的力量打到自己身上,他们努力把农民行动领导到盲目排外的方向去,以至一发而不可收拾,而在闯了祸时,却把责任完全推到拳民身上。

秋白先生看出,义和团的行动与思想不在于反帝运动的激烈,而在于其缺乏阶级的觉悟,为反动贵族所利用,所以才在反帝行动



上表现得盲目与幼稚。——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这篇文章是写于“五卅”运动的高潮期间，所以文章的题目是《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文中说：“五卅运动之中，所可怕的是一种狭义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复辟。所谓‘国家超于一切’、‘工人不准行阶级斗争’一类的论调，我们现在常常可以在资产阶级报纸上看见，甚至于国民党领袖中也有这种倾向；这是一种新义和团的危险。危险在于他们要使劳工群众跟着资产阶级妥协，丧失自己的阶级觉悟，抛弃自己的阶级斗争——因而始终破坏了此种解放运动。”

向来，反动势力每每以“义和团主义”来诬蔑人民的反帝运动。对于最近学生和其他市民群众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运动，也曾有人用这名义来加以中伤。但是中国人民起而求民族的解放和独立，是十分光明正大的，决不是什么应该避免的“义和团主义”。真正应该反对的“义和团主义”是什么呢？按照秋白先生的正确的分析——反动统治者以错误的国家观念来麻痹人民，要人民相信他们是国家民族的代表，并把人民的明确的反帝国主义思想转变为盲目而笼统的排外观念，使人民忘记了反动统治者其实是中国人民民族独立解放的一大障碍——这才是应该反对的义和团主义！

最初刊载于1947年7月5日《野草》(香港)
第4期。



当一个朝代覆灭时

清朝一代怎样覆灭的历史，至今读来，特别易于发人深思。

虽然在1911年的武昌起义后，清朝才覆灭，但实际上，自经甲午之役（1894年的中日战事），它的覆灭的命运已经注定了。清末的历史固然证明，这一个已经破碎腐烂，无法继存的专制王朝，因为得到了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便能够苟延残喘，多活了若干年；但同时也证明了，这个朝代因为已经完全托庇于外国主人的力量，所以是注定了瓦解崩溃的命运。

康有为在1897年（甲午之役后3年，戊戌政变前1年）上书给皇帝，痛述“亡国”的危机。他一方面指出强邻四逼，有瓜分中国的野心；一方面指出国内人民的情绪。他说：“自台事后，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这是说，自甲午之役，把台湾送给日本后，老百姓都知道这个政府是不可靠的了。）“人无固志，奸宄生心。陈涉辍耕于陇上，石勒倚啸于东门，所在而有，近边尤众。”（这是说，人民已经忍受不住，都要起来造反了，农民起义的风波，少数民族反抗的斗争，到处都在蔓延着。）“加以贿赂昏行暴乱于上，胥役官差蹙乱于下，乱机遍伏。即无强敌之逼，揭杆斩木，已可忧危。”（这是说，外国人纵不来灭亡中国，人民起义的危机已可使这朝代灭亡。）同时，康有为又在这篇上书中把这时清政府本身的衰亡情形逼真地写道：“满朝上下，相顾嗟呀。……生机已尽，暮色凄惨。气象如此，可惊



可悯。此真自古所无之事。”(这是说,清统治者自己的情绪也已十分低落,已经是日落西山,奄奄一息的气象了。)

康有为是站在清皇朝的忠臣立场上说话的。他站在这个立场上向皇帝说:如果你还是照现在这样没出息,外国人将要瓜分掉中国,就会取消你这个朝代,老百姓也会起来造反,推翻你这个朝代。所以在他的上书中,痛哭流涕地说:“恐自尔以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最后又说什么:“……职诚不忍见煤山前事也。瞻望宫阙,忧思愤盈,泪尽血竭,不复有云。”

这样的“忠臣”的进谏,照理是能够打动清统治者的心了。但是如所周知,只有年轻的光绪皇帝受了感动,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统治集团一点也不愿意容纳康有为的主张。这是什么原故呢?一般的解释都说,这是因为自慈禧以下的清统治集团太愚蠢了,连自己的死活都看不出来。其实不然,原来康有为所指出的国家危机,是着重在外国的瓜分中国;但是有经验的清反动统治集团,却已从他们的经验中看出,外国并不会抛弃清政府而来瓜分中国。相反的,清政府倒是会受到列强各国在财政、军事上的支持的。既然如此,他们自然把康有为一班人看做是危言耸听的无知狂生了。

因此,康有为这班维新志士和清统治集团自然是话不投机。康有为替清朝担心说:“我今……虽名为国,而土地铁路商务银行,唯敌之命,唯客取求,虽无亡国之名而有亡国之实”。“浸假如埃及之管其户部,如土耳其之柄其国政(不久后会像埃及、土耳其一样在政治上被外国控制)。枢垣总署,彼皆可派其国人,公卿督抚,彼且将制其死命”(《上皇帝书》)。康有为的同志谭嗣同(戊戌六君子之一)也愤愤地说:“保护教堂之严旨急如星火,驯至寓湖北之洋人每日游洪山,令由督抚衙门派兵伺候,岂复成世界?西人犹谓中国之



官曾不能自约束中国之民，要此官何用？”（《报贝元徵书》）这些维新志士为这样的情形而着急。不料清统治集团所求者正是这种情形。如果外国人来直接监督它的政府，那正表明外国不至于舍弃它，既然外国人责备于中国政府的是“不能自约束中国之民”，那么只要好好遵照吩咐，约束百姓，自然就会被宠爱了。

其实从甲午之役上推 20 年，清治下的情况已经是如此了。丁日昌在 1874 年有一个奏疏，说当时人民生活的情形是：“饔餐不缺者十之三，饥寒逼迫朝不保暮者十之七。而中尤受困累，无可告诉者一为农，一为商。”他描写官府压迫农民的情形是：“农民终日胼胝之余，所得几何。一经胥吏之垂涎叫嚣，必至鸡犬无声而后已。……见教士则若天神，视平民则如鱼肉。……当官幕吃烟饮酒呼卢喝雉之时，正百姓颠连疾苦哀吁无门之时。……”他又描写商人受关卡勒索的情形是：“权吏卡员，苛索万状，翻囊倒篋，无异盗贼。随身需用之物，在洋人尚有优免之幸；独至华人漏报一丝一缕，虽全船货物充公而尚须加以厚罚。不知当事者何厚于待洋人而薄于待华商也。”对于丁日昌的这些描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说明农商生活之苦时，都强调政府官员害怕和尊重外国人而欺凌压迫本国百姓。以督抚大员如丁日昌者都说出了这样的话，可见这样的观感，当时是已普及于民间了。

原来清政府自经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和 1860 年庚申之役的失败以后，它已经愈来愈变成一个依靠外国势力来维持生存的媚外专制政权。再经过 1894 年的甲午之役后，就更加是坚持这个政策。海关、财政、铁路、领土——分送主人，只求能得主人宠信，顾不得人民的死活如何。它既然成了这样的一个“寄生动物”，自然就显出“生机已尽，暮色凄惨”的气象；而因为“生机已尽”，也就只好以做“寄生动物”当作唯一出路了。



在戊戌政变后2年,发生了义和团的事变。清政府因为压制不了人民中的排外运动,眼看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惊惶万状。它所怕的是外国主人这回也许会不要它这个奴仆了。但结果辛丑条约订立后,它仍能回到北京,继续做中国统治者——主人还是任用它,使它感激万分。所以辛丑条约虽然在中国人民看来,是奇耻大辱,但在清廷当时的“上谕”中却说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1901年2月13日的清廷《上谕》)

清政府创造了一个先例,在越到衰微时,就越是巴结和依靠外国帝国主义主人。在50年前,谭嗣同看到衙门派兵伺候洋人游洪山已经觉得“岂复成世界”,那么他如果在现在,看到“皇帝”自己也得伺候洋钦差,更不知要如何说法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清朝虽是创始者,但其成绩比之后来者又不能不说是远不如的。但是今昔的统治者以为既能“结与国之欢心”,就能够长治久安,永保尊荣,那到底是打错算盘了。而且如果在清末年,因为人民的觉悟程度低,所以还能在“生机已尽,暮色凄惨”之时多拖延了若干年的生命,那么到了现在,人民是再不能长久地容忍的了。

最初刊载于1947年10月6日《野草》(香港)
第5期。



中国非袁不可吗

——辛亥革命所得到的一个教训

当辛亥革命发动后不久，清政府的崩溃已成为确实的事实时，在全国各地却流传着一种说法，叫做“中国非袁不可”。大军阀、大官僚袁世凯就在这种空气中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

但是过了一年，袁世凯的大独裁者的真面目渐渐显露了，他毁弃约法，蔑视国会，暗杀国民党领袖，实行个人的专制，大举借外债来做内战的资本，准备用武力消灭一切异己，于是中华民国只成为一块空招牌，眼看连这一块招牌也要被袁世凯卸掉了。这时在全国各地渐渐地传起一种新的说法，叫做“中国非去袁不可”。

究竟是“中国非袁不可”，还是“中国非去袁不可”呢？已经是不成问题的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为什么在辛亥革命中，“中国非袁不可”的心理竟普遍于国内，在当时连比较坚定的革命者也无可奈何地承认了这种说法呢？

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从辛亥革命中取得一个有益的教训。

我想，我们现在不必讳言历史的错误。辛亥革命中的确犯了一个错误：没有真正动员广大人民建设真正的民国，却因为有了民国这块招牌就满意，而把民国的政权轻易让给袁世凯这个大独裁者。

根据各种实际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出，辛亥革命时革命阵营方



面的人也的确是几乎可说是急不及待地向袁世凯妥协，只要袁世凯肯承认国民党这块招牌，不惜让公选出来的大总统孙中山先生辞职而奉请袁世凯登台。当时的许多人犯了这种错误，多半是出于这两种心理：

第一，急求国家的“统一”。

第二，急求列强的“承认”。

辛亥革命后几个月内，全国三分之二的省份已经“光复”，而且建立了南京的革命政府，但袁世凯在北方还拥有兵力，于是袁世凯向南方的革命势力说：如果你们不把政权交给我，就不免发生南北战争，除非你们能用武力消灭我，否则我就要用武力来消灭你们。但如果你们把大总统的位置乖乖地送给我，那么全国就马上可以“统一”了。为什么你们不让我“统一中华民国”，而要反对我，以至形成“分裂”呢？

同时，列强在辛亥革命时的态度也很可注意。那时，外国人几乎一致地都推重袁世凯，认为他是组织新的中国政府的最理想的人物。至于对南方的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政府，列强却一致采取冷淡的态度，丝毫没有“承认”南京政府的意思。于是袁世凯的态度更加强硬了。他说：如果你们一定要革命政府而反对我，那么就会发生内战，就会引起外国的干涉。但如果你们肯让我来“统一”中国，那么我所领导的民国政府就会得到外国的“承认”。外国人就会帮助，民国的建设事业就可以顺利地推进了。

我们不能不说，在辛亥革命时，虽是比较坚决的革命者，也还没有经验，还看不出袁世凯的阴谋，于是他们就上了当。他们听了袁世凯的威胁和劝诱的话，又看了看当时的形势，他们便天真地想道：啊呀，真的啊。不管怎样的统一，国家能够统一总是好的啊！就让袁世凯做大总统吧，我们还是选择统一而不要选择内战吧。他们



又上了袁世凯的圈套而这样地想：如果继续南北分裂，外国人是会帮助袁世凯的政府而不帮助南方政府，如果硬要袁世凯滚蛋，也许外国人就不肯“承认”民国政府，那岂不糟糕么？

由此可见，辛亥革命之所以向袁世凯妥协，就是害怕分裂，害怕外国干涉。因为害怕分裂，就只好承认袁世凯的“统一”。因为害怕外国干涉，就只好承认帝国主义列强给中国人民选定的统治者。——其实“分裂”有什么可怕呢？反动势力不肯顺从人民的意志，却想篡夺人民革命的成果，人民就不能不起来一致反对它，声讨它，如果这就叫做“分裂”，那么“分裂”的责任应该由专制统治者负，而这样的“分裂”的结果一定是人民的力量战胜专制统治者的力量。外国的干涉又有什么可怕呢？帝国主义国家难道真的能在中国为所欲为么？帝国主义列强曾经支持清政府，但人民的辛亥革命却一举而推翻了清政府。如果帝国主义硬要在中国支持一个为人民所不欢迎、所反对的政府，那么帝国主义也必是会失败的。只要人民全体觉悟了起来，一致坚持奋斗，那么帝国主义的干涉是决不能阻止人民意志的实现。

辛亥革命时的革命者一味受了袁世凯的“统一”论的欺骗，害怕袁世凯的武力；受了帝国主义列强“承认”说的欺骗，害怕帝国主义武力的干涉，结果就造成了向袁世凯妥协的错误，就错误地以为“中国非袁不可”了。

我们也不能不说，在当时，甚至孙中山先生自己也犯了这种错误。不过孙中山先生不久后就发现了这错误，从民国二年7月后发动第二次革命时起，孙中山先生已重树革命的旗帜以反对袁世凯。孙中山先生并不讳言这错误，他在讨袁斗争中曾宣言说：“吾侪昔以大仁大义铸此巨错，又焉敢不犯难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吾民。”

到了袁世凯的破坏民国的罪状已经被人民所看清，遭受全国



反对时，袁世凯也还是想用“国家的统一”和“外国的承认”这两点来欺骗人民。但是人民已经不再受他的骗了。到了现在，离辛亥革命已经有 36 年，中国人民有了更多的经验，就更加能看清楚这两点了。

第一，袁世凯式的“统一”是对于人民有害的，对于中华民国有害的。人民不要专制的统一，而要民主的统一。所以辛亥革命中承认袁世凯的“统一”是错的，民国二年后，向袁世凯宣布的战争才是正确的。从革命的战争中实现民主的统一，那才是对人民有益、对中国有益的统一。

第二，任何外国都没有权利来给中国人民指定一个政府。对于一个中国的政府，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外国是否承认，而是中国人民是否承认。一个万恶的政府，纵然为外国所承认，甚至为一个或几个外国势力所支持，但如果不能为中国人民承认，而是为人民所反对，也就不能算是合法的政府；反之，如果是中国人民自己所选定的政府，纵然有些外国政府看了不顺眼，但那才能算是合法政府，也就终归能为世界所承认。

从辛亥革命中得到这样的教训对于我们是很有益的。现在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也就是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是统一的政府，是合法的政府。照他说起来，谁反对蒋政府，谁就犯了破坏统一罪。至于它是合法政府的理由呢？就因为它是外国所承认的中国政府。——这样的说法哪里还能骗得了今天的人民呢？如果说中国人民还会上他当，那么袁世凯的政府也不会垮台，袁世凯也不会气死了。

袁世凯虽曾以统一的政府自豪，但民国二年后孙中山先生就领导起了反袁的革命战争。袁世凯政府终于经受不住全国人民的反抗而崩溃了。



袁世凯也曾经以外国所承认的“合法”政府自豪，但是虽有庇护和支持他的外国人，也挽救不了他的生命。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上已判定了，袁世凯不过是篡夺了辛亥革命成果的窃国大盗。

当今的大独裁者难道会比 30 年前的大独裁者的命运要好一点么？

辛亥革命中，很多人以为“中国非袁不可”，那是犯了错误。民国二年的二次革命后，大家都以为“中国非去袁不可”，那才是对的。同样的，若干年来，有人以为“中国非蒋不可”，那也是错误的想法。现在举国人民都看定“中国非去蒋不可”，那才是正确的想法。

最初刊载于 1947 年 10 月 10 日《华商报》(香港)
双十增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绳全书 第一卷/胡绳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

ISBN 7-01-002453-7

I. 胡…

Ⅱ. 胡…

Ⅲ. 胡绳-全集

Ⅳ. C52

胡 绳 全 书

HU SHENG QUAN SHU

第 一 卷

人 民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33.75

字数:764千 印数:0,001—3,000册

ISBN 7-01-002453-7/Z·81 定价(上下):55.00元